

工业社会和新左派

〔美〕H·马尔库塞 等著



商务印书馆

工业社会和新左派

[美] H. 马尔库塞 等著

任立 编译

商务印书馆

1982年·北京

本书共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 H. 马尔库塞和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 M. 马尔科维奇等人的六篇文章，这些文章将精神分析的方法运用于社会学领域，研究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问题，分析和总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六十年代的新左派运动，对我们了解和研究马尔库塞等人的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工业社会和新左派

〔美〕H. 马尔库塞 等著

任 立 编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333

1982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51千

印数 5,700册 印张 6¹/₈

定价：0.84元

译者序言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派别，被称为第二代批判的马克思主义^①。其诞生地和大本营是西德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初创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至今已有近六十年的历史。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经历了兴起、流亡、鼎盛、衰落的历史过程。今天它虽已几近分崩离析，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不但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而且至今仍有着巨大的影响。

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成立于1923年，其前身是F. 威尔在一年前的夏天倡议召开的“第一届马克思主义工作周”，目的是“通过各种各样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的相互讨论，认识真正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②。参加这次聚会的有后来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激烈反对者的G. 卢卡奇，有K. 考什，有1944年被日本政府当作苏联间谍绞杀的R. 左尔格，有克拉拉·蔡特金的小儿子K. 蔡特金，以及K. 维特福格和F. 波洛克等人，他们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社会研究所的成员。F. 威尔对这次聚会并不满意，因为他觉得来的尽是知识分子，没有取得什么实际的成果，于是他就又想起了他早先的一个主意：建立一个研究所，研究工人运动的历史与理论，研究社会的科学生活领域和文化生活领域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研究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向^③。他就和几个志同道合者，其中有

^① 第一代系指G. 卢卡奇和K. 考什，特别是指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和考什在《马克思主义与革命》中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所谓批判。

^② M. 杰伊：《辩证法的幻想，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史（1923-1950）》，波士顿，多伦多，1973年。

^③ 同上。

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建人 M. 霍克海默尔,以及波洛克、K. 格拉赫等人开始了筹建工作。第一步成立了一个私人基金会,其主要资助者就是 F. 威尔的父亲——一个富有的谷物商。第二步是于 1923 年 3 月在法兰克福维多利亚大街,接近法兰克福大学的地方盖研究所。第三步是物色研究所所长,结果选中了维也纳大学法学和国家学教授 C. 格吕贝克。格吕贝克以编纂《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而著称,被誉为社会运动的杰出专家。就这样,欧洲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机构正式成立了。

研究所一成立就吸引了大批的德国大学生和讲师,在欧洲也颇有影响。研究所成员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研究所本身也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及马克思恩格斯学院有联系。研究所曾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把未发表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送给它们。作为答谢,在十月革命十周年时,格拉赫被邀访问了苏联。1927 年格吕贝克不幸中风病倒,从此不能理事。三年后,年仅三十六岁雄心勃勃要创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教授霍克海默尔被遴选接任所长,从此揭开了社会研究所历史的新篇章。

霍克海默尔一上任就为研究所制定了新的研究方向: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现状和意识形态,重视社会哲学的研究。霍克海默尔认为,当时存在着两种极端,一种是超越经验的抽象的总体性构想,一种是只知确定事实,而忽视或者甚至敌视理论的实证主义研究。霍克海默尔说这两极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因此他主张要把哲学家、社会学家、国民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都组织起来,进行有计划的研究。于是他一面到处罗致人材,扩大队伍;一面创办《社会研究杂志》,四出延请撰稿人,以壮声势。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由于这一学派是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为大本营的,所以又称法兰克福学派。其主要代表除霍克海默尔外,还有 T. 阿多诺, H. 马

尔库塞，E. 弗罗姆，L. 勒文泰尔和波洛克等人，他们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

“社会批判理论”的目标是“用总是可以认识的态度，来把握社会生活过程”^①，它不应该从世界观的角度美化过去的东西和现存的东西，必须力避教条、僵化，和堕落为纯经验的技术性东西。应该透过事件的混乱的表面，认识概念能理解的起作用的力量结构，因此历史将不是可以从心理上加以说明的任性的混合物，而是可以科学地阐明的“受法则支配的动力学”^②，而这些法则不是全面支配人的法则，而是必须从行为的人和人生活其中的世界的社会的、历史地生成了的结构因素之间的辩证的、不断活跃着的相互作用意义上来把握的法则。虽然批判的社会研究最初“是以当前的人的现实为研究目标的”^③，但它同时为了把现状看作是历史的生成物，就必须研究历史，研究历史未来的发展方向。

法兰克福学派形成和发展的时候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全面经济危机的时候。这场经济危机使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们感到惊恐。他们觉得出现了“存在”危机，出现了人的存在的危机，于是他们就转向“人的图象”，转向人本学，开始研究起人的问题来。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研究方向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问题，想找出所谓的人本学的、“普遍的人的”不可改变的本质特征，于是就求助于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们用弗洛伊德的一些概念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行为和关系，弗洛伊德的学说就这样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渊源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个理论渊源是生命哲学。生命哲学是一种反理性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潮。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受到过生命哲学的影响，如

① 《社会研究杂志》，第1卷，第1页，慕尼黑1970年重印版。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3页。

霍克海默尔受到过叔本华，阿多诺受到过尼采，马尔库塞受到过海德格尔，J. 哈泼马斯和 A. 施密特在认识论上受到过尼采的影响。此外生命哲学还通过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而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其结果是使法兰克福学派在主观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和生命哲学的自然观念之间作特殊的摆动，在对待客观现实问题上陷于矛盾境地。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个理论渊源是新黑格尔主义，是用生命哲学改造了的新版左派黑格尔主义。他们仿效卢卡奇，力图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黑格尔哲学的一种简单的结果。他们用新黑格尔主义的观点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部分，他们特别注意马克思在 1844—1845 年以前的著作。他们吸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论述，如关于流通和分配领域的论述，但却从不研究生产过程及存在于其中的阶级关系。他们认为阶级关系只存在于流通和分配领域，价值规律也只是这一领域的调节器。

法兰克福学派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正是希特勒法西斯猖獗之时，暴虐的反犹主义横行，连犹太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未能幸免。社会研究所集中了不少犹太人，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都出身于犹太人资产阶级家庭。研究所因此不能再在德国栖身，遂于 1931 年起逐步迁出，经瑞士、法国，最后于 1934 年到达美国，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迁伯克利，加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大战结束后，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等先后返回德国（马尔库塞仍留在美国），并于 1950 年开始重建社会研究所。1951 年新所建成，先由霍克海默尔任正所长，阿多诺任副所长。1959 年霍克海默尔退休后由阿多诺任所长。二次大战后，《社会研究杂志》没有复刊，但开始连续出版《法兰克福社会学丛刊》。这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已成长起来，其代表人物有哈泼马斯，施密特，O. 耐克特，A. 韦默尔和 H. 施耐特巴赫等人。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五、六十年代，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使社

会批判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憎恨和对所谓“斯大林主义”的疑惧，在美国这个最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经历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使法兰克福学派逐渐沾染上了悲观主义的思潮，并把斗争锋芒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更进一步求助于精神分析学说，把它看作是社会和文化的病理学。他们认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是善，而是恶，理论的因素是自由，论题是压迫。批判理论乃是关于受到启蒙桎梏的历史和社会的哲学，而启蒙正在变为神话，和已经演为专擅。^①

到了六十年代，西欧学生造反运动骤起。在新形势下，由于政见的不同和理论的异歧，法兰克福学派开始逐渐解体。霍克海默尔晚年政治上急剧右倾，完全沦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于1973年死于纽伦堡。阿多诺由于不支持造反运动，被新左派指为不革命，于1965年在郁郁不平中死去。唯有马尔库塞由于积极支持这场运动，为运动提供了成套的理论，成了新左派的精神领袖，被奉为“先知”，尊为“守护神”，于1979年从美国返回德国讲学时去世。第二代的主要代表哈泼马斯被新左派视为敌人，在争执中愤而离开了法兰克福大学。留在法兰克福的，较有名气的要数施密特，他被视为正统派，算是继承了学派的香火。其他一些主要人物或去或留，各奔东西。到了七十年代末，“法兰克福学派”实际上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我们编译的本书的主要作者就是晚年红得发紫的马尔库塞，他是原籍德国的美国著名哲学家，1898年7月19日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917—1919年间曾参加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属该党左翼。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期间，还一度是柏林—莱因

^① 参见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西德菲舍尔出版社1971年版，第195页等。

契根道夫士兵委员会成员。卢森堡被害后，因不满社会民主党的叛卖行为，退出了该党。以后先后在柏林大学和弗赖堡大学学哲学，是德国现象学哲学创始人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海德格尔的学生，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又在柏林当了六年书商和出版商。1929年返回弗赖堡，着手撰写申请讲课资格的论文——《黑格尔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但因与其导师海德格尔政见相左，不能获得通过，于是离开弗赖堡。1930年经胡塞尔请当时法兰克福大学董事K. 里茨勒做介绍人，推荐给了刚当上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的社会哲学家霍克海默尔，开始了他那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的生涯。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权，大肆推行反犹主义。马尔库塞也同霍克海默尔等人一样，不得不出亡国外，经瑞士、巴黎，最后于1934年到达美国，到后即任哥伦比亚大学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1940年转入华盛顿战略服务局，在那儿当了十年的研究员。1950年又任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处东欧科代科长。1951年重回哥伦比亚大学，在俄国研究所当研究员，同时在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工作。1954年转赴勃兰第斯大学，任政治学、哲学教授，还兼任巴黎高等实用工艺学校研究室主任。1967年起任哥伦比亚、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1979年应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之请到西德访问讲学，是年7月29日病逝于慕尼黑附近的施塔恩贝克。

马尔库塞的主要著作有：《理性和革命》（1941年），《爱欲和文明》（1955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1958年），《单向度的人》（1964年），《文化和社会》（1965年），《革命伦理学》（1966年），《否定》（1968年），《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1969年），《论解放》（1969年），《从富裕社会中解放出来》（1969年），《自由和历史使命》（1969年），以及本书所收的《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1956年）和《反革命和造反》（1972年）等。

黑格尔的辩证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尔库塞的主要思想源泉。马尔库塞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不同的地方是他试图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出发,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修正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学说在法兰克福学派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次他强调采取具体的政治行动,给本世纪六十年代西欧的学生运动和“新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成了他们的思想领袖。

本书收录的《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和《反革命和造反》是马尔库塞后期论著中较有代表性的两篇,它们着重分析了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晚期资本主义福利社会的问题。《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是他1956年在芝加哥对精神病治疗学会的一次讲演,他在这篇讲演中,着重借助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和术语,如“攻击性”,“本能压抑”,“补充压抑”和“性本能”等,试图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结构。首先,他探讨了“病态社会”的定义,然后再进一步研究这一定义是否适用于“富裕社会”,以及适用到多大程度。指出由于“富裕社会”的种种病症,结果对个人造成了种种紧张和负担。马尔库塞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他独特的精神分析方法,虽然也看出了当代工业社会的一些弊端——它的肆无忌惮、冷酷无情和不断攻击的特性,以及产生这些特性的几个根源,并且指出了这种社会的“自杀的倾向”,但是他却看不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无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

《反革命和造反》是马尔库塞根据他197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市社会研究新学院所作讲演的观点写成的一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马尔库塞从社会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对“解放”、“对抗力量”、“激进思想和行为”等概念作了分析,用他那独特的“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对六十年代西欧学生造反运动作了历史

的、理论的批判总结。认为这场运动超越了时代，蕴含着过激的因素：造反不但反对了资本主义的理性，而且也过激地反对了理性本身，表现形式则是把反对大学为统治集团培养干部的斗争，变为反对大学本身的斗争；把反对美学形式的斗争，变为反对艺术本身的斗争。他认为由于这两个领域是和现实异化了的，因此造反运动必然是“象牙塔式的”，即脱离群众的，甚至是受到群众敌视和反对的，而这又是由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物质需要得到了满足，生活水平有了提高，思想上被统治阶级同化，因而不想革命的缘故。但他因此竟认为，新左派不但由于其“独立思考”而使统治集团深感头疼，而且将始终是一支最进步的反对力量。马尔库塞在小册子中，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后资本主义的结构只能由一直在维持着劳动过程，构成这一过程的人的基础，及再生产这一过程的利润和权力的人才能加以改变，以及资本主义制造了它自己的掘墓人，但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些掘墓人竟不是工人阶级，而是有着“完全不同面目”的人。因此马尔库塞无视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和领导作用的观点并没有因六十年代的造反运动归于失败而有所改易，他仍把希望寄托在年青的激进左派身上。他在小册子中告诫他们：在力量薄弱，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在权力集中在统治集团手里的时候，在说话是合理，而行动是不合理的时候，必须强迫自己限制自己，应该学习，应该学会重新组织起来，重新制订策略，要经受得住漫长的教育过程的考验。

如果我们把这两篇文章结合起来读，那末我们可以发现：虽然马尔库塞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许多深刻的揭露，把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结合起来，作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其中也不乏独特的见解和精深的论述，但其思想的基本核心始终是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否正确地解决了自由与压迫的问题，社会主义是不是和过去实现了能带来自由的彻底决裂。而马尔库塞的回答是否定

的,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现存的旧世界批判得不够,否定得不够,而对于未来则空想得不够,对压迫和解放的问题并没有作出深刻的论述,并没有把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深入到对个体的讨论中去,因此必须用另一种形式的辩证法,即唯心主义的否定的辩证法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用对个人本能结构的分析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用弗洛伊德来“补充”马克思。因此他的基本立场是资产阶级的,是唯心主义的,尽管他的言辞是激进的,是否定资本主义的,但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毫无共同之处。

本书的前五篇文章系选自西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坎普出版社 1968 年出版的《工业社会的攻击和适应》(第 6 版)一书,除马尔库塞的《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外,还选收了该书的另外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的作者情况分别加注于每篇文章第一页的底下,故不在此赘述。这一组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将纯心理学的概念“攻击”和“适应”运用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用这两个概念来分析个人和集体的需要和强制及其相互冲突,来分析工业社会特定的行为方式及其一般的发展趋向。就它们各自的观点而言,也可以说是基本一致或十分相近的,或甚至可以说是马尔库塞一文观点的补充和发挥。第六篇文章系该出版社 1973 年出版的马尔库塞的小册子《反革命和造反》(第 2 版),原文为英文,我们是根据德译本转译的,德译本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施密特指导协助下翻译的,被称为“权威的译本”。在这本小册子中,马尔库塞仍旧将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三者结合起来,分析的也还是工业社会的问题,因此不但在方法论上和前五篇文章相一致,而且在内容和观点上也有着一定的联系。我们将它们合编为一书翻译出版,定名为《工业社会和新左派》。

本书在编译过程中,曾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郭官

仪和赵鑫珊等同志的指导帮助,特此致谢。

由于译者学识和文字水平有限,所选所译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译 者

1981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一、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美〕 H. 马尔库塞 (1)	
二、知识分子的阶级利益以及和统治集团的关系 ·····〔美〕 A. 拉波鲍特 (18)	
三、恐怖和政治淡漠的关系·····〔西德〕 K. 霍恩 (39)	
四、攻击性和暴力——威慑政策的论点 ·····〔西德〕 D. 森哈斯 (54)	
五、工业文明社会彻底人道化的可能性 ·····〔南〕 M. 马尔科维奇 (66)	
六、反革命和造反·····〔美〕 H. 马尔库塞 (79)	
致谢····· (79)	
第一章 面对着反革命的左派····· (80)	
第二章 自然和革命·····(127)	
第三章 艺术和革命·····(144)	
第四章 结论·····(185)	

一、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

〔美〕H. 马尔库塞

本文论述的是所谓“富裕社会”的紧张和负担。提出富裕社会这一概念(无论正确与否)是为了说明当代的美国社会。美国社会的典型标志是：一、工业技术力量的高度发达，这一力量大部分被用来生产和分配奢侈品，被用来玩乐，挥霍，“有计划地消费”日用品，和用到军事和半军事方面上去——换句话说，用到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通常所指称的“非生产”品和服务行业上去；二、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连非特权阶级也分享到了一部分好处；三、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政府不断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组织干预更促进了这一集中；四、科学和伪科学的研究，对个人和集团在工作和业余时间的行为的控制和操纵——对心理，无意识和下意识的行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了商业目的和政治目的，这些研究成果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所有这些都是互相联系着的：它们造成了由“富裕社会”的正常功能所表现出来的综合病症。本文不打算逐个地论述它们的相互关系，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一相互关系可以被用来论述这样一个论点：个人所承受的紧张和负担的根子不是个人的紊乱和病症，而是基于社会(和个人)的正常功能。

或许医生明白什么叫“正常功能”。当有机体不受干扰，并和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协调地工作时，它的功能就是正常的。当然，在人类各个成员之间，人的能力和可能性可能会有所不同；甚至连人类本身也随着历史的推移发生了不断的变化；但是所有这些变

化却都是在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基本上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的。医生在诊病时，当然要考虑到病人的环境，教育和职业；这些因素可以限定正常功能的定义及其范围，当然一般来说，它们总是使医生归于失败，然而作为范畴和目标，正常却总是一种清楚明了的说法。它和“健康”是一致的，各种各样的偏离就是得了不同程度的“疾病”。

精神病医生看问题就完全不同了。由于我们是从“正常”这种说法的最广义来理解它的，因此精神病学家，精神疗法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都同样可以使用这种说法。但是一当差别和我们的论题有关时，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些差别了。粗看起来，正常的一般定义和医生给它下的定义并无差异。精神(灵魂和肉体)的正常功能可以使个人的活动和他是一个孩子，是一个成人，是父亲或母亲；是未婚的或已婚的身分相符，可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工作、职业和地位相称。但是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一定义包含了属于一种全新范围的因素，即社会范围的因素。从社会的更本质的意义上来看，它主要是作为正常的一个因素，而不是作为外界影响的因素，因此，“正常”的基本含义主要指的是社会方面和结构方面的，而不是个人方面的。对于什么是消化系统的正常功能，肺和心的正常功能，也许能够很容易地取得一致；但是在爱情，憎恨，工作和业余，活动集会，高尔富球场，贫民区，监狱和军队中，什么叫正常功能？一个健康的董事和一个健康的工人或黑人，他们的消化系统和肺部的正常功能确实并无什么差别；但是他们精神的正常功能却完全可以有区别。是的，一个人可以和别人一样思想，感觉和行动，但他却可以是反常的。什么叫“正常”的爱，“正常”的家庭，“正常”的劳动？

精神病医生确实可以和(其他)医生一样去治病，用他的疗法想方设法使病人重新适应他的家庭，他的职业，他的环境，精神病

医生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影响环境因素，或者甚至是改变这些因素。然而他马上就计穷力竭了，例如病人的紧张和负担从根本上说不是由于他的职业，他的周围环境，他的社会地位的某种不利状况引起的，而是由职业，周围环境和社会地位的一般性质所引起的，在这三者的正常情况下引起的。

使病人在这方面正常，就是使这种紧张和负担正常化；或者说得干脆一点，就是使他进入这样的状况：他有病，并且把自己的病当作健康，而不是使这个自我感到健康和正常的他还注意到自己患有这种疾病。当他所从事的工作从本质上来说是“单调的”，无聊的，而且是多余的时候（尽管这一工作的收入可能是丰厚的，是“社会”必需的）就可能会出现上述状况；当有关人员属于一个和统治社会相比是非特权阶级的少数民族的时候，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很贫困，并因此专门从事低下“肮脏”的体力劳动的时候，也可能出现上述状况。同样的状况还可能出现在（尽管形式不同）另外一批人身上，即工业和政治的主人们的身上；获得成功和发财致富要求他们具有肆无忌惮，冷酷无情和不断攻击的特性，并把这种特性再生产出来。在上述这些状况中，“正常的”功能都可能导致对人的本质的歪曲和摧残——尽管对人的本质的特性所能下的定义已经相当狭窄。E. 弗洛姆写了一本健全的社会^①；从题目上看，就知道讲的是一个未来的社会，而相对的现存的社会则是有病的，不正常的，至于说到一个病态社会的公民，尽管他的举止态度在这种社会里是正常的，适当的和健康的，我们还是禁不住要问：难道这样的个人就没有病吗？难道这种状况就不要求对什么是精神健康持有异议吗？这种相反的看法所坚持（恪守）的那些精神特性，遭到了统治着病态社会的健康的禁止，限制或歪曲（例如，精神的健康意味着有能力作为一个局外人面活着，过着一种不合拍的

^① 《现代人及其前途》，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1年。

生活)。

我们首先想探讨一下“病态社会”的定义，然后再来研究这一定义是否适用于“富裕社会”，或究竟能适用到多大程度。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人的可能的状态和实际状态之间的鸿沟越大，我们称之为“补充压抑”的需要就越大，也就是说，不是有利于维护和发展文明，而是有利于使现在的社会继续存在下去的合法兴趣的本能压抑就越大。对个人来说，这一补充的本能压制和逼迫带来的是新的紧张和负担(即位于社会冲突的彼岸、居于社会冲突之上或社会冲突之下的紧张和负担)。一般地说，社会过程的正常功能就已保证了必要的适应和屈从(害怕失去工作或社会地位，害怕受到社会蔑视，等等)，用不着为了施加补充的心理压力而采取特殊的手段。但是，在现代的富裕社会里，在人的自由的现有的存在形式和能达到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所以，如果社会想要避免发生过分的不快，它就必须使个人进行有效的合作。这样，人的心理就不自觉地和自觉地接受和屈从于制度的控制和操纵。

这里要对我们分析的方法作几点说明。当我们讲到一个社会要继续存在就要有“必要的”补充压抑或要有有效的操纵和本能控制的时候，我们指的不是一种被认识到的必要性和一种有计划推行的政策：它们可能以这种形式出现(而且越来越以这种形式出现)，或者不以这种形式出现。我们指的是倾向——力量，人们可以通过对现存社会的分析来证明它们，而且尽管政治家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力量，它们还是表现了出来。它们反映了现存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机器的要求——经济的，技术的，政治的和精神的要

求，人民依附于这部机器，为了保证这部机器的不断运转，同时也是为了保证产生于这部机器的组织的那些社会关系的不断运转，这些要求就必须得到实现。这些客观的倾向在经济发展，工艺变化，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外交和内政上都反映了出来；它们在各个社会阶级，利益集团和政党中产生了共同的，超个人的需要和目的。在社会集体的正常条件之下，这些客观倾向赋予个人的利益和目的以一定的形式并吸收它们，而又不使社会遭致破裂。当然，特殊的利益不是简单地由一般的利益决定的，它有它自己的自由范围，并根据它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有助于一般的利益的定型。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的客观倾向是在个人“背后”实现的；这句话对今天的先进社会来说虽然适用，但有很大的局限性。对需要、满足和本能施行计划和管理，长期以来就是政治和商业的必然因素；这证明了在普遍的盲目性中有着明智性。

上面谈到的是在先进工业社会里对心理的系统操纵和控制。为什么要操纵和控制以及由谁来操纵和控制呢？〔控制的〕一般的客观目标是使个人和社会强加于他的生活方式相妥协，这一目标高于为了某些意图，为了政治目标和利益而进行的任何控制。由于强有力的补充压抑在这一妥协中发挥着作用，所以就必须有（个人必须买进或卖出的）商品，（个人必须利用或提供的）服务，（个人必须选举的）候选人，（个人必须享受的）娱乐，（个人必须拥有的）地位象征的充分自由作为缓冲——一种带强制性的必要性，因为社会的存在是依赖于这些商品的不断生产和消费的。换句话说，社会的需要和政治的需要必须变为个人的本能的需要。在社会的生产力没有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就无法维持下去的情况下，这些需要就必须标准化，协调化和普及化。当然这些控制并不是阴谋的结果，不是由某个当局操纵的（尽管中央集权的趋势在增长）；相反，控制分散在全社会，（在不同程度上）是由邻里，由“社会地位相

同的人组成的团体”，由宣传工具，由集团和政府来进行的。当然，有效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经济，特别是通过社会学和心理学来实现的：控制作为工业—社会学和工业—心理学，或者说得婉转一点，作为“人的关系的科学”，成了统治势力手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这些简短的说明表明，社会渗入心理已有多深，心理的健康和正常在多大程度上已不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社会的事情了。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可能会有所进展，如果社会创造条件使自由，和平和幸福的现有可能性化为现实的话，就是说，如果创造条件把性欲，生活本能从破坏本能的优势中解放出来的话。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那末健康的正常的个人就会具有一切特性，使自己和同一社会的同样正常的其他个人和睦相处，而正是这些特性是测量压制，测量受到摧残的人的本质的存在的尺子，人的这种受到摧残的本质使人安于自己受到的压制，安于生活本能受到的压抑及不再具有攻击性。这样产生的紧张用个人—心理学，或个人—治疗，或其他任何一种心理学都是无法解除的——只能用政治方法才能解除：把社会作为需要的体系加以反对。当然，治疗能揭露这种情况，而且为这样一场斗争准备心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病治疗就可能是一种破坏性的行为……

现在的问题是，本能管理的社会压力在当代美国社会是否会产生阻碍生活本能的发挥，并且使攻击本能成为越发强烈的消极条件呢？如果社会压力是从这个社会的结构中产生的，如果这种社会压力在社会成员中唤起需要和满足，而这些需要和满足本能地再产生压抑的话，那末，对这一问题的答复应该是肯定的。

粗看起来，这个社会的社会压力和任何其他一个在强大的工艺变动的作用下发展着的社会的社会压力颇为相似，它推动着新的需要，推动着工作和业余的新形式的形成，并因此渗透到整个社会关系中去，导致对一切价值进行一次全面的重新估价。当前的

工艺发展在质量和数量上改变着现存的社会条件和关系，因为体力劳动越来越不需要了，甚至于越来越不经济了，因为连职员的工作也越来越“自动化”了，管理人员和政治家的工作也越来越成问题了，因而随着生存斗争越发成为不必要的必要性，作为生存斗争的社会存在的传统内容和意义也就越发贫乏，毫无意义。但是，未来的选择是：异化劳动的可能废除会作为“幽灵”而出现；事实上，如果把这一选择设想成进步，设想成现存社会的发展，那末，生活就会叫人难以忍受，就会变成甚至是最富有妄想力和自由活动：在愈来愈小的范围内进行笨重的，翻来覆去的有组织的劳动，有管制的自由，有管制的创造活动。

然而，用“自动化的幽灵”进行威胁却是一种思想意识。一方面，这种思想意识有助于维护和再生产寄生的，因为从技术上来说是不必要的劳动和工作（失业作为正常现象比粗笨劳动更糟糕）；另一方面，它又有助于培养对业余时间进行组织和管理的人才，就是说，延续和扩大控制。对于现存的制度来说，真正的危险不是异化劳动（失业）的废除，而是非异化劳动（社会劳动）的可能性，即非异化劳动的必要性（城市的全面新建；人的私有住宅和设施的重建；在消除了对大自然的商业暴行后对环境的改造；满足生存斗争需要的救济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建设；所有这些都还可以使人们忙上一个世纪）。但是，在发生这些变化的过程中，主宰社会的利益就可能得不到发展，换言之，可能导致限制私人企业，废除市场经济，废除经常的备战政策和军事干涉政策，代之以东西方合作以及富国和穷国的合作。这种发展趋势是决不会停顿下来的，技术进步的新的、异常有效的和全部的手段，暂时把人们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组织起来反对这种可能性；他们必须把耗费精力的，落后的生存斗争进行下去，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再生产出自我压抑。

这样，我们就碰上了由社会结构转化为个人心理结构的真正矛盾。这一矛盾唤起和增强了破坏性的趋势，社会可以在个人的私人行为和政治行为中几乎不用升华的方式来利用这些趋势——并因此可以在全民族的行为中利用它们。破坏能量变成社会可用能量，攻击的冲动滋养着进步：经济的、政治的和技术的进步。在现代科学企业中，在商业企业中，和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中，建设性和破坏性推动着商品的生产 and 消灭，有助于生和死；生育和杀戮是不可分地互相联系着的。例如，限制原子能的利用，同时就缩减了它的和平力量和军事力量；改善和保证我们的生活条件只是为毁灭生命效劳的科学的副产品；如果减少出生率，那末同时就减少了所期望的劳动力和所期望的顾主。这样，破坏能量向社会可用的攻击能量和因而向建设能量的——多多少少升华的——变动，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我们的观点和他的本能学说有关），是一个正常的必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这样一种动力学的一部分，这种动力学迫使性本能和死的本能这两个敌对的冲动成为一个统一体，而且在两者相辅相反的作用中成为推动文明前进的精神的和生理的力量。但是，它们可能达成如此紧密的和有效的联系，它们各自的特性保持不变，而且互相对立着：攻击本能不管一切升华“追求”死亡，而性本能却追求维持生命，保护生命和延长生命。结果是破坏本能只能在它为性本能效劳时才对文明和个人有用；如果攻击趋向变得比它的由性本能决定的对立面更强大，那末倾向就会逆转。因为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如果不削减性本能的话，破坏能就不可能增强。本能动力学是机械主义的，能量的现有量是在这两个基本本能之间进行分配的。

我们在上面简略地回顾了弗洛伊德学说的有关部分，知道了它们对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颇有意义的，该问题就是：“富裕社会”

的社会压力究竟具有多深的影响和什么样的特性？我们认为，这一压力来自一对基本矛盾：一方面是这个社会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的目标，基本上说来是寻求新型的自由，而且威胁着要摧毁固有的秩序），另一方面是反动地使用这些可能性。这对矛盾暴露出来，同时，将在社会的现有的攻击趋向中得到“解决”和“取消”；这个社会最突出的（而且决不是孤立的）标志是军事动员及其对个人心理活动的影响。产生攻击性的根源有很多（而且攻击性与这个基本矛盾是有关的），最主要的有：

一、生产和消费过程的非人道化。技术进步等于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消了个人在创造财富和服务时作出决定的自由爱好和自主的需要。劳动和休息的体制除了再生产以外还有利于秩序的建立，但是，如果用现有的技术和智力可能性来衡量，那末，这个体制是寄生的，奢侈的，不人道的；当现有的方法和技术成就被用来把人们从这种体制中解放出来的时候，这种非人道化的倾向就具有解放性的作用。当这一倾向有助于使这种劳动和休息永久化的时候，它就变为压抑。这时所产生的失败就表现为彻头彻尾的敌对情绪。

二、拥挤不堪，噪噪杂杂和无可奈何地凑合在一起，是人海社会的特征。这种情况促使人们渴求“安静、隐居、独立、主动和行动自由”，而这一需要和“矫揉造作式奢侈需求”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它是“真正的生物学上的必需”（R.杜波语）。缺乏这些东西会使本能结构受到损害。弗洛伊德指出了性本能的“非社会性”——人海社会的“社会团体过多”，个人对于过多的社会团体的反应是“各种各样的拒绝，推开，攻击和害怕，这些不久都发展为真正的神经官能症”。我们把富裕社会的军事化看作为攻击倾向的最突出的社会动员。这一动员远不只局限于征集义务兵和建设军火工业，它的真正的全貌在向“公众提供精神食粮”的宣传中暴露无遗。语言

和图片的堕落,对死亡的描绘,新殖民主义屠杀的牺牲品被焚毁和毒死,都以俗不可耐的,真伪混杂的,有时甚至是以幽默的风格加以报导,这种文体不但被用来报导穷凶极恶的屠杀,也被用来报导青年刑事犯罪案件、足球比赛,意外事故,交易所消息和天气报告等等。这已不再是对为了民族利益而杀戮的“古典式”颂扬,而是杀戮成了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和偶然事件了。

结果是恐惧的正常化,“心理上对战争习以为常”,战争是强加在人民头上的,由于对战争习以为常,人民很快就熟悉了“死亡数”,就象他们早已对其它“数字”(营业额,交通事故伤亡数和失业人数)十分熟悉一样。人们要学会忍受“越南战争中的意外事故,恐怖事件,不断上升的死亡率,就象他们慢慢地学会了忍受日常生活中由吸烟、烟雾和交通造成的意外事故和死亡事件一样”^①。大量发行的日报和画报上的照片五光十色,上面是一队队俘虏,他们受到“审问”,或被捆绑着躺在地上,照片上有孩子们,他们被淹没在坦克扬起的尘埃中,有缺胳膊断腿的妇女——这一切一点也不新鲜(“战争就会有这种事情”),区别是它们登在什么地方。这些照片在普通栏目中出现,和广告,体育以及地方政治事件和消息全都登在一起,而权力的残暴性更被说成是正常的,其手法是把心爱的汽车开来作辩解:既然制造商在销售小型节油汽车,那末石油工业只好在“油老虎——坦克”身上找出路。

严谨的语言,讲究词汇之间要有严格的区别:憎恨、愤怒和诽谤这些特殊的词应该用在敌人和反对侵略政策的那些人的身上。范例始终如此。学生示威反对战争,他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① I. 齐弗尔斯坦,见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熊先生日报》,1966年3月24日。参见 M. 格罗扬:《现代电视使用的无意识和象征性手法》(《社会心理分析研究》,第3卷,第356—357页);《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防止核战争》,精神病学促进小组,纽约1964年,该文曾多次被引用。

“下流放肆的长胡子的律师”，“未成年人，斗殴者和流浪汉”使这群乌合之众声势更壮，当“市民们集合起来举行反示威的时候，这些人故意惹事生非，把街头搞得个乌七八糟”。在越南发生了对抗美国人“战略作战”的“典型的强盗的共产主义暴行”；红色分子“从背后偷袭”（很明显他们的行动是必然的，因为他们事先就宣布要发动攻击）；越共在“深更半夜”袭击美国兵营，打死美国“青年”（看来美国人只在大白天进攻，不打扰敌人睡觉，而且也不杀死越南“青年”）。（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遭到大屠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对方可资比较的“死亡数”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美军驻在东亚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思想上”的威胁，而如果中国军队驻在中南美对美国来说，就决不只是在思想上的威胁了，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了。

语言的滥用，依据的是奥威尔的对立同一法：敌人嘴里的和平就是战争，保卫就是进攻，那末在正义这一方，逐步升级就是克制，地毯式轰炸为的是制造和平。以这样不同的观点来使用语言，结果是语言从一开始就给敌人打上了他是恶棍的印记，他的一切行动和计划都是凶狠残忍的。

这种攻击性的动员，只用共产主义危险性的大小是解释不了的，所谓的敌人的面目被歪曲了，和现实不成比例地被歪曲了，之所以会这样，归根到底是为了继续稳定和巩固一个受到它自身的不合理性威胁的制度；它的不稳定的基础威胁着它，其健康幸福就设立在这个基础上；它的非人道化威胁着它，其奢侈和寄生虫似的富裕驱使它非人道化。无意义的战争就是这个不合理性的一部分，因而是属于这个制度的本质的。这在开始时，只是一件小小的无意纠纷，一件外交上的偶然事件，到后来竟变成了对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打击力量和威望的试金石。投入战争的几十亿美金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是一种刺激（或一付药剂）；一种有效的方法，为

的是吸收一部分过剩经济和使人们不至失业。在越南的失败很可能成为本国毗邻地区爆发其它解放战争的信号，也许甚至是本国发生暴乱的信号。

当然，攻击性的社会可用性属于文明的历史结构，而且曾经是推动进步的力量。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出现了量的骤变时期，两个原始本能之间的平衡向着有利于破坏方面转移。我们提到过“自动化的幽灵”，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在人的机体用不着再作为劳动器械以前，自动化幽灵就是劳动的可能人道化的幽灵。必要劳动力的纯数量的减少，威胁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维持（同样也威胁着其他一切剥削的生产方式）。制度对此作出反应，它加快生产商品和发展服务行业，一般地说它们是不利于个人消费的，或者是以奢侈品的形式来供给个人消费的——奢侈品面临的是持续贫困，但是为了使劳动力有事可做却是不可缺少的，而劳动力是现存的经济和政治机构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当这种劳动成为多余的，无意义的，不必要的，同时它对于维持生计却又是必要的，这时，挫折失败成了这个社会的实际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把攻击积累起来。当攻击深入到社会结构中时，公民们的心理结构就要加以适应；个人变得更富攻击性，同时更加随遇而安和易于驾驭，因为他屈从于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凭借自己的富裕和权力，管理和满足个人的最强烈的本能需要。这种破坏心灵在议员们身上得到了赤裸裸的反映。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乔治亚州的拉塞尔对于这一事实大为愕然，他说道：“当人们准备破坏时，总有一种东西促使他们随随便便地付出金钱，就好象他们为了建设的目的而工作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明白；但在我当参议员的三十年中，我看到，在购买屠杀和破坏武器时，购买毁灭城市、摧毁运输道路的武器时，总有什么东西诱使人们慷慨解囊，而在要为人民建设

象样的住宅或保健设施时他们却算了又算。”^①

对于如何确定某个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攻击性以及怎样才能进行历史性的比较，这个问题我已在别处^②讨论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我想谈的是其他方面，即特殊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今天攻击业已开始，并且得以心满意足了。

我们可以把新形式和传统形式之间最突出，最主要的区别称之为工艺的攻击和满足。我们可以用三言两语来描述一下这种现象：攻击行为从物质上来说是由十分自动化的机械产生的，这个机械比开动它，维持它的运转和决定它的目标的人要强大得多。最极端的现象是火箭；最普通的例于是汽车。这里使之开动起来和被消耗的力量是“事物”的机械能、电能和核能，而不是和人的本能相连的能。这时攻击马上从主体转到客体，或者至少是由客体作为媒介的，这时，不是由人而是由客体来破坏目标。在人的能和物质的能的关系中，在攻击（人不是由于他的生理能力，而是由于他的心理能力，而成为攻击的主体和仆人）的客体部分和主体部分的关系中发生的这种变化也改变了心理动力学。过程的内在逻辑使得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的假设：随着毁灭“转移”到一个多少有点自动化的事物，一堆事物或事物的体系身上，人的主体的本能满足必然就要中断，遭到挫折，被“超升华”。这种挫折迫切要求重演和变本加厉：更猛的暴力，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范围。随之而来的是个人责任，良心，过失感和内疚的削弱：我不是作为（道德上和体力上）行为的人干了这件事情的，而是机器干的。“机器”——这个词表明，人的本质的器械可以代替机械的器械：官僚，管理，政党或集

① 《民族周刊》，1962年8月25日，第65—66页，引自W. 普罗克斯迈尔参议员的文章。

② 《单向度的人》，波士顿，1964年。

因是负责人；我作为个人只是工具。从伦理的观点来看，一个工具一般地是没有责任和过失的。攻击在漫长的暴力的训练过程中建立了文明，而这时它的界限就可能被打破。但是，这样连富裕社会的扩大再生产也可能受害于宿命的心理辩证法，这个辩证法汇入经济和政治的动力学，而且推动它前进，攻击变得越有力和越工艺化，它就越不能满足和抚慰原始的冲动，它就越强烈地要求重复，强化和升级。

确实，攻击工具的使用和文明本身一样悠久，但是攻击的工艺形式和原始形式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不仅是量的区别（即后者比较弱）；后者也要求人体较之攻击的自动的或半自动的机器作出更大的努力，更全力以赴地参加进去。刀，这个“粗笨的工具”以及手枪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个人的“部分”，个人使用它们，而它们使这个个人和他的目标有更密切的关系。刀，枪造成的人的牺牲品是看得到的；轰炸机和火箭的牺牲品却避开了行为者的知觉。

工艺攻击使心理动力学发挥作用，这种动力学增强了清教徒式心理状态的破坏倾向和反性本能的倾向。攻击的新形式进行毁灭，而人不必弄脏双手，不必玷污肉体，不必加重精神负担。杀人犯还是干干净净的——从生理上和精神上来说都是如此。如果杀人犯出于民族利益为了反对民族的敌人进行屠杀，屠杀的纯洁性就得到了加倍的证明。1966年1月《现代》杂志的（不署名）社论把越南战争和清教徒式的传统联系起来。敌人的形象和令人恶心的垃圾的形象是同一的；密密丛林是他的很好的家园，砍头和挖心肝是他的固有的行为方式，因此烧毁他的住处，使丛林的叶子落光，使他的食品成为毒药，这一切不但是一项战略行动，而且也是一项道德行为：消灭传染疾病的垃圾，为政治卫生和法治的制度扫清道路。良知大规模地扫除最后的合理障碍，最终使理性麻木不仁，一点也不想奋起反抗疯狂，组织和保卫犯罪行为的道德家们，

是听不到任何讥讽嘲笑的。因此、当世界上最富强先进的国家把它的技术优势所具有的破坏力施加到世界上最贫弱可怜的国家的身上,从而完成它的客观上的历史功绩时,那些道德家可以公开夸耀犯罪是“我们民族史上最伟大的事业”,而不受到众人的嘲笑。

个别人的有罪感和责任心的减弱,以及有罪感和责任心被主宰一切的技术机器和政治机器所吸收,也削弱了能够阻止和升华攻击本能的其它价值。尽管社会的军事化仍是这一发展的最突出的和破坏性最强的标志,但是,这一发展在文化领域的不太显眼的的作用却是不能不提一下的。作用之一涉及真理的概念和价值。舆论工具看来根本不对真理负责,而且使用的是特殊的方式。不能简单地说舆论工具是在撒谎(“撒谎”是以对真理负责为条件的);而应该说,舆论工具把真理和半真理同发挥,事实报导同评论,通讯同广告宣传混在一起,所有这一切被编辑加工成暗示性的文章。编辑感到讨厌的真理——而有多少重要的真理是不使人讨厌的呢?——被塞进字里行间,和荒谬、诙谐,以及所谓的“人类趣味故事”编排在一起。而消费者乐意买这种商品——消费者常常是在与自己的良好愿望相反的情况下来买这种商品的,而且因为想要好好地了解一下情况也是很难的,更何况对真理负责始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是受到很严厉的限制,就是受到压制。但正是在攻击者的普遍的民主的振兴中,真理概念价值的降低获得了特别的意义。因为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只有当真理有助于保护和改善生活的时候,当真理成为人和自然以及人和自身的斗争(和他自己的弱点,和他自己的破坏本能作斗争)中的主要线索时,它才是一种价值,这样,真理就属于升华了的性本能的范围,属于知识的范围,而知识已经变成了有责任的和主动的,它的目的是取消人对还没有受到控制的,压抑(人的)力量的依赖。鉴于真理的这一保护和解救作用,随着它的价值的降低,它对破坏的进一步有效限制就

被取消了。

攻击进入生活本能的领域，使大自然越来越屈从于商业组织。商业和劳动彼岸的景色，城市和把城市连结起来的高速公路彼岸的景色，不再是一个他物——不再具有质的差异。景色本来可以是性本能的天然空间：安宁，幸福和美的感官世界；避开和抵挡资本的权力，避开和抵挡交换价值的权力；没有价值作用的世界——一句话，就是心满意足。作为从社会功能中获得自由的空间，作为企求孑然一身的空间，大自然是性本能可以达到的范围：感官美的范围，与受管理的普遍性相矛盾的无用性的范围。这样，作为性本能尺度的美学尺度乃是生物学需要的尺度，生活本能的尺度。商业扩张和商业人员的暴行污毁了大自然，压抑了富有生命力的性本能的浪漫梦想。^①

在“富裕社会”里，补充压抑不但以无可置疑的正常的现象出现，而且也在远离攻击的经常的公开表现形式的范围内出现。这里我们还要提一下群众性广告宣传的文风，典型的做法就是不断重复：不厌其烦地用同样的文字或同样的图片做同一种广告；通讯员和评论员们叨叨不休地散布着同一种陈词滥调；政治家们翻来覆去地宣布自己政党的立场和纲领。弗洛伊德根据对“反复强制”的分析，提出了死亡本能的假设：在死亡本能中他看到了对彻底安宁和扬弃内心紧张的追求，回到母体和回到虚无中去的追求。希特勒十分明白重复的特殊功能：弥天大谎重复多次就会被信以为真。但是，在全然违背真理的情况下，不断重复对于多多少少被吸引住的听众来说能起到破坏性的作用：它摧毁精神的自主，智慧和责任心，诱致惰性，顺从，紧张松弛而得到的舒适感，以及对于洗心革面的劝说无动于衷。掌管重复的现存社会则成了它

^① 参见我的著作：《爱欲和文明》，波士顿，1954年；德译本：《本能结构和社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5年。

的公民们的一所宽敞的避难所。当然，在通向惰性和通向减少内心紧张道路的尽头，并不是最后的心满意足：这条道路并不通向满足本能的涅槃。但是，它减少了知性的负担和由于自主思想而带来的艰辛和紧张——这样看来，重复的政策就成为对具有批判的，扰乱社会的功能的积极精神的有效攻击。

我们对于“富裕社会”所具有的攻击特性的几个最主要论点进行了分析。在多数情况下，这涉及到社会有用的破坏性。这种破坏性越强，作用范围越大，其作用也就越发可悲。即使如此，它也没有得到升华和满足。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破坏本能所追求的是毁灭个人的生命，而不惜先毁灭其他生命和目标，如果这一理论是对的，那末，我们在实际上就可以说，这个社会具有一种自杀的倾向，而且我们可以在个人的本能结构里找到彻底毁灭全球这场游戏的根子。

二、知识分子的阶级利益以及和统治集团的关系

〔美〕A.拉波鲍特*

马克思主义者把“阶级觉悟”这个概念当作一种工具，他们也许会讥笑知识分子是代表了一个新兴的社会阶级的思想。他们认为这种思想可能不符合传统的按经济利益来划分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还认为，每一个上升的阶级的任务是在战胜了原先的统治阶级之后，按照自身的利益来组织社会。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一任务赋予工业无产阶级，并认为，只有它才能胜任这一任务。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期望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赞同。我们可以根据这一思想所结出的成果来评价它。但是，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阶级利益这一概念就是从这一理论推导出来的——对我们的思想作一番考察，也将是颇为有益的，特别是由于本文的作者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急进派，文章中有些观点是针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有些观点则是针对知识分子中反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派的。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深奥的观点和刻板的教条的少有的杂烩。当这种理论是在研究第一次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后果时，它是有着牢靠的基础的。新大陆的发现，使欧洲的经济财富迅速地增长，这一增长和殖民国家的建立十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权力和威望的发展。众所周知，这种新兴阶级的经济利益就是要铲除封建

* A.拉波鲍特(Anatol Rapoport), 1911年生于俄国, 现为美国密执安大学心理健康研究所的数学和实验心理学教授。——译者注

主义。而且,由于它的政治影响的增长,资产阶级还点燃了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工会和建立在工人运动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增加,就是这场斗争的标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适用范围看来也就那么大。而下一个历史阶段看来驳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尽管在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趋向还在继续着,但是,“群众”并没有变得贫穷;相反,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继续提高。中产阶级并没有消失,相反,工人(蓝领)的人数比职员(白领)的人数相对地在下降。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在衰退,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关心的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主要的政治目标了,而在那些宣布马克思主义所曾预言过的社会革命已彻底胜利的国家里,社会斗争却并没有消失。

在这些矛盾中我看到了以下三种可能性:

一、人们可以象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样否认事实,顽固地认为这种学说是正确的;

二、人们可以象反马克思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宣布这种理论失败了;

三、这个理论中经受了暴风雨考验的那些观点可以保留,而另一些经不起考验的观点就应该抛弃或修正。

第一种可能性的出现并不是不可能的。人们只需弄清楚,某些人对“正确的学说”是怎样理解的。对一个马列主义者来说,“正确的学说”不仅要解释现实,而且要能使他改造现实,根据这种含义,马列主义者把他们的理论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武器”。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相信这种理论的正确性,并被这种理论指导去进行社会革命。因此,对马列主义者来说,理论是一种自由的自我确定的东西:只要接受了它,它就是正确的,这就颠倒了鉴别一种科学理论的正确性的普通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并不一定是错误的——因为一种科学理论只有在证明了它的正确性以后才应该被

接受。

第二种可能性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它对一切哲学思维所推导出来的理论都持怀疑态度的人有吸引力，它也能吸引那些对一种理论的政治摆动感到厌恶的人，在美国，实用主义的传统习惯使人易于采取上述两种态度。对一个实用主义者来说，一种科学理论的可用性就在于看它能否直接被用来证明某种设想，他对理论没有耐心，而理论的主要目的则是要对事实作全面的解释；这就是说，看来他不会去评价一种自认为重新确定了事实的理论的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科学的重点被移到了个别的经验的研究上，而不是对社会结构作总的解释和对社会发展的过程进行推理。马克思主义学说遭到大多数美国社会学家的激烈反对，其原因很简单，部分就是出于嫌恶之心，他们不愿意考虑自己兴趣范围之外的东西。无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的结合促使人们采取这种态度。有一种观点认为，经理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就就是对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的主要定义的批驳，从专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言遭到破产这一方面来看，这种观点是恰如其份的，理智的。因此，人们可以断然地否定马克思主义，而同时又保护它的良好动机和理智的完整性。因此，许多美国社会理论家常常把非意识形态的政治说成是“美国的道路”，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对这种政治加以描述（引证了许多明显的事实），而且是为了进行辩护。他们认为不是意识形态争论，而是贸易买卖，才是政治的基础。思想意识的反对者也认为，具体而确切的赢利——不是对社会新秩序的政治影响——才是政治商业的唯一目标。简而言之，思想意识的反对者宣称，政治也是按照市场规律来进行的，选票起的是金钱的作用；你可以用选票买进工作场所，合同，投资，法律，自己中意的候选人，这就是政治为你创造的一切。

S. I 哈耶卡瓦^①通过对瓦茨事件的分析,表明了这种观点,他在分析中指出了美国加利福尼亚最新的政治局势:“在美国,权力始终是有限的,被割裂的,权力是由各政党的联合和联盟,由经济利益集团,教会,社团,少数人的联合来行使的。新左派的领导人有权对权力和义务采取回避态度,他们避免达成联合和联盟;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是‘低三下四’和‘自己出卖自己’。他们思想意识的纯洁性使他们用尽心机来表达他们的道德愤怒,而不是忙于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去进行一些具体的讨论,讨论工作,好一点的学校,住房建设和政治援助。从‘新左派’那儿,黑人什么也得不到:金钱,影响,工作,好一点的学校,住房,政治状况的改善,一点儿都得不到。少数民族,包括瓦茨的黑人在内,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两大政党的强大的中间派身上,寄托在那些既不沉醉过去,也不梦幻未来,而是正视现实的人的身上,寄托在那些继承了美国生活中健全的理智的实用主义的调和妥协传统的那些人身上。为了能共同生活在和平和进步之中,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采取调和妥协的态度”。

上面提到的美国政治中的反思想意识的因素是以这样一种观点为基础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调和始终是可能的。哈耶卡瓦对这种观点作了解释。他的论文中有一章的标题是:“论文假设:调和是可能的”。正象马克思主义的公理——“阶级斗争必须持续到资本主义消灭为止”那样,哈耶卡瓦的论点也是不容人争辩的,因为正象反对这一论点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这一论点也隐含着一种命令:不管怎么样,都得按这个论点来办,要把这一假说当作正确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一样,哈耶卡瓦的论点也有先知的趋向。这并不是说,只要人们费尽心机来捍卫它,它就将是正确的。

^① S. 哈耶卡瓦和 B. 戈德菲特:《瓦茨访问记》,见《普通语文学评论》,第23卷,第3期(1966年),第305页。

只有对它深信无疑，它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人们可以补充一点：如果有足够多的有影响的人信奉它的话，它就显得更加正确。信奉一种带有先知先觉成分的学说，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认识问题，而是一种政治行动。这就是说：理智地证明应该赞同或反对这样一个定义并不是接受或者抛弃这一定义的唯一的原因。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从有争议的学说的正确的或错误的结论中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好处。

偏向于认为“调和是可能的”这一假设，这从道德的原因来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要维护这个假设，就得作进一步的假设：要么是争执着的各政党互相共存，要么置对手于死地或同归于尽。意识形态的反对者一直是从这一前提出发的——即各集团把各自不同的利益看作为政治的内容——如果社会机器要继续保持运转的话，就必须继续共存下去。人们并习惯于把一种类似的理由运用到共产主义世界和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共存上去：一场旨在消灭对方的战争对胜利者来说也是极为可悲的。

然而，如果有人不承认共存的观点，他也可以反对调和是可能的说法。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我们中有一些人肯定急于想“调和到这样的程度”：甚至和有组织的罪犯集团“联合”，尽管这种“联合”要使他们这些主张者付出相当高的经济代价。但是，这一联合并不会因为反对罪犯集团花费了金钱而成为一种社会灾难，而是由于社会的堕落：流氓横行，腐朽没落而威信扫地。

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和这些人一样相信，如果和希特勒达成“好一点的调和”的话，纳粹德国的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避免无谓的牺牲的唯一途径就是摧毁德国的战争机器和纳粹的党组织。我们可能是错的，我们不知道，在波兰等国被占领以后，如果还坚持认为“调和是可能的”，那将发生什么情况；例如，牺牲者的数字，或者其他数字，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的代价等等。而且，我

们甚至有这样的印象：盟国的“胜利”所带来的问题比德国所造成的问题要严重得多，尽管如此，回顾往事，人们还是认为，和希特勒联合这种可能性是不可取的。

我举这些例子，为的是说明接受和反对共处的论断这两种立场在不同的情况下都是可取的，同时，功利主义并不永远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正确准则。

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坚持拒绝在今天的全球性冲突中可以共处，并且用僵化的空话来强调他们的立场。美国的极右份子也用同样的措辞否定共处。我反对这两种极端的政策，因为我认为共处是可能的，但我想补充一点，即我的希望是出于道德的信念，而不是根据对事实的分析或者对前景的展望。换句话说，我的希望是由于我相信争执着的各政党必须互相对话，而不是认为它们可能会能够或者愿意对话。

似乎中国人和美国的极端保守派正在按照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学说把历史推向极点，推向对峙和最终消除对立那个方面去，而人们很乐意从这种理论所隐含的结局出发；例如：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后（或者在消灭了共产主义后）由于没有了矛盾而停止（或者全世界都自由了）。如果人们把结局放在一边先不谈，那么就可以发现，随着焦点的特殊的改变在过去几十年中，马列主义学说的两个论点或多或少变得清楚了：

一、如果我们不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而是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来观察有产者一方，和无产者那一方之间的鸿沟的话，就会发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在最近的历史阶段内有着最重要的意义。

二、有产阶级的领导人可能利用他们能掌握的一切权力——而且不惜一切代价——来防止权力受到限制。

我再重复一遍：看来这两种观点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最终

已站不住脚了。在工业社会里，劳动阶级和有产阶级之间的差别在消失，而不是在扩大。后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没有马列主义模式的那种社会革命的德行，也发生了本质性的社会变化。在许多国家里，工人阶级成了重要的同盟者或者至少变成了决定国家命运的助手。

从全球关系来看，问题确实不一样。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至少一个富国的统治阶级势必会在世界各地用暴力来镇压任何它所不满的社会改革——这样做纯粹是从为了不惜一切代价以保持自己的优势这样一个战略考虑出发的。

基于上述事实，就不一定要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提供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那些有生命力的概念重新确定我们时代的关系和要求的某种可能性。社会阶级，阶级利益和思想意识这些概念是有生命力的，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社会学思想中。同时，我们也想保留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思想：阶级利益决定思想意识。但是，我们对阶级觉悟无例外地是由经济条件所决定的这个论断则不能接受，因为换种情况时，我们就几乎无法解释，例如为什么美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丝毫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只要看一下美国工人的“阶级觉悟”是不高的，思想跳不出圈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事实上，在美国存在着深刻的思想意识的分歧，然而这些分歧和经济阶级并无关系。至少存在着象哈耶卡瓦所提到过的三种思想：一种是留恋过去，另一种是梦幻未来，第三种是正视“现实”（我在“现实”这个字上加上引号，因为对现实的评价不仅仅取决于人们观察事件后产生的“思想”，而且还取决于为了观察而选中的事件本身）。

这三种思想意识中的任何一种都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留恋过去的思想意识，反映在极右派的政策中。哈耶卡瓦所代表的思想体系——即我们所说的第三种思想通常被视为“主流派”，依我看，这种思想的明显特征就是趋向于把人卷入急流中去。“梦幻未来”的思想意识热衷于组织不同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运动，新左派也属于这种思想意识，而且更狂热。我把它们统称为新左派。必须提一下，这三种观点是真正的思想意识上的差异，而不仅仅是纲领形式的不同，我认为，两个互相“敌对”的集团，即右翼和左翼中的任何一个集团的领导人，在赋予他们以“权力职责”之后，就会被迫放弃真正激进的纲领，这是极为可能的。事实上，这些“政治现实性”也不过是使上面提到过的政治纲领只是显得互有不同而已。新左派不赞成工业社会主义化；极端保守派——除了狂人集团外——并不要求消灭工会。确切一点说，主要由于思想意识上（其次才是政纲）的原因使这些集团相互疏远到如果是可能妥协的话，也很难妥协的地步。

此外，一种思想意识包含有现实性的定义，人的存在的概念和对正确还是不正确的信念。要理解这些东西，比在特定的具体情况下去行动要困难得多。

“主流派”对思想意识的估价很低，因为——按他们正确的说法——对思想意识的细节进行论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主流派”的追随者们看来，政治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也许还是最后的一着）。只有当价值制度存在时，问题的解决才是有意义的；而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问题才能按照达到所追求的目标的手段来加以解决；或者通过对共同取得的财富进行合理的分配来解决。如果价值制度本身都成问题，那末，解决问题不仅仅是浪费时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多余的。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来看看。不久前，种族隔离分子经过很大的努力表示准备——当然是按他

们的方式——要实行几乎完全的“平等”。说句公道话，这比原则上取消种族隔离是更现实的要求。因为黑人学校的卫生条件和健康状况是一种直接可以看到的“现实”，人们可以做一点具体的工作来改善这种状况。而废除隔离纲领规定的种族隔离，在意识形态上虽然是进步的，但由于立法或技术措施的原因这种隔离却又是无法改变和无法废除的。可是，我们也晓得，无论是学校的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草地，还是镀铬和瓷砖厕所都无法阻挡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这些斗争针对的是基本法而不是由此产生的后果。

再举一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领袖统治在它的全盛时期，在美国高级政治中所带来的“积极成果”，政治领袖用完全现实的手段，即通过在和隐藏的官僚们协商时，庇护和支持他的选举人的办法来帮助他们。因此，在这个制度的受益者们看来，使保护劳动和生产的政治机器免受“空想主义改良派”的威胁也是现实的，空想主义改良派的主要目标是推倒现存的“政权结构”，但是，他们并不能提供可靠的补偿，即不能提供选举人能够理解的补偿。今天，愈来愈多的人知道，领袖统治推迟了选举人的成熟过程，因此葬送了民主，还为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提供了土壤。这里，不能否认“民主”和“政治成熟过程”都是意识形态的概念。

最后，一个例子是职业战略家们努力想把外交——军事部署说成是“理智”的。就象人们听说的那样，他们热衷于制造热核武器以把战争引向荒谬的境地。另一方面，他们确信，力量和力量威慑在近期内是任何一种“现实”的外交政策——至少对美国来说是如此——的主要因素。因此，对他们来说，问题在于发展战争的形式，其代价和战争目的是一致的。此外，发展高级的常规武器和战术也属于这一“问题”的范围，而在一段时间内，由于人们把重点放到了大规模报复威慑上，所以就忽视了常规武器和战术。有时也

谈到了和潜在敌人订立关于协调和限制军事行动的秘密协议。如果人们把信任归结为核威慑的话，那末他就很容易地代表了这种近乎“理智”的观点，从另一立场来看，这种观点似乎是对战争的一种新的辩解，换言之，使联合国获得大赦并倒退回克劳塞维茨式的强权政治。只要感到有责任使联合国成为一个有效的机构，那末，提倡进行有限战争的人们“有现实意义的”努力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它们维护强权政治的气氛，而在这种气氛中，联合国则将无所作为。

从上面的任何一个例子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解释使“健全的理智的现实性”失去了效准。一种思想意识含有一种定义，并以此对现实下定义，只要解释是正确的，那末现实也是正确的，由实际状况产生的问题都保持它们的效准。因此意识形态的争论主要是企图改变未来和对这种企图的反对，其意图和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使这堆或那堆问题成为注意的中心。

思想意识的斗争不仅反映在政治上，也反映在科学史上。托马斯·库恩^①对“正常的”和“革命的”科学提出了一种基本的区别，一种思想模式在“正常的”科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以后，在一定的范围内，被几乎所有的积极的科学家所接受。这个模式就是研究的对象，而研究是受它控制的。这种研究从根本上解决了随着这种思想模式而出现的问题，但有时，这个模式过时了，而且不是因为有些事实不能证明某些理论；理论是可以在已知的模式之内加以修改甚至被排挤，相反的是，这个模式的瓦解本身（一场科学革命）就象地震一样使一大批问题失去了效准。例如，在哥白尼革命之后再要去清算托勒密的地心说当然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再如在发现了氧气之后再去找燃素岂不是海外奇谈；而相对论的

^① 《科学革命的结构》，见《国际统一科学百科》，第2卷，第2期，芝加哥和伦敦，1962年；德译本：《科学革命的结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7年。

革命也使对以太的物理性质的探索成了无的放矢。

同样，政治思想意识的改变也会使人们用不着再去研究的一大批政治问题，例如君主专制的废除使家谱学的研究失去了意义，而它却曾经是封建政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意识形态的革命常常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因为知识分子会宣传，是新思想的当仁不让的负符者和传播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想意识和阶级利益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阶级利益的合理化），而阶级利益是以有关的阶级在生产制度和分配中所起的作用为基础的。从这个论断的范畴来看，很难说明知识分子具有哪种阶级利益。在资本主义制度里，它既不属于被剥削阶级的范畴，也不属于剥削阶级的范畴。而在苏联，知识界是属于三个官方阶级的；而自从苏维埃马克思主义不再把阶级斗争看作是现存苏联社会的因素之后，知识界就不再被看作是有着特殊的阶级利益的了。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分子是为这个或那个争夺政权的阶级服务的——主要根据他是捍卫还是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而定。（当然，事实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知识分子对苏联社会制度的态度来决定他是属于这个阵营还是属于那个阵营的）。但依我之见，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来说的话，阶级觉悟并不取决于阶级利益。尽管社会经济学家持同样的见解，但他还是不得不去找出适用于任何一种情况的解释来，就象一个正统的心理分析学家，顽固地要说明已经制定了的民法典概念的相互关系中的每一个细节。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断然拒绝意识形态中的经济动机，他们把这个论点和唯物史观本身混为一谈。然而，我相信，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的哲学争论虽然有过历史意义，但在今天已毫无价值，而只会阻碍丰硕的思想理论的发展。决定行为的所有利益总是首先被感知。所有的感知都是对感觉印象的解

释,包括言语传递在内,它们只是在的一瞬间起作用,有时则贮存在记忆中。言语传递可以控制感知和态度,而并不和“客观现实”有固定的关系,除了那些已经记入了感知者头脑的痕迹外。简单地说,人们有可能——也可以利用这些可能——根据各自的想象、希望和恐惧来发挥,来行动。我把这些老生常谈归结为科学的概念,目的是想说明,“唯心的”术语(想象,希望和恐惧)是如何转变为关于交流和神经生理学的“唯物主义”理论的。

只要人们一旦认识到没有必要把阶级利益和严格的经济状况联系在一起(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到结束的这段时间里就已确定了这种经济状况),那末就可以把这种基本的(在我看来是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概念——当然不是正统理论所要求的那种曲解——运用到今天的社会历史中去。今天,阶级利益表现为得到或保持一种思想意识的利益,特别是在美国,(极端保守派,主流派和新左派之间的)意识形态的论战可以理解为阶级斗争,它突破了通常的阶级框架并鼓励现在可以从心理学角度加以定义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我想依靠这些阶级起初感到是威胁的东西对它们作一描述。

极端保守派阶级把每个社会变化都看作是威胁,他们思想意识的最显著特点是他们的排外性。正如他们所承认的那样,他们的使命是复兴美国的旧德行,扫除所有外来的影响。

主流派追随者阶级认为威胁来自不可调和的争端。因此,他们想草率处理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分歧。他们把思想注意力放在合理地解决问题上面。他们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会一帆风顺地前进,并且能成为完人。他们认为,所有竞争着的集团从根本上来说具有共同利益范围,应力求避免有害于所有有关的人的冲突。

我们觉得,新左派阶级认为主要威胁来自权力的集中,而不管

是集中在谁的手里。在美国，反对现成权力机构的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在校青年——都属于这个阶级，他们想和非特权阶层结盟，非特权阶层从未和统治者同一过，而且也从未向他们表示过忠诚。新左派的目标是打碎他们所认为的已经腐朽的权力结构。

根据这些定义，知识分子是否构成了一个阶级呢？如果是的话，那末知识分子的阶级利益和上述集团中的哪一个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呢？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对知识分子的概念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因此，如果大家接受我下的知识分子的定义的话，那末，就只能得出下述的一种结论。

知识分子是勤于思考的人，他会分析思想的内容和起因，会对思想作出评论和比较。这种活动甚至会对知识分子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常使某些人以此为职业。因此，知识分子的目标就是进行多种形式的交流。他的好奇心使他不只注意到他周围环境里的对象和他特有的历史地位，而且顾及到过去和未来。简单地说，这就要求知识分子注意思想形成的经验，而知识分子就根据各人的爱好或工作范围用知识分子特有的手法，用文学，科学和艺术等活动来满足这一要求。

那末，把这些爱好和需要都归纳为“阶级利益”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能把注意思想形成的经验的需要看作是集体的需要，并由此推论出所谓的“辩证的矛盾”的话，它就是有意义的。假如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要求就是普遍的人的要求，而不只是自己的偏爱的话，就满足了第一个条件。只要他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他跳出了与世隔绝的学者的小圈子。他从经验中形成了一种伦理的标准，并以此来衡量他周围的世界。盖言之，知识分子的个人要求变成了意识形态的目标。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辩证的矛盾”。

汉斯·J. 摩根索^①把这类矛盾看作是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目标中的一个(特殊的)部分。他认为知识分子在寻求真理,而政治家却在寻求权力。他写道:“真理害怕权力,而权力也害怕真理。要使权力变得有效,就要以另一种面目出现,欺骗——自欺欺人——是和权力的使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相反,由于真理揭露了权力的真正目的,也就揭露了现有的权力和掌权者;因为它要求权力证明自己是合符理性的,合符道德的。它使权力的目标和过程成了问题并危及到了权力主宰一切的制度。

摩根索指出了掌权者们在和真理的揭露开展斗争时的几种可能性:“他们可能尊重真理,可能保持沉默,可能对真理加以诽谤和歪曲”。他还说:“政府有能力对真理进行歪曲,这是权力所要求的,它会奖励那些让自己受骗的人。它可以对真理进行诽谤,因为权力赋予政府以权威,而且它会对群众性宣传工具施加影响。它有可能对真理保持沉默,因为它有权去歪曲它——而沉默是一种消极的歪曲——而最后它还可动用一切手段,如警察和刑法”。摩根索根据今天美国的政治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两个结论:“政府进行过诽谤,保持过沉默和进行过歪曲,而由于知识分子本身的帮助,它还在取得成功”。

我认为,摩根索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证明第一个论点,而第二个论点我却不敢赞同,这主要是由于我的知识分子的概念比他的要狭窄一些。尽管摩根索没有对知识分子下明确的定义,但我觉得,他似乎偷换了“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概念。根据我的定义,大学生只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我的定义并把许多专业性很强的专家都排除在知识分子阶级之外,因为这些专家在他们的工作中

^① 《真理和权力》,见《新共和》第155卷,第22期(1966年11月26日),第8—14页。

只对一定的任务有反应。换句话说：例如数学家，即使他在解题时需要极端精确的理性观点；又如音乐家，即使他工作的首要条件是特别的感性；再如作家，即使他在创作时需要对人的行为动机有极深刻的理解——这些人都不应算作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是去研究数学，音乐或心理学观点的本质，并认识它们的历史作用以及把它们和人类经验的其它形式结合起来的。如果人们承认专门知识和目标之间的差别，那末，首先由米利恩·本达^①提出，现在由摩根索就约翰逊政府收买大学生和科学工作者而提出的背叛的控告就不那么尖锐了，因为一提到背叛，首先就要表示效忠。今天，为约翰逊政府效劳的大多数职业科学家，战略家或宣传家从未觉得对我所说的知识分子的目标负有责任，因此，他们并没有背叛过任何东西或任何人。他们只是很简单地找到了合适的职业，找到了一个机会来使用他们的专业知识而已。

正如摩根索所说的，行使权力时肯定要歪曲真理。但是，专业知识者不需要把真理作为整体加以研究，而只需要研究部分真理（除非这些部分知识就是我所说的那种知识分子的思想目标）。他们研究的不是伦理问题，而只是技术问题。不妨引用汤姆·勒雷尔^②的话：“火箭上天后，谁会管它下来呢？”

“这不是我的事了”，韦尔海恩·冯·布劳恩说。对于计算火箭飞行轨道的物理学家，对于正在培养在生物战争时能阻止致病因素的新抗菌素的生物学家，对于正在研究使战士们消除有罪感的新方法的心理学家，对于发展控制公众舆论技术的社会学家，对于为了地域政治的目的，而提出怎样“对待”外国人的人类学家，对于把“现实政治”和现实主义同等看待的政治学家，对于所有这些学

① 《知识分子的背叛》，巴黎，1927年。

② 《W. v. 布劳恩》，T. 勒雷尔编的歌曲(ASCAP)，选自唱片公司1965年出版的唱片：《这就是那年的事》。

者来说,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呢?

这些专家谁也不必歪曲他的专业范围里的——科学的——真理;谁要为政权利益服务,只要蔑视自己工作范围以外的真理和价值就行了。当捍卫文明的专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定威力的核攻击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计划,用多少多少星期,在每个人身上化多少多少美元,就能够救活几千万人时,他根本用不着歪曲事实。但如果他主张这个计划的话,他就不得不把和这个必须解决的专业问题不是直接有关的一些问题放到一边,不加考虑。例如,核攻击后“救活的人”将怎么样这个问题,就不能用对防爆防火舱潜力的专门研究来回答了。而从广义来看,这一点却对整个问题的意义。因为只有当知识分子把对真理的责任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理解,并且把这种责任感扩展到事实上能得到证明的真理的其它价值上去的时候,知识分子的思想目标和权力动力学之间的辩证矛盾才会异常清晰地显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必须与之斗争的那种威胁,与他们的阶级利益一起显现了出来。

坦率地说,美国的知识分子无疑是受到极右派的威胁的。毫无疑问,极右派对知识分子的敌视态度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威胁表现在选举斗争中发生的反对“鸡蛋壳脑袋”的敌视运动中,表现在审查委员会的搅扰,表现在“爱国”团体的“清理图书运动”中。这一切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特别明显的是最近在极右派独掌政权的州里发生的那些事。

同样,主流派也威胁着有明确目标的知识分子,当然这要文雅得多。投身于主流派的知识分子,要么象哈耶卡瓦那样否定在美国权力是高度集中的,要么认为(如那些支持现在的外交政策的人),美国和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具有巨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能够为人类作出有益的贡献,例如,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上有序

序的进步道路并把它们从极权主义中解放出来。

那些隶属于新左派组织的知识分子宣称,在美国,政权的巩固是一种事实,至少和其余的世界相比是如此。对新左派的代表来说,这个“其余的世界”指的是无数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而不是五颜六色的政治地图,这些人主要是缺少生活必需品,而基本的人类尊严现在还排不上队。在最近几十年里,他们越来越清楚他们需要什么,他们认识到了,什么东西和他们的需要是对立的,例如,统治集团创造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是欧洲占领者迄今对“土人”统治的时代残余,而穷苦民族到处起来想推翻这种权力统治,美国利用各种不同的机会进行武装干涉以保护旧政权,如在伊朗,他们就导演了一场反对人民选出的政府的叛乱,结果使国王又成了实际上的绝对的统治者;他们在危地马拉导演了一场反对人民选出的政府的叛乱,结果使旧统治阶层重新执政并使美国通过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控制确保了它在那儿的经济利益;美国政府武装并指挥了对古巴的武装入侵,其目的是为了扼杀这个国家的经济;当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政局变得对美国不利的时候,美国的武装力量就占领了这个国家;当中国的内战以起义者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后,美国的武装力量又占领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而且,美国政府把从前的统治阶级称为整个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当法国人对刚建立的越南共和国发动进攻后不久,美国就给了法国相当于法国军事开支四分之三的援助,并当法国被打败后,美国就卷入了紧接着爆发的内战,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兵力并发展成为一场常规战争,大多数国家的人民都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一个庞大的世界强国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一个小国而进行的一场战争。

所有这些行动,如果从国际法和现存的条约义务来看,都是侵略,都是权力的滥用,其目的是为了扩张和巩固这个权力。在世界

舆论面前，美国却把这些行动称做是反侵略的行动。他们提出了以下三条理由：

一、共产主义在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扩张都意味着侵略；

二、任何一种政治变革，不管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只要它确实或者可能是由共产党所支持的，就意味着共产主义的扩张；

三、美国是唯一的法官，可以裁决一场政治变革是否受共产党所影响，受共产党所支持或操纵。

简言之，美国要获得可以宣布每个政治变革都是共产主义侵略的例证的特权，以及它认为是正确和必要的手段来进行干预的权利，以阻止这种变革或使旧政权重新上台。

美国领导人坦率地承认，他们的权力是无限的，他们可以运用权力来强制推行他们的全球政策。新左派把此视为残暴的权力集聚的象征。面对这种情况，有限地使用暴力的理论，和准备妥协以及因而准备平衡各种各样利益的理论都变得毫无意义了。新左派不准备通过施加压力来达到冷战术的细微变化。他们宁可希望将来能发生变化，希望思想意识能发生变化。美国人必须明白，当代政治的无益，冷酷和残忍不只是各种错误的产物，而且也是社会病态的象征，是为实际上滥用权力而付出的代价，而其目的只是为了保持权力而已。

现在，许多知识分子（尽管不是绝大多数）之所以支持新左派，并不是由于他们想维护他们的道德的完整性（如哈耶卡瓦所主张的那样），而是由于他们认识到执政者的能力。他们看到，统治者断然采取贿赂，诽谤或者剥夺言论自由的手段来对付那些拒绝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的人（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是当代美国外交政策的唯一目标，剥掉借口，撒谎，曲解或空话的外衣，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目标）。

新左派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失望之后，从中得出了上面的看

法。现在的美国政府的成员们及其谋士们表示，不能接受未来要变化的任何企图。合理的推论和深思熟虑，实事求是的分析遭到的是蔑视，遭到的是蛊惑人心的怒骂。一种筛选过程，使得政府受到顾问们的包围，而顾问们的准则就是同共产主义保持距离。由于陷入了一场不断扩大的不幸的战争之中，政府得到的只能是越来越尖锐的指责；因为失败一次，承认错误的代价就提高一次；逐步升级的代价是无法用逻辑的计算算得出来的。我们从一个政府发言人那儿获悉，不管逐步升级的代价怎么高，也绝不会停止下来。美国已经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境地。

我认为，越南战争是新左派得以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新左派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政治收容所，这并不偶然，因为在美国，新左派是唯一严肃地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组织；而由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灾难的意义也只能通过意识形态的分析才可以理解。越南战争揭露了为了巩固权力而争夺权力的内在逻辑。美国决定采取这种决策是主流派思想意识成了主导思想的直接结果。和极右派思想一样，主流派思想也坚持这一基本观点，(共产主义)专政和(西方的)民主之间的斗争是决定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因素。极右派和主流派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只是采取的策略各异；前者主张征服世界，后者主张征服脑袋。当然，在主流派中也有许多人是反对越南战争的。他们中有些人认为，这是“在错误的地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另外一些人再次提出了美国从这个毫无收获的对抗中摆脱出来的方法和所应走的道路，而到别的地方去进行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这确实是发生在地域政策基础上的战术分歧。新左派知识分子攻击这一基础并因而攻击强迫大多数美国人从这一基础出发来思维的统治集团。对新左派来说，统治集团是一种现实，他们已在思想意识方面和统治集团发生了争论，而且是在他们占优势的那些领域。而对主流派——自由派来说则恰恰相反，他们

认为统治集团不是一种现实，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没有和统治集团发生冲突（C. 赖特·米勒曾经说过，可以证实存在着统治集团的唯一有效途径是激怒这一统治集团）。

我认为，新左派代表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利益。当他现在的生活方式和他的思想信仰一致时，他的阶级利益就得到满足。但这种情况只能出现在一个欢迎对各种思想，包括对传统的民族目标和思想意识进行深刻批判的社会里，确切一点说，只能在这样一种社会气氛中才能出现这种情况：观点的转变跟得上突飞猛进的技术变化过程。虽然主流派一再阐述这种思想，但至今并未发生任何类似的变化，在二十年的冷战时期，从新政过渡到公平政治，从八年的冷淡主义又过渡到新边疆及伟大社会，在这些时期里都没有发生这类变化。主流派始终希望，每个美国人，甚至也许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所谓的普遍向往的中产阶级的一员。

知识分子对进步这个概念并不满意，这倒不是因为他嘲笑中产阶级的价值——他也不会自命为是风格和嗜好的评判员——而是因为主流派的进步概念使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大为失色：美国自动起到了一种不加区别地使全世界人民都不可避免地毁灭的作用（各国人民曾经起过这种作用）。这倒不是简单地由于外交政策的决定优先于内政政策的决定。主要原因是为了要找到一条把这两者用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的途径。我希望加利福尼亚的孩子们拥有较好的学校和娱乐场所，也希望瓦茨的居民们拥有较好的城市交通工具。但是如果人们把这一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而同时却掩饰这样一种政策：把凝固汽油和白磷倾倒在越南孩子们的头上和摧毁农作物，为的是强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屈从于一个由外国政权扶植并支持的政府，那就大错特错了。

看看我们对我国境线那边的人们已经采取并继续采取或威胁还要采取的政策，就会发现，我们为更多的工作场所，为更舒适

的条件(首先是为了我国人民)而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残忍的,是不人道的,“唤醒人民的良心”这样的词句又开始出现了;但是如果怕天塌下来的知识分子有这种想法的话,就意味着为解决问题迈出了一步。为此知识分子自从知识从教会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以后第一次和在今天重新考察宗教经验的意义的思想家结成了联盟。科学家里努斯·保尔林和神学家马丁·布伯比和科学家同行爱德华·梯勒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不仅是根据知识分子的职业范围和专业,而且是根据他对知识价值的责任来看待他的话,那末知识分子就是有阶级利益的;有一种责任特别重要:即批判地考察人们的生活。在美国,这种责任引起了知识分子和统治集团的冲突,我们不能低估这种冲突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主要的是我们不知道,在美国,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实际上的与世隔绝(或隐居)的生活究竟是一种政治上的不利条件呢?还是一种特殊的好处呢?知识分子集体觉悟的形成可以被看作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它似乎是由美国的知识分子都集中在大学里才形成的。而今天的青年拒绝适应现有的社会结构和服从统治集团,这也得归功于知识分子的集体觉悟。没有一个统治集团能够继续获得他们的信任。

我们不知道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但可以看到由此而产生的联盟和对一般政治所造成的影响。阶级斗争似乎正以一种完全崭新的形式在出现。

三、恐怖和政治淡漠的关系

〔西德〕K. 霍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猖狂地攫取政权，特别是德国公众选择了国家社会主义，使人们痛感到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缺陷：社会主义显然不是唯一的抉择，尤其不是针对资产阶级议会式经济自由主义的必要抉择。资产阶级社会实质上的民主化不再只是一个客观政治经济问题，而且随着后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越来越好地控制自身政治范围内的对抗，而成为一个心理问题。尽管国家社会主义把心理问题放在第二位，而把社会经济再生产的政治组织放在第一位，但心理问题还是成为一个相当独立的问题。在关系的压力下，自我综合功能变成为几近偏执的设想；依靠被控制者要比依靠直接强制能够更有效地进行非理性统治。

自从经历了法西斯统治以后，社会对恐惧的操纵和政治淡漠的各种形式成了政治心理学的中心课题。要恰当地确定后资本主义社会恐惧和政治淡漠的相互关系，必须一方面先提出这个社会客观的社会经济关系概况，另一方面应该对恐惧在这个社会的社会心理作用作一番说明。尽管恐惧的个人心理作用是它的社会心理作用的基础，但是，它的社会心理作用并不直接等同于它的个人心理作用。^① 只有这样才能确切地阐明当代社会制度中政治淡漠的作用。这里，我们不想作全面的研究。我们打算通过对两种典

* K. 霍恩(Klaus Horn)，1934年生于德雷斯頓，现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研究所社会心理学助教。——译者注

① 我曾试图对认识兴趣，对政治心理学的主题和材料作一评论。请参见《政治心理学》，载D. 森哈斯编《政治学导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

型的分析，指出恐惧和政治淡漠之间的关系的社會心理作用。第一个典型是一个试验，它行为主义地描述出“服从权威”的直接外界条件；第二个是心理分析，首先着重研究内在附随现象，以及在极端情况（战争）下，对一定社会关系的适应产生的社会结果。

政治淡漠问题是和适应问题密切相关的，当然这指的是非批判性的单方面适应概念，心理分析学不使用这一概念，它讲“适应性变化”，而结构功能社会学使用这一概念，它讲“调整”，这指的是一种科学，这种科学否认个人的有机基质和这种基质在下意识中的本能表示，因此它能悄悄地坚持这样一个思想：就“调节”而言，个人实际上具有对任何社会条件的无穷尽弹性。

有两个范例可以说明恐惧和政治淡漠的关系。现在先来谈一谈第一个范例的意义。这是由 S. 米尔格拉姆在美国设计的试验。^①我认为，这个试验尤其适用于说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冲突：主体在受雇佣的范围内差不多天天面临着所谓必不可免的技术客观规律性和官僚主义客观规律性，他感到无能为力，感到有责任参与其中。主体屈从于雇佣社会的关系并同意——我们从试验程序得出这一结论，并把主体的这种行为扩展到其它的，特别是全社会的功能关系上——公众生活非政治化，从社会角度来看，非政治化有利于那种凭借雇佣关系把自己伪装为客观必然性的利益。

米尔格拉姆和他的同事们想用科学试验研究人类受折磨时的顺从条件，当然，这种折磨是在试验中模拟的。方法是请试验者向另一个和试验领导人合作，学习和复述某些事物的人输入越来越强的脉冲电流，一直到学习者在复述时出现错误为止。使人惊讶的是，随着试验条件的变换，总有相当数量的试验者准备向紧绑在

^① S. 米尔格拉姆：《对权威的服从和拒绝的几个条件》，见 H. 维斯布劳克编《恐惧的政治作用和社会作用》，载《政治心理学》，第 6 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7 年，第 170—193 页。

所谓电椅上的人通上脉冲电流，仪器的刻度表清楚地表明电流强度一直大到 450 伏；每一级电流，特别是高压电流都显示了危险信号。在米尔格拉姆试验中有三个重要的顺从和拒绝条件：1. 靠近试验领导人，以及这个领导人出现的方式；2. 靠近所谓的受折磨者，以及他以什么方式表现痛苦；3. 所谓的幕后权威，即试验者认为要对试验负责的机构。试验领导人越近和越权威，那末试验台旁的试验者就越能顺应试验程序；所谓受折磨者越近和他的表情越痛苦，那末试验者就越想离开现场。所谓的幕后权威对试验所起的作用则比较小。

这并不是说，继续试验（接通高压电）的试验者感觉不到盲目地接受社会权威的要求和与所谓受折磨者同一之间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通常只表现在口头上或心理上：试验者表示担忧，大声抗议，变得不知所措，结结巴巴，全身颤抖，汗流浹背，而且至少有一半人在犯下一个错误时，会象所要求的那样，把电源开关转到更高一级。^①

现在我们对本文开头提出的第一个论点作一概括：在现有的社会关系下，被管理人认为劳动分工产生的客观权威越来越绝对化了。官僚主义则使被管理人与专家越来越疏远。被管理人依赖于雇佣，并感到依附于人；心理上感到有了依靠，感到同权威连在一起的人，即使要求他们干与内心价值观念不一致的事情，他们也会去干。这种消极性在政治领域发挥了作用，在这一领域里，随着社会一体化的发展，客观事物规律和政治抉择的决定越来越紧密

^① 米尔格拉姆在其前言中用很少几行对不同试验程序的结果作了说明。有一半以上的试验者准备发出 450 伏的最强脉冲电流。虽然确切地知道服从者和拒绝者的人数，对于正确地评价各种试验程序的效果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就我们的论述而言，米尔格拉姆告诉我们的结果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只需知道确有相当一大部分试验者准备服从条件。如果我们在论述中提到百分数，那末从政治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就会出现论述是否确切、中肯的问题，就象争论集中营死难者的确切人数一样。

地纠结在一起，其结果就是意识的非政治化。我们的第一个论点可简单地概括成这样一句话：社会生活科学化和官僚主义化的发展，使少数人成为专家，多数人成为被管理者；这又在现实社会关系下导致了意识的非政治化。

这里还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倒底是针对被管理者的雇佣关系这个客观因素，还是他们对试验领导人和其他试验人员的心理关系这个主观因素对攻击性行为起了主要作用。但是可以确定有一半试验人员的自我综合功能不足以抗拒实际所制造的折磨，而这种折磨是和正确的、只适用于私人范围的内心准则相冲突的。

现在我们对第一个论点作一点补充：在当今社会环境里，意识的非政治化不仅说明社会统治关系得到了巩固，而且更主要的是说明了，随着把技术的思维模式（即对自然的控制）应用于和扩展到社会关系上，统治关系合法化了。从米尔格拉姆的试验中可以看到，许多试验人准备在某种程度上对其他人采取攻击或甚至拚命的行为，而对所谓的客观权威则取顺从的态度。在试验人看来，这种客观权威把内行的试验参加者规定为未被控制的自然的一部分，他们的学习可能性应该在特殊的试验条件下加以试验，而如果这种学习可能性不能正确发挥的话，就要受到某种惩罚。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论点归纳一下。由于意识的非政治化，人很显然地处于这种状况：客观上彼此互相攻击。当然不是出于原始虐待狂的要求。这种意识不仅不允许新的社会关系形式的出现；而且还妨碍旧的形式改变，并使这种社会关系里存在的可供利用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发挥出更高的效率，人也应该更有效地作出适应。哈泼马斯所说的“实践的认识兴趣”^①是这样一种认

^① J. 哈泼马斯：《认识和兴趣》，见《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美国河畔法兰克福，1968年。

识兴趣,它想把技术进步和人的进步调和起来,因而它的平民基础也就被剥夺了,政治上也就无能为力了。

从社会心理角度来看,实践的认识兴趣的僵化产生了特殊的后果,如果人们不能自行确定其政治生活方式,而是去适应其社会关系的技术化,那末客观上受社会的雇佣和主观上受雇佣的心理之间的配合形式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这种配合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心理分析学家 K. 艾斯勒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比米尔格拉姆的试验更清楚地揭示了社会的非理性和个人的非理性之间的关系。米尔格拉姆遵循的是行为主义的传统,他搞的是实证主义的社会研究,想确定在一定的反复出现的条件下的行为,这些条件就是构成冲突时对权威的服从。米尔格拉姆并没有分析过他的试验者服从或反抗的内心心理条件——而这也许会是非常有意义的。而艾斯勒是在一种社会环境的范围中,即在社会冲突得到相当好的技术性解决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试验的,这种社会环境就是使战士得到训练和投入战斗的战争,他把他的文章定名为:《能干的战士》^①。

可惜艾斯勒没有做大量的论证工作,他的为数不多的论证表明了一种对一定社会关系的消极适应,即意识的非政治化和技术对思维和行为的控制向社会关系的渗入,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这造成了实践的认识兴趣的僵化:在人的同一性被磨灭的条件下,人变成了战争机器的技术组成部分,的确,他们起的正是这种作用。艾斯勒确定,把战士置入合目的性的关系之中,这就要求(尤其是在一支拥有先进技术装备的军队里)适应性达到这样一种程度:禁止把任何个人生活经历的同一性带进完全标准化了的角色

^① K. R. 艾斯勒:《能干的战士》,载 W. 米斯特贝格和 S. 阿历克斯兰达编《社会心理分析研究》,第1卷,纽约,1960年,第39—97页。

任务中去。更有甚者是还存在着只有在战争时社会才许可表现出来的病理特征。但是在战争中显然是没有“健康人”的。战争经历通常都给正常人留下了创伤，由于死的恐怖至少一定会出现部分的退化和其它的紊乱现象。

但是艾斯勒不去研究战争中的正常人，而去研究“能干的战士”，这些能干的战士起初没有明显的心理创伤，通过了军事—技术训练和战前准备，也就是说他在实际上不仅适应了极端的形势，而且甚至还适应得很好。战争，它可以优先从技术上解决社会冲突，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艾斯勒根据这一前提条件概括说：“但是总而言之，现在社会所说的正常行为是一种特定的混乱，它适合于特殊的社会结构并且忽视和缩小了内部微观世界，以屈从于外部宏观世界。”^①因此艾斯勒特别强调存在着适应社会现象的病态形式，因为全面接受角色任务同一性的前提就是消灭个人生活经历的同一性。而有几种特殊的防御方式是和这一点联系在一起，我们打算对这些方式作进一步的研究^②。

在这些情况下，主要是以什么方式来对待本能冲动的呢？外界的社会事件可以被用来控制本能的需要；为了控制本能的需要，就不能形成成熟的内部心理结构——从经典的意义上来说，就是没有个性，因而就对外界关系存有高度的依赖性。从个体发育的角度来看，这是部分本能冲动和角色模式的相当陈旧的相互效应^③，

① K. R. 艾斯勒：《能干的战士》，载W. 米斯特贝格和S. 阿历克斯兰达编《社会心理分析研究》，第1卷，纽约，1960年，第68页。

② 对于个别情况的病根和集体神经官能症来说，前患病结构和极端状态的相互作用，是一个现实的创伤性因素，本文不打算论及这一点，读者可参看A. 洛伦佐的《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的概念》，见《心灵》，第20期，1966年，第481—492页。

③ 参见A. 米切利希：《社会的我与个人的我》，见《科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杂志》，第18期，1966年，第21—36页。P. 巴林，F. 摩根坦勒，G. 巴林—麦坦的《白人想得太多——对西非头人的心理分析研究》（苏黎世，1963年）一书对这类较为原始的文化作了描述。

这些适应方式的行为是自我异化式的。艾斯勒谈到社会抹煞同一性时有这样一段话：“……要注意的是，在当代社会中起作用的一种方式就是抹煞个性，以遏制机体的反抗和屈从私利，并按照社会模式和内心微观世界相悖而行。”^①

现在应更仔细地考察一下非理性组织的宏观世界——一个总的来说是越来越强大的技术组织社会——和与之相适应的人的精神病理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先来研究一下病态适应形式，这种形式是由战争这种特殊情况所激发的，根据艾斯勒的看法，它乃是适应角色任务的士兵所具有的特点。

这主要指的是自恋的人，在军事训练和战争的特殊条件下，这些人心理上的平衡主要是由三个心理动力学上互有联系的因素决定的^②：第一，不惜任何代价证明其大智大勇；第二，用抹杀个性强使这些人听从眼下的要求和将来的要求，而不论内心有无冲突；第三，对某个现实领域产生特殊的恐惧，而这一领域则正因此而成了攻击性冲动的目标，而超自我又并不提出异议。

强制证明大智大勇显然有助于抗拒真正地洞见到实际上所处的无权地位。看来正是技术——对技术的社会技术利用——似乎适用于巧妙地克服无权感。但是技术——例如象艾斯勒所强调的是一种战争机器——被用作心理防御手段的话，那末这就涉及到幼稚地使用技术这样一个问题了。就象社会技术思维解决了国家内部的社会冲突，就象技术性战争解决了国际性冲突一样，人们也期望技术能解决心理冲突：人仅是可控制的社会对象。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技术思维的巧妙应用是以具体的思想意识为前提的，这种意识直接地受到被视为客观权威的雇佣关系的制约。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大和小，有权和无权这些因素都应归入早期性欲发展，

① 艾斯勒·《能干的战士》，第79页。

② 同上，第88页。

因此也就是一个极早出现的基本问题。^①

艾斯勒的第二个因素强调了防御机制，我们可以一般地把这种机制看作为和攻击者同一化：直接屈从于权势，如同第一个因素一样，这是由于预感到了在社会上实际处于无依无靠的境地所致。主体感到无依无靠，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所处的社会和社会整体关系中的角色要求的意义，以及由于他们所得到的酬劳并没有一定的保证，一旦他们不能控制保证条件时，他们也就得不到这种酬劳了。这种无依无靠是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自我认识的思想残余的一种嘲笑，这种思想残余宣称，人创造了世界。

艾斯勒所强调的第三点就是，把对实际上最易引起恐惧感的那部分现实的恐惧（这种恐惧早已扩散，但还不明晰）具体化了，并且把随之而来的攻击当作对威胁的答复，这一因素属于寻找替罪羊的精神病理学范畴，一方面把扩散开来的恐惧和攻击要求融合起来，另一方面把全社会的战争准备（包括经济上间接作好准备）也融合了进去，因此是很危险的，因为幼稚的自卫方式和客观上的不合理性暗中自动串通在一起，并且如果不是通过判断自动地找到一条出路的话，剩下的就只有非理性地参加一起杀戮了。

必须适应于对大多数人来说变得看不透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要求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于贝尔特海姆把德国集中营，艾斯勒把战争都看作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情况。^②最初被设计为劳改营的集中营，在贝特尔海姆看来，在“最后解决阶段”之前还是训练中心。看守人和被看守人的意志被彻底地摧毁了，条件反射取代了

^① 本文不研究这类适应形式是不是一种为自我服务的退化，会不会导致结构的持续紊乱（参见洛伦佐：《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的概念》）。然而可能的情况是，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长期持续稳定的，社会强制的幼稚行为也能导致前恋母情结的心理结构在精神上固定下来，并成为一种传统，成为一种标准行为，因此社会的政治组织可以起到造成创伤性极端状态的作用，并使幼稚行为制度化。

^② 贝特尔海姆：《反对群众的起义——一个人在现代社会的机会》，慕尼黑，1964年，第118页。

他们的意志。特别是那些囚徒全面地被置于绝对的无权和发狂的地步，因为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将受到怎样的处置。只要谁拒绝缄默不言，拒绝扼杀任何一种自发性，只要谁不愿被当作“物质”，只要谁还想保持一点儿自主权的话，一句话，只要谁有一点点异常¹¹³表示，就会被“处理掉”。采取的方法从囚犯的编号到经常的辱骂和威胁，从集体被罚以毫无意义的繁重劳动到消灭同一性的物质基础，即处死。

贝特尔海姆描绘了这种人为幼稚化的特殊效果。他所说的中心内容就是，集中营中全体人员的所有被训练的、被升华的特征，所有的干涉，所有的同情，和牺牲者可能的同一化都向自恋性和最幼稚奇特的试验屈服，以换取对自己的一部分生命的支配权。因此囚徒们试图为自己争取一点点同一性，例如他们为鞭笞他们的人的最后胜利而收集废旧材料，并因而使自己和杀人犯在思想上有了联系，为的是具有和他们一样的感觉。贝特尔海姆写道：“在全面发展的被压迫国家里，牺牲者组织起来进行自卫的努力，看来是在使人格朝着崩溃的方向走去。”^①

我们可以对贝特尔海姆关于集中营特殊状况的描绘再进一步补充一种类似的特殊状况：所谓的洗脑筋。在朝鲜战争中许多美国俘虏的立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②许多折磨，例如用饥渴磨灭战俘生理上的反抗意志，就是心理折磨的基础。例如把战俘关在隔音暗室，使他得不到任何知觉，这种折磨在短时间里使战俘的所有反抗都归于失败。后来美国的试验表明，学生只要在这种地方关上十二个小时，就会出现明显的失调现象。幼稚型的思想占居优势，试验者的头脑充满了幼稚的幻想，幻觉和恐惧的迷梦，因此他

^① 贝特尔海姆：《反对群众的起义——一个人在现代社会的机会》，慕尼黑，1964年，第204页。

^② 参见J. A. M. 摩洛：《洗脑筋》，见斯坦因，维达切和怀特编的《同一和忧虑——群众社会中人的残余》，格伦科，1962年，第506—522页。

们随之就准备接受新的思想体系。

当然不能直接把我们社会的平均存在和在上述特殊条件下的平均存在相提并论。但是有一点很有趣，那就是无论是贝特尔海姆，还是提出换脑筋实验报告的梅尔洛，都特别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了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似乎适于对付这种专家政治社会关系的创伤性效能。这种手段就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的手段，贝特尔海姆那本著作的英文标题比德文标题更加明确贴切，该书的英文标题是：《见多识广的心灵》。这就是说：如果特殊状况不可逆转地并没有摧毁心理结构的话，那末就可健康地战胜特殊状况，即自我综合功能依然存在，而且并没有受到决定性创伤的限制。自我恋母情结后的综合功能在于，“吸收异在的东西（内部的和外部的），调和矛盾，甚至把对立的東西互相统一起来，推动精神创造力”。^①

自我综合功能在自我发展的许多阶段都是可以做到的；如果光从形式上来看，那末连幻想也是一种创造力。例如世界上反犹太的解释就是这样一种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综合功能不只在心理上的自然判断，还在于感情冲动地、非理性地应用实际上已不适用的旧框框。根据幼稚的思维模式，他们（犹太人）要对一切社会的错误组织负责；如果把这些人处死——这是一种胡思乱想——，那末一切都会变好。和艾斯勒的士兵们想用武装敌人来克服自己幼稚的恐惧和攻击一样，反犹的人把在混乱的社会环境里引起恐惧感和犯罪感的本能冲动和客观表示外表化了。这种世界观——反犹太的世界观——也是一种自我综合功能，它包括了一系列简明的推断，因此把许多调节，特别是紧急状况时的社会调节都弃之不用了。因此这种功能实际上不宜用于控制混乱局面。

^① H. 诺贝克：《自我综合功能》，见《国际医学心理分析和意象杂志》，第16期，1930年，第301—318页，此处引文见303页。

显然有许多社会组织形式由于其强烈的适应要求，不会给主体留有发展自发性、个性和定向能力的余地。由此产生了定向恐惧，这种恐惧导致象米尔格拉姆和艾斯勒所描述的向有时恰恰是适当的社会要求投降，这种要求往往只能造成短暂的安全。由于人们是从现成的愿望立场出发的，所以他们害怕与社会隔绝，害怕丧失社会的承认，害怕再也不能被一视同仁，或者甚至害怕当逃兵，害怕被当作敌人，所有这些恐惧导致人们和社会所提供的典型行为模式同一化，而这种模式是根据个别利润利益而塑造出来的。^① 尽管这些恐惧是由现实社会状况所唤起的，但是它们和早期幼稚失恋恐惧，和死的恐惧有关系。^②

自我综合功能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完全可以得到高度的发展，而且在上面所说的社会条件下重新恢复到原先的阶段，至少可以在一定的生活范围内，特别是在公开范围内，即在政治范围内部分地得到恢复。从技术上来说，自我综合功能能够得到高度发展，然而从对人类的客观关系来看，只能缓慢地发展。从心理上来看，可以把它看成是自恋问题，这一点在艾斯勒的士兵们身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论点：由社会技术取代政治选择，这种当代的倾向导致了退化，导致了种系的退化。因为有人出

① 参见 K. 哈恩：《被塑造的民主——集体幼稚行为》，见《论证》，第 42 期，第 9 年度，1967 年，第 1 册，第 26—41 页，特别参见第 33—36 页。当有人不守本分时，行为社会的准则的压力就变得特别明显。例如，不能适应规定的病人角色的大脑受伤者将被开除。参见斯贝林：《大脑受伤者的心理社会状况》，斯图加特，1967 年。

② 我在这儿把恐惧与无权和现实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这决不意味着，我想走心理分析修正主义的道路。因为我只是在这儿强调，当社会关系激起恐惧时，它是与幼稚问题有联的。本文曾修正地使用了“与攻击者同一”的反抗机制的提法，社会虽然没有露面，但它借用其它人的预料得到的期望态度代替了童年时代父亲的态度。在社会中无权的感与人们在父母面前，在大人物面前处于无权地位的幼稚状态是有关的。在社会关系中，不幸首先被感觉为受到了无名的命运的惩罚，就象童年时代受到父母的惩罚一样，然后这一命运个人化了，并在某些人身上显现出来，例如在犹太人身上，这样一来就阻碍了对个人的无权作社会分析。

于统治利益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规律性，所以霍克海默尔^①在《权威和家庭》一书中指出，在这一社会里，权威是怎样转化为盲目的特殊的再生产过程的。我们无论在米尔格拉姆的试验中，还是在艾斯勒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罪责感——来看这个问题。当代英国社会人类学家 M. 福斯特写道：“有些人类学家主张这样一种观点：许多非欧洲人虽然有羞耻感，却没有罪责感。我怀疑这一点。在所有社会中，仪式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用合法手段使自己不负担罪责，把罪责归于别人或不指名的掌权者。在许多原始社会里，礼仪习俗主要起的就是这样一种作用。这样就使人觉得，他们——和欧洲人相反——是没有真正罪责感的。事实上，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使个别人和它的决定严格地同一化了，也许都有些过于同一化了——有效的道德使他没有别的路可走，正如原始社会给个人提供了出路（仪式）一样；他是和罪责同一的。这似乎和社会关系的专门化，和我们这个社会中官方的义务和私人的义务的严格分离有关；很显然，这就是在现代工业国家里，精神病人和精神神经病人增多的原因之一”。^②

这里并没有谈到问题的经济调节方面。但我们应该基于上述事实来看待我们的问题：一方面存在着对个人责任过于信赖的事实，另一方面是社会合理的适应要求，这两者的不协调性就是问题的所在。实际上责任只在于满足适应要求，米尔格拉姆试验把政治冷淡向我们展示为道德冷淡，这种政治冷淡的根子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不负责任。

E. 克里斯和 N. 莱特斯两人在一篇论宣传的文章^③中指出：

① 霍克海默尔编：《权威与家庭》，巴黎，1936年，第3—76页。

② M. 福斯特：《意识》，见《原始社会的机构》，美国河畔法兰克福，1967年，第93—106页，此处见第102页等。

③ E. 克里斯和 N. 莱特斯：《走向二十世纪的宣传》，见 G. 罗海姆编《心理分

通常情况下，只要人类把社会事件看成类乎自然的过程，而不是他们自己有所贡献的事情，他们对社会事件就没有责任。因此道德标准只能用来衡量个人的作用在哪些场合是直接的，在哪些场合是间接的，以及在哪些场合可以看作是决定性因素。道德的——在较高的抽象水平上同时也是政治的——淡漠出现在所有大的官僚主义的社会关系中，而道德则表现在家庭这个狭小范围内，以及和政治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个人只能在无关紧要的范围内流露出一点点主动性，从而感到自己事实上也是有责任的，即也应施加影响以求变化。

除了许多其它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了。人类为什么要受专家政治的管理，受现有统治制度的束缚，而不去寻求新的社会交往方式，以获得更多的自由呢？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这又该作何解释呢？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艾斯勒在研究中所接触到的幼稚的自恋结构为了自身的需要，直接地利用社会事件，诸如技术、战争等，以有计划地防止幼稚的恐惧和攻击。我们已经指出过，在消费范围里，似乎出现了工业的销售需要和人的前恋母情结的经常的需要之间的直接联系。对于不确定的自恋结构来说，其特点就是要在满足需要方面尽可能的减少不快。这种情况在追究人的责任以直接解释社会事件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不是研究经济危机的原因，而是寻找负有责任的人，例如犹太人。

在这种幻觉系统中，例如在反犹主义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地引起的极微小的对不快的容忍，极微小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就是主体宁愿受技术管理，而不愿作政治选择的原因，而政治选择则必须要有和较大的不快联系在一起的自我综合功能。因为只要这个社会制度在经济上起作用，那末由这个制度本身及其适应要求而产生

析和社会科学》，第1卷，约纽，1947年，第393—409页。

的原始的心理结构就是保了险的,而其可靠程度要视自恋的,特别是属于口头阶段的疑问的大小而定。米切利希说:“……年轻人很早就受到了训练,培养他们的嗜好,并成为可以操纵的,这种嗜好被当成自由供给他们;利用嗜好手段的自由,把性欲当成嗜好手段的自由以及在亚文化群中日益增长的攻击性分裂的自由。”^①

因此嗜好手段的大量提供使人易于受控制。当然也不只是性欲。只要一个人能够适应,那末满足短期内的极为稳定的需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这种嗜好性的乐趣要求恒久化,于是政治抉择的解决办法就被感觉为不安宁,甚至是危险的。政治抉择总是和这样的想法联系在一起:“会使物质条件恶化”。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政治淡漠感和极低发展阶段的自我的乐趣原则相适应。保持社会现状,甚至在一定的统治范围内尽量用现有的办法保持现状的合理性,这就是说,靠技术专家统治来解决社会冲突符合嗜好者的需要,他们在有利于具体意识的中介中,失去了通往现实的道路,用技术专家统治来解决社会矛盾成为使嗜好乐趣仪式化的尝试,它的任务是遏制原始的勇气。

这种本能需要和角色任务之间原始的合作是用社会恐惧进行的一项重大试验。因为除了根据嗜好者的不同类型而满足其暂时出现的需要外,恐惧成了这种社会的粘剂:害怕不能预知这种乐趣的条件,害怕自己不能支配这些条件。当满足的机器需要修理时,政治淡漠者的这种恐惧就变成了粗野的行动。于是在这种危机时代,本能需要和仪式化的任务角色间的原始结合的弱点就显现出来了:自我的综合功能就要适应这样一种情况:不允许它对满足需要的实际条件进行监督;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只抓住了眼前的表象,只认识到这些条件的抽象结果。这样一种意识的社会观念的天真幼稚性迎合自我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偏执的——因果需

^① 米切利希:《社会的我与个人的我》,第30页。

要，而不是对事物本身作深入的了解。米切利希对社会恐惧和政治淡漠的心理学关系作了如下的概括：“对本能需要的这种特殊的仪式化的任何一种（由内部推动的）新的试验，任何一种来自外界的（异在的）变化，都产生了不快，即恐惧，而且给抵制了。然后自我倾向于避免恐惧就很容易地有利于现存的准则，尽管这对个人来说可能是非经济的，是非理性的。这里只能确定，仪式化在功能上代替了特殊类型的固有的被控制的本能行为。它们产生了保守因素，即平衡，没有这种平衡，任何社会都不能运转，而不论这种仪式的内容和方法是多么的荒谬。哪里的仪式还伴随有不成熟的现实观（种系发育的或个体发育的），哪里就可实现人和社会的原始结合。”^①不成熟的现实观是恐惧的结果，这种恐惧促成有利于统治利益的强大的异化社会。这种恐惧表现在对政治的淡漠，而如果受到供养者的奇妙幻想被扰乱了，政治的淡漠就会消极地自恋地，但也会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之所以会被扰乱，是由于要求发展疑问意识，而对嗜好者不只是要求他们只注意自己的个人问题，而且他们必然会发现，在这种问题上社会也是要介入的。为了大多数人能够自我定向，认辨能力不止一次地被介绍给了他们，但他们却由于无权势而碰了壁，并坠回到恐惧和政治淡漠之中，和要求得到供养。避免不快的仪式化是社会雇佣和心理雇佣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化的自恋主义”^②是法西斯式群众运动的非理性潜能。它是技术专家治国倾向的产物，同时也是在试图解决社会冲突时，倾向于技术专家治国的强大动力。

① 米切利希：《社会的我与个人的我》，第27页等。

② Th. W. 阿多诺：《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关系》，见 Th. W. 阿多诺和 W. 迪尔克斯编《法兰克福社会学文集》，第1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55年，第34页。

四、攻击性和暴力——威慑 政策的论点

〔西德〕D. 森哈斯*

在五十年代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的文件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论点：战争在人的头脑中揭幕。这句话既对，又不对。对是对在现代国家的历史制度表明，战争从来不是盲目自动爆发的；对是对在战争的发动总离不开人的决定。如果肯定这些决策者本人只是力量的傀儡，因此并非是侵略和反侵略的真正动力，那末如下的事实就是不可移易的了：只有人的参与，战争才能爆发，而不论这种参与是盲目的，还是被蒙骗的。

个人的攻击性和社会的暴力组织虽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可以肯定，有组织的暴力不只源自个人攻击性的总和。今天，政治、科学和经济被组合成一体（这种组合以有效的军事机器为前提），并以军事形式表现出来。有鉴于此，出现了这样一种普遍的观点：战争在人的头脑中揭幕，战争是由于人不辨是非的结果^①。

我们致力于建立和平秩序，如果我们在这种努力中想防止幻想、虚饰，以及挫折，那末我们就不能把这种努力看作为一个可以从个人角度来考虑分析的问题。我们必须从经验的角度来看是唯一现实的观点出发：人类的存在今天正受着不断增长着的非和平性的威胁，这种非和平性具有社会组织的特殊形式。但是这就意

* D. 森哈斯(Dieter Senghaas), 1940年生于今西德盖斯林根, 现为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助教。——译者注

① 《论社会暴力组织的历史》，参看J. 内夫：《战争和人类进步》，剑桥，1950年；E. 瓦格茨：《军国主义史》，伦敦，1959年。

味着，我们必须把导致非和平性的社会战略和与之相连的集体行为的攻击性内容，亦即我们感觉为集体的非和平的全部实践看作为有组织的社会内部的和国家社会的一种构成——看作为一种具有固有的动力学和不可混淆的特征的组织。我们必须懂得，今天，非和平不是一种偶然的可以用某种努力多少排除掉一些的社会现象，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换言之：我们必须懂得：非和平已长入我们社会的现实结构中，它在当代国家社会组织中已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了一种惯例。

我们对于这种关系实际上知之甚少，这在最近为和平计划，为和平经济，为和平教育，为和平神学而作的大量宣传辩白中可以看得很清楚^①。这种努力肯定是值得促进的。然而问题是：例如，为何为和平计划的宣传辩白（这种辩白是多么的真诚坦率）不能明确地讲清楚，今天正以不可想象的方式方法全力计划着非和平，而和平计划却必然与这种形式的计划相对峙。问题仍然是：为何积极推进科学的和平研究的要求是不以这样的决定性认识为先行的：没有已取得的对科学及其能力无先例的动员，目前的非和平形式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肯定，许多和平努力具有不合理性。如果我们不想自欺欺人的话，就必须认识到这种不合理性。例如在回顾已过去的二十年时，有人常常要谈到相对和平时代，就是这样一种欺骗^②。

我们对和平问题的看法，主要决定于对当前最起作用的战略观念——威慑理论^③的评价。我们有着强烈的威慑感，这主要表

① 对此的批评可参看 H. -E. 巴尔编的《世界和平与革命》，汉堡，1968 年。

② R. 柯伦：《战争与和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3 年。

③ 进一步的阐述可见 D. 森哈斯的《论有组织的非和平性的病理》，见巴尔编：《世界和平和革命》，第 107—154 页。

现为，公众舆论几乎毫不怀疑威慑政策的合理性。关于威慑政策本身，目前东西方都没有原则性争论；主要的争论在于这一政策的实施方式。而非和平性的特征在威慑制度里暴露无遗；专家治国论者计划的非和平所陷入的进退两难窘境直接表现在这一制度上。因此威慑远不止只是在紧张万分的危机时期才偶尔被谨慎地用来“控制危机”的政策，而近来的文章却正想这样来解释威慑政策。

笔者不必在此重复威慑的历史细节^①。它的发端是很清楚的。使政治武器发生了一场技术革命的暴力手段是如此的重要，以致于不能把它同传统的手段一视同仁。毫无疑问的是，原子武器使政治意志和为了实现这一意志而在极端状况下必需的暴力手段之间的关系受到了破坏。第一代原子武器就太可怕了，以致于不能完全使用它。军事和政治分析家们一直在谈论着政治的瘫痪^②。

传统的政治比例有可能变得不合理，在这一发展阶段，人类的历史必须发生一次转变。对人制造的死亡武器的无穷威力的认识，可能导致国家社会组织来一次戏剧性校正。然而无论是这一认识，还是和绝对非理性政治制度（如法西斯制度）的斗争都促使新组织形式的降生，绝对非理性制度以最大的自我残杀性不惜用集体自我欺骗，乃至整个社会的崩溃为代价，来推行暴力政治和强权政治。

在历史发生了这一可能转变后的二十年，我们必须肯定，传统的政治理性的力量（没有可用的暴力手段，它将是不可设想的，也

① 参见 R. 莱文：《权力的争辩》，剑桥，1963年；E. 施瓦茨：《战略——昨天，今天和明天》，迪塞尔多夫，1965年。传记性材料可见 F. 格林：《极端的逻辑》，哥伦布，1966年；J. 拉塞：《威慑调查》，见《和平调查杂志》，1966年，第3卷，第297—327页，以及 E. 克诺洛赫和 D. 森哈斯：《和平研究传记选》，见 E. 克立本多夫编《和平研究》，科隆，1968年，第三部分。

② 例如 H. 基辛格的《核武器和外交政策》，慕尼黑，1959年。

是不能存在下来的)战胜了从灾难中成长起来的,因为新的可能的恐惧和深渊而变得更加锐利的群众洞察力。今天,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十年的进退维谷已被克服了;今天,看来传统政治的困难也被克服了。慢慢地重新获得了“合理地”使用暴力的概念,这就是艰难地发展着的战后历史的一个成果,尽管正是靠了核武器的力量^①。二十年前看来不可想象的事情,今天不仅成了天天在议论的题目,而且早已进入了技术工艺和社会技术体系:全部可以现实化的暴力力量都进入了武器体系,而且根据政治需要,用以进行威胁和加以使用。因此今天我们在可以想象的实际光谱内可以使用各种暴力概念,这一光谱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宽,层次更多:这一光谱从思想意识的宣传到反游击战观念,从不同程度的常规战争到实际核战争,到各种各样的计划认为可行的核战略战争,还预示了生化战和细菌战的可怕可能性(公开的讨论总是小心翼翼地免提这两种战争)^②。技术力量已经准备就绪,以便被用于这些战争阶段和战争设想。这种发展集中反映在逐步升级理论上,不同的暴力概念都被融合在这一理论中^③,而这一理论又迅速上升为颠狂。如同个别的战争设想理论一样,逐步升级理论就总体而言,一向认为近二十年来不断更新和发展的力量可以根据政治需要的变化,而有控制地加以使用。核战争的进行是可以设想的。^④

① 参见 K. 克诺尔:《论军事力量在核时代的使用》,普林斯顿,1966年; W. 科茨:《武装力量是一种力量》和《重新审议的战争理论》,纽约,1966年; T. 谢林:《权力和影响》,纽黑文,1966年。也可参见 S. 霍夫曼:《战争状态》,伦敦,1965年; K. 华尔兹:《国际结构,国家力量,以及世界力量的均衡》,见《国际事件杂志》,第21卷,第215—231页。

② 参见 M. 霍尔珀林:《当代军事战略》,波士顿,1967年。关于法国人埃雷兰特,阿隆和比夫勒等的讨论,请参见 E. 克洛德齐:《法国的紧急战略》,见《国际政治》,第19卷,1967年,第417—442页。

③ H. 卡恩:《逐年升级》,柏林,1966年; A. 格罗克曼:《论战争》,巴黎,1967年,第241页等。

④ 参见 H. 卡恩:《不可思议的想法》,纽约,1962年。

我不打算详述以威慑战略为基础的各种战争图象^①，而只打算描述一下威慑政策的主要之点。上面提到的暴力概念的异同和武器潜力的相应展示，其根源在威慑原则本身。威慑政策的存在靠的是对这一政策的信任。但是只有似乎是完整的威胁报复体系才能使威慑政策令人生惧。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一特点。一方面是根据威慑原理及其拥护者们本身的意思。他们认为，敌方在所有冲突阶段都潜在地是侵略性的，因此必须在所有阶段都加以遏制。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技术发展和对各种冲突的估计之间的相互作用，上述考虑导致了战术核潜力的形成，导致了常规领域的加强措施，导致了各种分阶段核战争的战争设想，最后为了防止颠覆活动，特别是为了和游击战作斗争，潜力被武装化了。

这一完整的暴力图象的被迫形成对威慑来说既是其特点，又是必然的，可以设想对这一被迫形成进行另一种解释：使处于完整的威慑体系中的对方没有机会想到，他在实际上要受到进攻，和他的威慑体系是有漏洞的。如果威慑体系有漏洞，如果假想的越来越富侵略性的（“潜在的”）对方不会利用这一漏洞，那末整个威慑体系的彻底完善化也就没有必要了。如果体系是天衣无缝的，那末实际上也就不可能假想对方会采取侵略行动；对方始终是潜在的进攻者，在这样一种体系中，用不着拿出事实的证明来，或设想会有什么事实的证明，因此唯一合理的看来应该是对所有假想的、可能的冲突，而不是对也许可能的冲突作准备。^②

这种解释使威慑体系内的犬儒主义显现了出来，我认为这种

① H. 柯恩的《论热核战争》（普林斯顿，1960年）对此作了尽管不太全面，但较为广泛的描述。

② 关于国际政治中可能存在的思想，请参看 E. 弗罗姆的《人能获胜吗？》（纽约，1961年）和 C. 奥斯戈德的《是战争，还是投降？》（厄尔纳，1962年）。

解释比威慑理论本身所宣传的解释更可信。因为它指出了另一个对威慑来说不无典型意义的特征,即在相互威慑的这种体系中,对立者总是盯着对方,而且这种盯着连同服从于对立者们的基础使威慑体系能粘结成一体,但另一方面,战争图象,即盯着对方的根据,在真正冲突的彼岸,有些自动地发展了起来。

论述逐步升级战略的文章是描述威胁幻想的范文。柯恩把可能的冲突按其紧张程度分为四十四级,其中有二十多级是核冲突。用对具体的、也许可能的冲突的可能性和原因的估计已不再能对威胁幻想作合理的解释。威胁幻想已获得了它自己的生命,当然是源自威慑原则本身。这一幻想勾勒了冲突情况的草图,这些情况不只是不现实的,而且对它所作的阐述主要屈从于双方正自动地越来越自我忙于暴力、暴力外交和威胁战略^①。结果就产生了几乎是无以复加的学习病态,它必然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威慑政策天衣无缝的实际程度的发展使通向政治选择的道路完全被堵塞了,整个政策的伸缩性被取消了^②。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两个超级大国越是互相钳制,它们相互的了解就越糟糕。因为在威慑体系中搜罗来的情报是打上了朋友—敌人的形象这种烙印的,是打上了固定不变的烙印的,是有偏见的,假想的。就这些情报的内容而言,是对对方的无可怀疑的打算和目的的假设,这些假设实际上是自己幻想的表现,而并不是具体分析的结果。

因此虚构及由虚构而造成的缺乏现实感从结构上来看是隶属于威慑体系的,而且只要存在着威慑政策,下面的情况就是不可避

^① 在这一方面很有启发性的是 H. 柯恩和 A. 维纳的著作:《二千年》,纽约,1967年,特别是“二十一世纪的恶梦”那一章,对此提出的批评可参看 A. 拉波鲍特:《奇克致柯恩》,见《弗吉尼亚周报》,第 41 卷,1965 年,第 370—389 页。

^② 对威慑政策的学习病态的动力学的详细分析可参看 D. 芬利, O. 霍斯蒂和 R. 费根对杜勒斯政策的研究著作《政敌》的第二章,芝加哥,1967 年。

免的：这一内在的威胁的和暴力的幻想凭借其本身的动力继续滋生着^①。一旦开始了，它就自己发展着。由于一般地讲，人们既不能证明威慑政策的成功，又不能证明其实际上的失败，因此它就不断地自己发展着。这一点并且通过如下事实得到了加强：敌对双方的相互关系并不能由所宣传的报复威胁来加以检查，武器体系的社会技术结构并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因此监督的有效性完全是假设的，是威慑方案中最成问题的观点之一，因为有没有机会用威胁战略对对方的行为施以影响或者加以监督这一问题在战略家们本身那儿就是有争议的。但恰恰是这一假设支持了内在的威胁幻想的自我动力。今天，威慑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它那几乎无可辩驳的根据主要就在于如下的可能性：它既可以逃避作出是成功的实际证明，也可以逃避作出是失败的实际证明^②。

二

我指出了在威慑体系后面的威慑幻想，为的是指明威慑幻想对日常政治所起的强制作用，以及只要有意识地执行威慑政策，那末日常政治就不能避开这种强制作用。彻头彻尾的敌人形象是和现代武器体系的全部特征相一致的^③。

今天人们常常用进一步的需要，即需要使冲突本身固定下来以证明威慑的必要性^④。军事环境的固定及对政治稳定所起的反作用是威慑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是一种尝试，企图借助武器系统及与其有关的理论和行为方式使传统的国际体系成为一个可靠

① 对威慑政策自动性的分析可参见D.森哈斯的《威慑批判》，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7年，第164页等。

② 参见J.弗兰克：《公正和遗风》，纽约1967年。

③ K.斯密特：《政治的概念》，柏林，1963年，第102页等；《游击队员的理论》，柏林，1963年，第44页等。

④ 参见T.谢林和M.哈贝林：《战略和军备监督》，纽约，1961年。

的、可监督的行动场地。但这主要是这样一种尝试：借助心理战略克服过时的国际关系结构所造成的政治僵局。这一努力的结果和如下的设想一样是成问题的：应该用战争手段的不断改进使战争成为不可能。我们知道，技术专家们的这一全球战略并没有取得成功；暴力行动并没有被从国际政治中剔除出去，军事环境并没有稳定下来。因为从长远来看，如果威胁要采取的行动并没有及时地变成事实，以使人们重新建立起对威胁的信赖，那末这种信赖就会不断减弱^①。因此威慑就屈从于它固有的强制性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和威慑固有的目标是相背的，这种不稳定性最终是为了不断重新证明威慑的必要性。

由军事技术革命开始的发展并不能用技术的理性来遏制，政治问题也不能用军事的和政治的威慑战略来解决。这样一种全球战略所可能达到的目的，最多只能是在短期内使冲突成功地兑现：冲突或被操纵，或被排除，或被推迟；一般来说，总是被加剧。

威慑政策是技术专家们的一种心理战略，它力图使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对比稳定下来，它同时又必然会促进恐惧，不信任，敌视和侵略的意识，并因而使力量对比不能稳定下来，这就是威慑政策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威慑体系只能通过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战略理论描绘的威慑政策的发展来达到稳定，另一方面这样一种威慑政策必然对所达到的发展水平起一种破坏稳定的作用。威慑政策是推动战争想象和屈从于这些想象的意识内容及社会组织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使军备技术所达到的任何一种水平都成为旧水平的动力；在威慑体系中，一方的威慑政策激起了另一方的威慑政

^① 参见 K. 布丁：《军备限制和统一行动是建立和平的因素》，J. 库格伦和 J. 雷曼：《近六十年来的军事监督》，伦敦，1967 年，第 237—246 页，J. 弗兰克：《还要阻碍多久？》，见《战争与和平报告》，1968 年 2 月，第 3—7 页。

策,而且它们总是互相对应的,因此很少有机会能阻止威慑幻想和暴力外交业已开始的竞争。严酷的结论是,武器体系每四至六年要解体一次,在同一时间内,在传统的威慑体系内的战略家们一再把武器的缺陷称作“灾难性缺陷”^①。因此技术就被迫作螺旋形上升发展,而新技术从未能打碎威慑体系,而是最终只能重新证明自己需要再发展,这种强制性是不现实的政策的主要特征^②。柯恩提出的战略概念的词汇使我们能洞见到被看作是科学的一门学科的幻影。严格地说,威慑政策及其语言(以及它们的组织)只是同一个战略基本模式的变种和新解释。

三

没有一种政治战略是靠自己生存下去的。没有社会承担者的战略是不可想象的。那末是谁承担着威慑呢?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权贵们几乎都参与了威慑实践^③。最高层的政治界、军事界和科学界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继续发展着威慑政策。当然如果不将集体的社会的心理因素动员起来,那末威慑就将不起作用^④。只有当社会象威慑社会一样行动时,就是说,只有产生了集体的侵略的动机流时,只有为威慑付出的代价被相对来说是无异

① 顽固宣传“灾难性缺陷”的部分原因是威慑政策总是特别强调冲突和紧张,C. 劳维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威慑占上风的政策”,参见劳维的:《为世界创造民主安全,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载J. 罗森那编《外交政策的国内根源》,纽约,1967年,第295—331页。

② 参见笔者《被塑造的社会》所作的分析和H. 劳斯万尔的《兵营国家的模式》,载《原子时代》,第7卷,1965年,第272—275页。

③ 参见M. 皮里萨克和T. 海顿:《有没有一个阻碍和平的军事—工业联合体?》,载《社会杂志》,第21卷,1965年,第67—117页。关于苏联集体的威慑政策的讨论,请参看K. 加斯特耶编的《苏联的战略和裁军政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4年和W. 兹科洛夫斯基编的《军事战略》,科隆,1965年。

④ 关于这一问题必须考虑到对平民防卫问题所进行的讨论。

议地接受时，作为宣传机器和政治武器的威慑才具有效能^①。其结果是恐惧和暴力的最危险的混合。人们在恐惧和暴力的相辅相成中，看到了威慑的本质特点^②，即一种精良的用来训练群众守纪律的工具的特点^③。这个工具极易操纵，因为内在的（幻想的）威慑政策能不断地在自己社会的面前建立起新的潜在的冲突和指出存在着这种冲突，因为世界政治的冲突能在现状的范围内为威慑战略的“意义”提供足够多的幻想材料。威慑政策应该阻止战争，然而威慑政策和危机，以及大国的战争行动在世界上接踵而来。大国一方面伪装企求稳定，企求和平共处，并把威慑政策看作是企求稳定和和平共处的适当的基础和相应的手段，另一方面它们又不断地煽起冲突和不睦，并通过它们的公开的和煽动性的行动，使世界政局动荡不已。威慑在暴力政治和威慑外交（它们的产品和代表也就是威慑）的环境中，对公众意识起着一种诱人的行动准则的作用。它为自己创造了这样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它看来是一种极有意义的战略；在它的身上，目标和手段是一致的。然而威慑的一个主要弱点和致命危险的根源就存在于上述它自己创造的特性中。因为威慑战略以及一般的威慑行为都会使人产生盲目性^④。威慑战略使个人和集体不能理智地思想，并促成无知。这一政策把只能证明其自身设想的情报动员组织起来，这一政策始终在虚构的威慑想象的范围内活动着，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情报

① M. 罗森贝格：《冷战时代的态度转变和外交政策》，载 J. 罗森那编《外交政策的国内根源》，纽约，1967年，第111—159页，特别是第113—126页。G. 布脱尔：《拯救战争》，巴黎，1961年，第46, 74, 187, 188页。

② H. 鲍赫：《虽有战争，和平仍存在》，慕尼黑，1966年，第7—16页；F. 福纳里：《原子战争的心理分析》，巴黎，1968年。

③ E. 海宁：《军备社会及其代价》，见《原子时代》，第9卷，1967年，第296—308页。

④ 我们想到了对知识这一概念所作的系统分析。参见 D. 森哈斯：《社会神经机械学和统治》，见 R. 斯密特编《政治学的方法》，达姆斯塔特，1967年，第554—567页。

机器和秘密组织，尽管这一政策在不断完善，它却变得越来越愚蠢。整个社会都在愚蠢化，导致威慑渗入全社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对威胁和敌人的想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世界上将发生什么的想象，可以维持一段长时间，或至少能维持到现实和想象的差异大到这样的程度：敌人的形象或者必须用强有力的内政措施来加以证明^①，或者必须慢慢地淡化消失。但是威慑政策引起的错觉和错误估计的可能性增长的危险却始终存在着。今天，因错误而付出的代价，因盲目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国际政治中的狂妄自大而付出的代价已急剧地增加了，因此这一政策也就更令人疑惑^②。今天，国家，特别是大国正系统地不自觉地推进其自身的集体的愚蠢化进程，它们自认为是在学习，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学到，这种情况真是最危险不过的了。

四

从全球来看，全球威慑战略只受到一些枝节问题的威胁。就其内容及其机器而言，它是一项巨大的错误投资。因为它通过它自身的投资和蕴含着冲突的那些问题的解决是直接对立的，这些问题是和文盲，和饥饿，和疾病，和常常是甚嚣尘上的不公正作斗争的问题，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有效的国际组织的问题^③。当我从这一意义上完全自觉地谈论有组织的非和平体系时，那是因为对人类基本生活需要的投资和对有组织地拖延解决这些问题的投资的差异并不能在短期内很轻易地加以克服；这一差异构成了当代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的结构核心。

威慑的代价远远超过了所谓的防务费用；其牺牲品有那些死

① 例如采取平民防卫措施和紧急状态的措施。

② 参见 K. 道奇：《国际政治分析》，恩格尔伍德，1968 年。

③ 参看 R. 加特纳和 M. 米里肯编《全球合作，国际力量 and 经济发展》，见《国际组织专刊》，第 22 卷，第 1 期，1968 年冬。

于饥懂的人们，有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们。热核武器潜力的出现意味着打开了一个缺口，无庸怀疑的是，在国家的传统利益及强权政治和适应于二十世纪中期条件的威慑政策之间存在着一种延续性^①。人们必须意识到这种延续性，以便懂得，暴力和政治同现代技术工艺手段的重新调和令人多么气愤，在可预见的时间内，由于战后这一重要的发展，不久可望和平的愿望是多么的渺茫，就这一和平而言，它将再也不能出现在已组织起来的非和平之中。

五

和平只能存在于威慑的彼岸。这是从过去二十年历史中得出的明确的教训。只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威慑实践进行批判以后，和平目标才能确立起来。只要和平计划和和平科学还没有打破专家技术治国论者的非和平计划的桎梏，只要还没有打破威慑的桎梏，只要对威慑的观念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那末和平政策的实际开端就无从谈起^②。唯一可能的现实的和平努力是拆毁威慑体系。不能批倒这一观念和打碎与此有关的侵略性的意识结构和组织的批评，只能是空谈，是不会有有什么效果的。没有一个摆脱了过时的威慑政策的政治的、战略的和心理的强制的意识，要想在由威慑本身所竭力煽起的侵略性意识结构上打开缺口是不可能的。因此，彻底地从原则上批判威慑将是和平科学和和平政策的关键，特别在今天更是如此，因为为威慑所作的辩白从未象今天这样多，威慑的“合理性”看来从未象今天这样无可争辩，威慑的计划从未象今天这样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科学上都成了不准议论的禁区。

^① 政治和暴力机器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由于史无前例的武器技术而有所变化，而且也是由于史无前例的政治目标而有所变化，史无前例的政治目标的根子又是由于高度工业化社会的结构变化。

^② D. 森哈斯：《受威慑禁锢的和平研究》，见《政治季刊》，第9卷，1968年，第3册。

五、工业文明社会彻底人道化的可能性

〔南〕 M. 马尔科维奇*

—

当代工业文明增加了人类过与其潜在能力相当的富裕自由生活的机会。可是人类迄今未找到利用这种机会的途径。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仍然存在着奴役和贫困。

技术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社会力量,但是人类不仅没有支配这些力量,却相反地受这些力量所支配。国家、康采恩、军队、教会、政党和思想按照自己的逻辑在运转着,人类还没有从本质上懂得这种逻辑,而这种逻辑过程却带来了预想不到的结果。

这些力量使我们能够征服宇宙空间,却没有被用来从地球上消灭贫困、饥饿、最常见疾病、文盲和儿童的大批死亡。

在当代文明世界里,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的最基本要求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得到满足,而同时又产生了某些人为的要求,首先是要求尽量多地占有非实用的东西。当代工业社会不是尽可能去满足人的最基本需求,而是进一步扩大了那些一心想占

* M. 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之一,1923年生,曾任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教授。“实践派”办有《实践》杂志,1975年被禁止出版,后又筹备出版国际版,由马尔库维奇和美国哲学家 R. 伯恩斯坦任主编,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芬兰著名的分析哲学家 G. 冯赖特,移居澳大利亚的卢卡奇的学生 A. 海勒和 G. 毛尔库什等人,这些人以前每年都在南斯拉夫科尔丘拉岛夏季学校聚会一次,布洛赫、弗罗姆和马尔库塞等也常来参加聚会。1981年1月贝尔格莱德大学解除了马尔库维奇等七位“实践派”学者的职务,马尔库维奇去美国定期讲学的护照也被吊销。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指责“实践派”为无政府自由主义政客,是第五纵队。——译者注

有的人的队伍,占有就这样成了一种地位象征,而不再是实现真正价值的手段。

现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旧的鸿沟逐步被一种新的鸿沟——一小部分人的创造性劳动和大部分人因此被迫从事单调劳动之间的鸿沟——所取代。

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它并没有使社会状况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更人道化:在生产率迅速增长的情况下,高工资并没有排除剥削,相反,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资和剥削在同时增长(剥削就是占有不付报酬的剩余价值)。从经济观点来看,对工人来说,不管是资本家,还是官僚,都是剥削者。

技术的文明进步创造了各种方法来克服人与人之间地区的和时间的距离,如大城市,快速交通工具,现代化交流手段等等。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文明社会的一体化过程在不断发展:同一种技术在全世界推广,经济合作交流在发展,文化在渗透,国际政治组织在建立,艺术在相互影响,科学合作在蓬勃发展等等。但同时,强大的分离因素也在起着作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论战、宗教偏执妄、职业化,以及由于如政治、法律、道德、科学、哲学、艺术等各种社会活动范围差异的扩大和孤立化而造成的过细分工。其后果就是使人与人之间过分离,互不往来,互不理解和偏执,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弱。

现代技术及民主化使人类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我们把自由理解为可以自由选择,当然任何一种选择都取决于选择者以什么标准进行选择。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些标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广泛而强大的宣传机器所控制。可悲的是,当现代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时候,却往往正在遭受奴役。

这种幻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它们的政府致力于和平。但是我们已在

战争边缘度过了二十个春秋。大多数国家领导人都认为，他们的一切决策都是合理的，并在特定条件下是正确的。但结果呢？所有这些“合理的”决策全都是不合理的，人类集体自杀已成为可能。

二

使世界人道化的思想是以一定的人类学定义为前提的，即人是什么？什么是人的本性？什么是合法存在？什么是真正人类生活？

通过对整个人类历史状况的分析，无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在实际上具有不同的，敌对的普遍功能。人一直在为获得更多自由，为打破历史所规定的全部技术、政治和社会界限而努力。而得到的却是奴役。

创造力是人的根本特征之一。和所有别的动物相反，他不断地使工具、工作方法、需求、目标及价值标准完善化。因此，人类历史尽管有过曲折和停滞不前，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部进化史。

而同时，人有反抗劳动和阻止创造新事物、新形式、新机构的一面。自古以来，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是不劳动，不变革，并视之为最大乐趣。为发展人的这种本性，我们这个时代已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人的毁灭能力已超过了人的全部创造能力。

人是一种社会本质，其意义不只局限于人是生活在人类共同体中，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即规定人之所以是人的一切特性（语言、思维形式、习惯、嗜好、教养、价值等等）都是社会的产物。人能够分析事物和形势，作出判断，想象不同行动方式的后果，并使自己的言行与目标相适应。但是这些目标往往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目标是以自己的本能、爱好、下意识愿望和一时的情趣为依据的。而且即使他的长远目标是合理的（这里是指对合理正确的

要求和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实现这些要求的可能性进行周密分析后确定的目标),而这些直接目标和人类为之而做的一切都有可能完全偏离遥远未来的长远目标。人生活中绝大部分事情是以习惯为基本出发点,而不是建立在他认为是合理的批判性基础上——甚至有时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他正在做的一切和他所承认的一般准则互相矛盾,和他从前自觉自愿地所承认的一般社会价值互相矛盾。值得注意的是,遗传的本能,一时的热情,根深蒂固的唯利是图的冲动,或者是精神紊乱,都是人的非理性行为的根本原因,而其中大部分则是人直接自发作出的反应。当然,在今天科学和计划的时代,有这种需求的人,如果不能冷静地思考,如果不能事先估计到自己行动的后果,那末就面临着与时代不相适应而无法生存下去的巨大危险。

还可举出类似的二律背反的例子,例如:人是友好而又带有攻击性,他想和其他人具有共同目标,但常常却喜欢互不往来。他非常保守,不愿和传统决裂,但另一方面,总的来说,却常常想改换生活方式。

粗看起来,这种二律背反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类社会的共同特征。而这种或那种极端占上风则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历史条件不是某种简单的已知数,而是在前进过程中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的本性是由哪些因素规定?哪些因素是我们预料到的,并通过当前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想确保它们在将来能占上风?

我们必须区分对人类本性的两种不同观点。然而如果我们剖析一下历史,再把人类处世中某些相对立倾向作一比较,就得出一个描绘性概念,在最佳情况下,还可作一番经验性叙述。然而如果我们单单去考虑人的某些特性并确信,人的相应性格须在实践中

才能练就,如果我们因此也可把这种性格看作“合理”、“重要”、“理所当然”等等的话,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价值性概念,就可以进行一番价值性描述。

可以采用不同方法来证明这两种概念,也可以用不同方法对这两种概念提出异议。可以用证据使第一个概念不能成立,想提出异议就可以设法证明这个概念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或者它并不具有普遍性,甚至还可以得出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这是一个可以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概念则不一样了,价值概念可以以事实为依据。这有两层意思:第一,这个概念和人类以前行为的某些固定倾向一致;第二,这些倾向在今后的实现取决于现在起作用的社会力量。但是这个事实决不能排除选择另一种价值概念,这种价值概念依据的是过去的另一些倾向,并决定将来的另一些可能性。在选择其中任何一种价值概念时,不能采用纯理论或通常的科学方法。这种选择取决于我们长远的基本方向(这种方向本身和科学知识无关,却同需要和兴趣有关)。

这时,问题的关键在于:根据谁的需要和兴趣?是根据个别人的,一个特定社会集团的需要和兴趣,还是大多数人的需要和兴趣?

因此人类本性的价值概念既要反映出若干私有的、孤立的、和在可能情况下人为的需要和兴趣,又要反映出带普遍性的、合理的社会需要和兴趣,这才是唯一正确的看法。例如这种看法可以证明,某种价值概念和人道主义的传统是符合的,但却不能证明因为有些东西过去是这样,所以今后也一定得这样。总之,它是选择不同价值方向的最合理基本点。

回顾一下二十五个世纪以来的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并考虑一下,适用于今天各种道德的几个普遍的基本价值,就会无可争辩

地发现：在其他条件都相同时，人类争取自由的倾向大于受奴役的倾向，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倾向大于在单调劳动中被消灭和处于被动状态的倾向，关心整个社会需要的倾向大于关心自己的倾向，希望合理地行动的倾向大于受盲目不自觉力量支配而行动的倾向，热爱和平的倾向大于侵略的倾向，等等。如果认为只有这些特性才是人类的本性，而所有其他特性只是表面现象，是在人的本性中找不到任何根据的伪造品，那么这种论调就是错误武断的。只要我们把这些特性看作人的存在的最理想的可能性，我们就能够从哲学上和实践上证明存在着一个规定价值的普遍标准。实现这种最理想的可能性就意味着过一种“真正合理”的人类生活，而不利用这种最佳可能性则意味着不是真正的人格，过的不是真正人的生活——过的是被异化了的生活。

三

本文开头就已讲过，当代文明的特征表明，大多数人迄今所过的是一种异化了的，不光彩的生活。

那么怎样来消除这种异化的最重要特征呢？怎样使世界人道化呢？

人道化的过程常常被肤浅地理解为对穷人和无依无靠者更加关切。于是人道主义就被狭隘地看作为制定救济纲领，消除物质贫困，消除饥饿和文盲，提高生活水平，制止残忍的政治压迫方式等等。所有这些从广义看当然是重要的，但并不是最本质的部分。对人道主义化作这样解释并没有触及到现代社会的要害。热衷于保持现状的人提出这种主张是易于理解的。已把一些弱小国家置于自己管辖之下的那些大国的最好的理论家并不想改变残忍的剥削方式，并使之合理化。他们也看不到，这样下去迟早会不可避免地引起被压迫者的强烈反抗。那些正在实施救济纲领和政治、经

济自由化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为废除某些过份贫困和奴役方式作出了贡献,但是他们也是绝对的非人道制度的辩护士。

如果我们对当今人类处境并不只是对其某一方面,而是从根本上感到不满意的话,如果我们准备探究今天使人类遭到贬低的方式的根子何在的话,如果我们确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个比强烈关心穷人和无依无靠者(通常只是象征性的关心)更深刻的变革的话,那末我们就必须把问题提得更具体,更彻底,就势必要谈到彻底的人道化。

马克思曾经说过:“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只要我们先从字面上,然后从价值上来理解“人类”这个词的含义,我们就能知道。后一句话并不是同义反复。因此彻底就是创造条件使人类在越来越大范围内成为一个自由的、创造性的、社会的、合理的本质。

主要的问题是:这是些什么样的条件?以及怎样根据它们的重要性来决定其轻重缓急呢?

是谁创造和赋予那些奴役人的社会力量(国家、军队、政治组织和其它组织)以权力的呢?

由于社会力量(国家、政治组织、军队、教会)奴役个人是确实存在的事实,所以问题就在于,谁创造了这些力量,又是谁赋予这些力量以凌驾于人之上的权力呢?

人类想方设法想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往往却适得其反,过的是贫困、受压迫和空虚的生活,这是事实,问题是:是怎样的社会机器把人类推向需求如此片面,如此贫困的境地的呢?

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感到很孤独,而在今天,当他生活在群众之中时这种感觉甚至更为强烈,这是事实。问题是:使人的全部渴望归于失败的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

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在甚嚣尘上,社会在原子化,政治在霸权

化,群众性交流手段在垄断化,人格在被吞噬,造成这些退化的客观原因是什么呢?

所有异化的根子都在于那些垄断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社会集团的存在。这种垄断或者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基础上(就象资本主义的阶级占有),或者建立在攫取支配物化劳动的权力的基础上(官僚政治就是如此),或者两种兼而有之。

这种垄断有两种后果。其一是利用公开或隐蔽手法攫取生产者的无偿劳动,也就是剥削;其二是剥夺了其他人决定社会问题的权利,即用或多或少粗暴的、公开的或隐蔽的方式独霸政治。

离开某种收入水平和生活标准来谈剥削就毫无意义,针对这种观点,我们必须懂得有两种因素在起着剥削作用,一种是劳动生产率,如果生产率比工资增长速度要快,剥削程度就相应提高。另一种是剩余价值的社会分配,即社会上的某些集团的收入超过了它们的劳动产值。这说明我们可以谈论各种隐蔽的剥削手段。这种剥削不仅存在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物质贫困的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存在于后资本主义社会,在那种社会里,还存在着强大的官僚政治机构。

和所有宣传、声明相反,当代世界并没有多少民主(民主成了一个被到处滥用的概念)。事实上,人类的绝大部分是根本不可能参与重要的决策过程的。那些应该在上层社会机构和政治机构中代表人民的人,他们的选举产生要么是由于他们拥有巨额资产,是由于他们有强大政党机器的支持,要么是由于选举人只能进行有限的选择和受到合法的操纵。在这两种情况中,特权阶层达到了政治独裁的目的,而其他社会阶层则感到无依无靠,直接感受到压迫。

这种在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称王称霸,并把所有其它集团象玩物一样加以操纵的社会集团的存在,就是当代社会所有非人道现

象的根子。国家、军队、政治组织等等，都是进行操纵的工具。大多数思想理论的作用就是掩饰这种事实的存在，或为之辩护。因为普遍流行的观点就是统治集团的观点，操纵人和事物的权力是任何一个剥削专制集团的主要价值，所以每个人都在努力减少他的需要——占有物质和占有其他人的需要。

形形色色的思想宣传和经济宣传在塑造人类的需求、性格、嗜好等方面，在制造对自由的迷梦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当那些控制交流工具的人要决定选举标准和范围时，这些宣传的作用就更大。对交流工具的垄断是维持和巩固所有其他垄断权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某一集团从十分特殊的利益出发而以整个社会的名义讲话时，它就代表了社会的普遍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失去了它的整体性，而分裂成敌对集团。职业、民族、种族、社会觉悟范围，所有这些都不再具有完整性。

因此世界彻底人道化就是创造条件，使每个人变成历史的主体，并积极投身到创造历史中去，首先是参与监督社会政权，这种人类彻底解放的基本前提就是废除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始终集中在某个社会集团手里。要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废除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决定性的第一步。而决定性的第二步是废除职业政治，因为它使特殊社会集团享有至高无上的支配物化劳动的权力，以及废除社会特权阶层——官僚。

这两个步骤中的任何一步都是彻底人道化的必要条件，但只有同时做到这两步，才具备了充分条件。

四

当代世界的人道化问题指的不仅仅是特殊的，地区性的国家共同体，而是许多国家的大联合。要使人类基本上过人道化生活，

首先要使这种生活成为可能。自日本广岛事件以来，对于人类来说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局面——一种普遍地、长期地存在着的不安全局面。不关心政治确实是危险而又不可思议。人类所创造的权力已大到超过某个国家和某个社会集团所能控制的程度。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霸这种权力，因为这种权力首先是科学的产物，尽管各个国家对科学贡献不一，但科学仍是普遍的、日积月累的结果。某些特殊社会集团职业领导人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他们更没有权利垄断这种权力。职业政治是一种与社会异化的，对所有重要的社会问题作出决策的行为，在新条件下，它不但显得无用，而且有害，而且特别危险。

今天反对武装暴力，为争取裁军和和平而进行的斗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如果人们要求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组织里，人类和整个国家不再被划分为历史的主体和客体，在这个组织里，要逐步铲除任何一种攫取社会权力的形式，因而这个组织是一个公开的、民主的、全人类的组织。

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才能实现持久和平，也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才能把人类从集体自杀的创伤中解救出来，但这并不等于说，靠消极和等待就可以用未知的暴力创造这样的社会；这并不是说，在今天到处都实现和平是天真的幻想，幻想和现实之间并没有十分明显的界限。它们之间的区别通常只在于能够达到和不能达到。如果人类都为实现幻想的目标而努力，那总有一天可能会变成现实。相反，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目标在客观上可能是不现实的，但是却能积极地激发人类的能量，而这种能量就能在演员们自己都不知觉的情况下，改变历史条件。

五

科学和科学界在当代世界的人道化过程中起一个什么样的作

用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对科学的理解，取决于人们认为它的哪些相互矛盾的倾向最为重要，取决于人们怎样利用科学成果。

科学用定义确定真理。但是怎样理解真理呢？

当代科学越来越强调过细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一个专业化程度很强的问题在专门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逻辑推理和经验验证，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这个结果只是个不完全的、局部的真理，它没有把某一现实范围内相当多的基本点考虑进去，而且人类对真理的理解也不明确。可是这种不全面真理在实际应用中却硕果累累，它能对某一技术问题或社会问题作出满意的解答，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行动效果。但是这种行动及其效果有的对人类有利，有的则不利。核武器就是片面地发展了对原子核性质最初认识而产生的结果。最危险的思想并不是那些建立在非真理基础上的，和科学尖锐矛盾的思想，而是那些利用不完全科学真理为统治社会集团的利益进行辩护并使之合法化的思想，一旦科学最终实现了专业化，那末它在滥用科学的人面前将无能为力。

在科学上，专家和真正科学界有着细微的区别。专家停留在部分知识的水平上，停留在解决一个专门问题时正确应用一般理论原则和方法论原则的水平上。换句话说，停留在技术的水平上。科学界知识分子则批判地、创造性地研究理论基础，他们确定相互关系，普及新的方法和新的完整体系，考查每项科学成果的深刻含义，并把这些成果熔进该时代的文化和哲学成果里。

与此同时，科学里存在着第二个根本矛盾。真理是纯粹的，完全客观而公正的知识呢？还是普遍价值的知识呢？在现代科学中存在着强烈的“科学主义”倾向：科学的使用似乎在对事物作确切描述和解释，研究者的感觉、情趣、观点以及所有类似“不正确”的因素都必须坚决排除掉。这种科学概念反映了社会中等级层，特

别是知识界异化于自己固有的普遍目标和价值。而另一方面，这种科学概念也易于被统治阶层所接受，因为纯实证的知识总有实用价值，也能解释清楚，这时，社会就丧失了它的批判性的自我意识。

许多实证主义哲学家在哲学范围内不自觉地使科学多多少少丧失了它的真正作用。他们认为，科学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对现实进行描绘和分类，推测和解释，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就这样，他们在为争取人道世界的斗争中把最有利的位罝让给了对手。

事实上，科学范畴内的知识分子和发明家并不是没有价值方向的，对于现实存在也不是不持批评态度的，对于怎样解释他们的精神产品，这些产品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以及怎样在实践中运用，他们并不是毫不关心的。所以，事实上本世纪所有物理学大师（如爱因斯坦、波尔、普朗克、海森堡、薛定谔、玻恩、德布罗意等）都是哲学家，同时，他们中许多人及其学生和接班人都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主义，反对滥用原子能，反对化学战和细菌战的斗争。另一方面，这些现代历史学和经济学大师们不仅对当代社会制度作了描绘和解释，而且对这种社会制度，旗帜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这样，科学真理第一次在它所假设的价值和所奋斗的目标的光辉中获得了充分的意义。

然而综合的，以实现人道主义为目标的科学，所提供的不只是知识和学问（这些知识和学问无疑是技术发展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它们，人类最基本的解放，无论是物质的解放，还是精神的解放，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都将是不可思议的）。此外，科学连同人道主义哲学，或者确切地说，以人道主义哲学作它的固有基础，指明了整个人道化过程的方向。它不仅指出了现有的各种贬低人类的形式，而且对它们进行了批判性评价。同时它还正确地指出了蕴含人类明天的可能性。

丝毫不能幻想,某时某刻,在某个社会一贯致力于科学的人们说不定能用科学创造克服一切实践中出现的困难。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总有那么一部分科学家乐于担当纯专家或现实存在的公开辩护士。因此在科学家队伍中,两极化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就象必然要遭致某种社会力量的反抗一样,这些力量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之中,而且在将来也不想改变其立场。

一个科学论点越是全面,越是丰富,它就越是要否定其他论点,而同时所受到的批评指责也就会越尖锐。硕果累累的真理是在和传统信念发出冲突,并且通过一切求全责备的考验后而产生的。

另一方面,科学和哲学的解答越人道,就越会侵犯某些特殊利益,也就越会引起社会保守势力的反抗。硕果累累的答案一定会遭致强烈反抗,也一定能打破这些反抗,因为这些反抗阻碍了真正的可能性和真正的人类需要。

六、反革命和造反

〔美〕H. 马尔库塞

致 谢

我的朋友利奥·勒文泰尔(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和阿诺·J. 迈耶尔(普林斯顿大学)仔细地审读了本文的原稿。和阿德勒·戈茨的详细讨论对我阐明我的观点大有裨益。

巴林顿·摩勒是我的年轻而少不了的朋友,但这次和以往不同,我没有请他阅读原稿。他正忙于撰写自己的著作,我希望他的书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的书乃是对我的论文的一种必要的修正。

本文阐述的大部分观点,早在我 1970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市社会研究新学院作的讲演中即已提出。我感谢哈佛艺术基金会,它的帮助使我有机会阐明在本文第三章中提出的那些艺术观。

我感谢阿诺德·C. 托维尔和贝康出版社的长期的可靠的和使我感到愉快的合作。

H. 马尔库塞

1971 年夏季于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的勒蒂纳

第一章 面对着反革命的左派

—

西方世界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今天，为了保卫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把内部的反革命和外部的反革命都组织起来。反革命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继续施行纳粹政权的暴行。在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刚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以及苏丹，进行了可怕的屠杀，这场屠杀或者是针对所有被称为“共产主义”的东西，或者是针对所有反对为帝国主义国家效劳的政府的活动。在法西斯和军人专制的拉丁美洲国家里，进行着残酷的迫害活动。酷刑成了世界各国常用的“审讯”手段。宗教战争的痛苦在西方文明的高度上重新恢复，武器源源不断地从富裕国家涌向贫穷国家，被用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解放运动。哪儿爆发了穷人的反抗，哪儿就有大学生奋起反抗士兵和警察；成百成千的大学生被残杀，被炸弹炸死，或被投入图圜。在墨西哥城的街道上，三百名大学生被驱赶，被杀害，从而揭开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序幕。在美国，大学生始终站在激进抗议运动的最前列：在杰克逊和肯特发生的枪杀是大学生历史使命的见证。黑人好斗分子马尔库姆·爱克斯，马丁·路德·金，弗雷德·汉普顿和乔治·杰克逊为他们的批评立场付出了生命。最高联邦法院的新的构成使反动派的进击制度化。而肯尼迪兄弟的被刺则表明：如果自由派表现得过分自由主义的话，那末他们的生命也可能会保不住。

反革命仍处于防御阶段，但只有西方世界才是这样。这儿并不存在新的必须打退的革命，而且也没有新的革命会发生。但是

对革命的恐惧造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并把反革命的不同阶段和形式结合在一起：从议会民主到警察国家，直到公开的专制统治。资本主义在自我改组，以便对付革命的危险，这一革命可能是历史上所有革命中最激进的：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历史的革命。

资本主义优势的丧失可能导致第三世界军人专制的崩溃，这种军人专制是完全依赖于这一优势的。它不会被民族“自由”资产阶级（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里，这一阶级承认对外国势力的新殖民主义的依赖）所取代，而会被解放运动的政府所取代，解放运动意识到自己的任务是，实行早该实行的剧烈的社会改造和经济改造。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最终可能不受阻挡地发展，即打破压倒优势的封锁，而且不再必须维持越来越昂贵的防务机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苏维埃式的世界难道能长期地不受影响，或者可以永远“阻止”这样一种革命吗？

此外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性质也可能不同于以往失败了的革命。这一差异又因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就其最进步的倾向而言，这一革命有可能打碎迄今把社会主义建设和资本主义的进步束缚在一起，使它们互相竞争的压制性的连续统。没有这种可怕的竞争，社会主义就可能克服对“生产力”的崇拜。社会主义就可能慢慢地缩小人对劳动机器的屈从程度，重新组织以消灭异化劳动为目标的生产，放弃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穷奢极欲，奴化剥削。人们不必再在生存斗争中，用侵略和压迫来维护自己，个人最终有可能创造一个技术的和自然的环境世界，暴力和丑恶，无知和残忍将不再统治这个世界。

在这些尚未实现的社会主义的熟悉的特征后面，是作为一种性质上不同的总体性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世界同时是一个道德的和美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含有唯心主义的因素。占统治地位的物质的需要和满足不但被

打上了需要剥削的烙印，而且是受其控制的。社会主义必须增加物资和服务的数量，以消灭贫困；但同时社会主义的生产又必须改变定在的性质，即需要和满足本身的性质。到那时，道德的，心理的，美学的和智慧的能力可能成为物质生产本身的基本因素，而在今天，就它们一般的情况而言，它们都被划在和物质定在相分离，但又是从其中提取出来的文化领域里。

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成了激进左派的理论标准和实践标准，这就是历史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回答。马克思规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生产水平，在技术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早已达到，而且正是这一成就（“消费社会”）有助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助于获得居民的支持，有助于破坏社会主义的激进的基础。

当然资本主义从未能够，而且也永远不能使其生产关系和它的技术能力相一致；机械化使人的劳动力越来越能逃避物质生产过程，它最终有可能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①。但是资本主义不但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扩大居民的依赖性。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 = 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 = 奴役的加强。商品和服务在不断增加，牺牲是日常的开支，是通向美好生活道路上的“不幸事故”，因此剥削是合情合理的。

凡是资本主义的技术结构还能够带来较高生活水平和确立一个实际上不受公众监督的权力结构的地方，那儿的居民就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如果不说是完全反对的话，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在美国，“人民”的大多数由“蓝领”工人阶级组成，那儿的居民不但敌视社会主义，而且也敌视老的左派和新的左派；在法国和意大利，工人运动仍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仍和共

^① K.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提纲》，柏林，1953年，第593页。

产党或工会有联系。但这难道只是因为这一阶级的生活条件恶劣,还是由于共产党的政策——许诺(相对)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民主的议会斗争的最低纲领?或者还由于这一政策答应工人阶级要极大地改善这一阶级当前的状况,而代价是解放的希望要缩小?

不只是对苏联的仿效,而且所坚持的这一最低战略的原则就已把已建立起来的社会和新社会之间的差别给取消了:社会主义不再是对资本主义的某种否定。这一政策坚决地拒绝新左派的革命战略,而且必须拒绝之,这是以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概念为基础的战略: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和依赖性连续统的决裂,自我使命的产生是社会改造的原则。但是接受这些目标和这一激进战略的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不如说是中产阶级的某些小集团,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一大部分已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阶级。

总而言之: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革命潜力的低水平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相一致的。这是众无所知的,而且是无需继续讨论的,如果在这种(完全现实的)现象的背后,并不隐藏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性的话。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及其结构也改变了革命的结构:为了革命决不能缩小潜在的群众基础,而是要扩大这一基础,要重新恢复激进的取代社会主义最低目标的目标。

为了对资本主义的毁灭性发展和革命潜力的(公开的,实际的)跌落之间的不合理关系作出恰当的解释,需要对资本主义的新帝国主义的,全球性的改组作一彻底分析。在这一方面已有了一些大部头的著作^①。本书将根据这些材料,对美国发生急剧变化

^① 例如 P. A. 巴拉和 P. M. 斯威齐的《垄断资本主义》,纽约,1960年(德译本,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7年); J. 吉尔曼:《危机中的繁荣》,纽约,1965年; G. 科尔柯:《美国的财产与权力》,纽约,1962年(德译本:《财产与权力——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收入分配》,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7年); H. 麦克道夫:《帝国主义时代》,纽约,1969年(德译本,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0年); G. 多姆霍夫:《谁统治美国?》,恩格尔伍德,1967

的一般前景作一探讨。

二

在大多数工人阶级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意识占着统治地位。当然革命的意识只有在革命的形势下才会显示出来;但是和以前相反,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一般地位和革命意识的发展是相对立的。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同化,这并不是—种表面现象,而是扎根于基础,扎根于垄断资本的政治经济之中的:宗主国的工人阶级从超额利润,从新殖民主义的剥削,从军火和政府的巨额津贴中分得好处。工人阶级失去的将不只是他们的锁链,这一点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却是确实的。

有人力图驳斥工人阶级被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同化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一变化只涉及到消费领域,而并没有触及无产阶级的“结构尺度”^①,他们下此断言未免太轻率了。消费领域是人的社会存在的一个尺度,并因而是决定人的意识的,这一意识则又是决定人对劳动和业余的态度和立场的一个因素。正在上升着的期望所具有的政治潜力是众所周知的。把消费领域及其对社会的全面影响从结构分析中排除出去,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的。当然,从另一意义上来说,工人阶级的同化是一种表面现象,即这一同化掩盖了反同化的、离心的倾向,而同化本身就是这种倾向的表现形式。这种离心倾向并不在同化领域之外起作用,垄断经济恰恰是在这一领域之内制造了大有炸毁资本主义框架之势的条件

年;“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如 A. 伯利和 J. 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实际上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竟惊人地一致。一个有代表性的选集是 M. 察特林编的《美国社会》,芝加哥,1970年。

① 参见 E. 曼德尔:《工人和永久的革命》,见 G. 菲舍尔编《美帝国主义的复兴》,纽约,1971年,第170页等。

和需要。在此我只想提一下古典的论点（后文将加论述）：资本主义的巨大财富将导致它自己的崩溃。消费社会会不会是它的最后阶段，它的抬棺人呢？

要对这一问题作肯定回答，看来还找不到什么根据。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所有革命中最紧迫的革命看来仍是最不可能的，说是最紧迫的，是由于现存制度还只能靠对资源，对大自然，对人的生命的全面毁灭而维持下去，是由于这一制度的终结的客观条件已存在。这些条件就是：能够消除贫困的社会财富；全面发展资源的技术知识，而这一全面发展是有助于消除贫困这一目标的；浪费，阻碍和消灭生产力的统治阶级；第三世界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加强，这造成了剥削储存器的缩小；强大的工人阶级，它被排斥在生产资料的控制之外，它和一小撮寄生虫统治者阶级是对立的。但在同时，渗入劳动和业余的所有领域的资本，凭借它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凭借有着惊人效能的政治、军事和警察机器，控制着人民。客观的条件并没有转化为革命的意识；解放的迫切需要被压制，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阶级斗争表现为“经济”竞争；改革并未被视作革命的前阶，“主观因素”还落在后面。

用将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割裂开来的观点，来解释革命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之间的矛盾，这是错误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是充分一致的：改良的、顺从的意识是符合资本主义及其无所不在的权力结构已达到的阶段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未被同化的工人阶级（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中的少数人才具有政治意识和反抗精神。“不可能”革命的奇谈怪论的原因在于客观条件本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再确立还没有结束，尽管美国遇到了印度支那战争，遇到了通货膨胀，遇到了国际货币危机和不断增长的失业。凭借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力

量，这一制度还能“解决”其统治范围内的和外部的不断尖锐的冲突。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具有空前的能力，正是这一能力将引起二十世纪的革命，当然是这样一种革命，其基础，其战略及其目标都和迄今一切的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有根本的区别。其特点是有“思想觉悟的先锋队”的领导，有一个群众性政党作为它的“工具”，并宣布“夺取国家权力”是其根本目标。“毫无疑问，这样一种革命在西方是没有先例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仅达到了曾经是现代不发达国家革命动力的许多目标，而且由于收入的不断增长，防卫体制的复杂化，剥削的国际组织，使资本主义也成功地 为多数人提供了一种存在的可能性，而且甚至常常还能部分地解决他们的直接问题。”^①

它能不断地满足不止是生活所必需的需要，这就改变了革命的特点，这一革命提出建立一种社会制度，它“不仅能增加生产和合理地分配产品，而且还能用别的方式进行生产，生产别的东西，并赋予人与人的关系以一种新的形式”。^②

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由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而造成的群众基础，今天在垄断资本的宗主国里已不再存在（即使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一群众基础也在慢慢地发生变化）；一种新的群众基础正在产生之中，它说明了由于生产方式的推动，历史基础在扩大和变化。

在经济集中和政治集权的最新阶段，各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企业是服从于整个资本的要求的。这一服从是通过两条互相密切联系的途径实现的：一条是通过服从于垄断竞争条件的普通的经济过程（增长着的资本有机构成；对利润率的压力）；一条是通过

^① L. 马格里：《议会》，见 R. 罗森达编：《宣言：分析与论点》，巴黎，1971年，第332页。

^② 同上。

“国家管理”。^① 结果是越来越多的过去独立的中产阶层成了资本的直接仆从，他们并不控制生产资料，他们的工作就是创造和实现剩余价值。“第三产业”（服务的生产）长期以来对资本的实现和再生产是必不可少的，它造成了一支庞大的工资收入者的队伍。同时，物质生产的不断增长的技术性特点也把有用的知识分子引进这一过程。剥削的基础因此扩大了，越出了工厂和商店，并掌握了更多的阶层，而不只是“蓝领”工人阶级。^②

共产党的战略早已承认工人阶级构成情况的决定性变化。下述结论就是法共十九大讨论得出的：“……共产党从未把工人阶级的属性和进行体力劳动混为一谈。……当前的技术进步和非体力劳动工人人数的增长，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越来越难区分，尽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力图维持这一区分的。”接着又说，马克思关于“整个工人”的概念和传统的（领工资的）工人阶级的概念可能是不一致的：“‘整个工人’包含这样一批工资收入者，他们不是工人，而是研究人员，工程师，经理等。”今天的工人阶级是十分广泛的：它“不仅包括农业无产者，工厂、矿山和建筑无产者（他们是这一阶级的核心），而且也包括所有那些工人：他们直接参与物质生产的准备和进行”。工人阶级的这一变化使它不仅“吸收”了新的

^① 参见 S. 梅尔曼：《五角大楼的资本主义》，纽约，1970年。“国家管理”的概念当然包含有过分强调国家对资本的依赖性的意思。

^② 关于“新工人阶级”的讨论是由 S. 马利茨的《新工人阶级》一书（1963年）引起的。这一问题的最新文献有：J. 布迪斯的《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纽约，1964年；S. 阿罗诺维茨：《美国有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吗？》见《美国社会主义的复兴》，第188页等；A. 戈茨：《技术，技术员和阶级斗争》，见《近代》，1971年8—9月号，第141号。特别重要的是戈茨把技术科学工人（他们参与对生产过程的监督，一般地总是属于经理阶层）和屈从于这一等级制度的那些人区分开来。另外还可参见 H. 金迪斯的《新工人阶级和革命青年》，见《社会主义革命》，旧金山，1970年5—6月号。有一大批书籍是论述新左派和现阶段资本主义的。我只想指出由两个年轻的积极分子撰写的一本书，即《一部丑史：新左派和新资本主义》，纽约，1971年，我认为这本书写得最清楚、最真实、最严厉。

工资收入者阶层,而且使“不属于物质生产因素的活动具有了生产的性质”^①。“垄断在今天社会中的力量首先不是表现在劳动关系中,而是在工厂之外,是在市场上,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垄断资本主义的牺牲者不仅是依附于它的那些人,以致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在什么时候,陷进了资本主义关系的那张罗网里,而且并不排除发生这样的情况:直接依附于它的那些人有时‘倒不是牺牲者’,甚至反倒成了受惠者,成了它潜在的同盟者。”^②

剥削范围扩大了,在宗主国和第三世界,必须不断地把新的阶层加以同化,这就促进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倾向:按照它的利益和它的模式,组织整个社会。

“总体工人”^③的生产力和“总资本”的领导、组织力量是对立的:个别的工人成了被排除在生产资料的控制之外的,产生整个剩余价值的那部分统一的居民群众的一分子。在这一部分群众中,知识分子不仅在物质生产过程,而且也在越来越科学地控制消费和“生产”关系的过程中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越来越广大的居民阶层被引进到了资本实现的过程中,这一过程远远超出了“蓝领”工人的范围。马克思早就预见到了这一构成变化,这一变化通过把过去的“非生产的”劳动和服务的引入而扩大了剥削的基础:“随着劳动被真正包容到了资本中,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仅是个别的工人,而且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的被联合起来的劳动能力成了全过程的真正的作用者,不同的竞争着的,构成整个生产机器的劳动能力,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参加着商品,或者说得更好些在这儿是产品的形成的直接过程,一

① 法共中央周刊:《法国新闻》,1970年1月28日。

② L. 巴素:《政治冲突的理论》,法兰克福,1969年,第10,13页等。

③ 参见 K. 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556页。

个人主要是用手在劳动,另一个人主要是用脑子在劳动,一个人是作为经理,工程师,技术员等,另一个人是作为监工,还有一个人是作为直接的手工工人,或者甚至是纯粹作为粗工,这样一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能力的功能被纳入到生产劳动的,直接受资本剥削的,听命于资本的利用和生产过程的工人的直接概念中去。如果人们考察一下构成工场的总体工人,那就可以看到,他的联合起来的活动,从物质上来说是在总产品中得到实现的,总产品就是商品的总体,而不论个别工人(他只是总体工人的一个环节)的作用是接近,还是远离直接的手工劳动。但是:这一总劳动能力的活动是资本对它的直接的生产性的消耗,这就是说是资本的自我利用过程,是剩余价值的直接的生产。”^①

“因此”,随着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②,工人阶级本身的概念也要随之而扩大。这一变化不仅是量的变化;它影响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扩大了剥削世界构成了人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和教育等方面的机器的总体。它受到一个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识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统治制度的控制,这些人致力于维持和扩大他们自己的领域,尽管在全球的范围内,他们还是互相竞争的,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为着国家的总资本的利益在活动的,国家是资本,是帝国主义的资本。当然这一帝国主义不同于以往的帝国主义:不光是为了直接的独立的经济利益在进行竞争。今天,如果国家的安全要求本国统治集团在它不愿意的地方或不能消灭人民解放运动的地方,从军事上,经济上和“技术”上干预这一运动的

^① K. 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见《资本论》第六章的初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65页等。

^② K. 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556页。

话，那是因为制度不再能依靠自身的经济体制进行自我再生产。这一任务是向这样一个国家提出来的：从国际上来看，一个“下层”好斗的反对派正和它对峙着，这一反对派又对宗主国内的反对派起着刺激作用。今天，当强权政治的死亡游戏导致了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对影响范围的真正的协商瓜分时，这一外交遇到了来自下层的共同威胁。而这一“下层”不光包括这一地球上的那些可诅咒的人，而且也包括受到监督和压制的那些有教养的，有特权的人。

这一金字塔的底部正在原子化。它使整个的人——肉体 and 灵魂——都变成了一部机器，或者甚至只是一部机器的一部分，不是积极地，就是消极地；不是生产性的，就是接受性的，在他的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里为这一制度效力。技术上的劳动分工使人本身只起着一部分操作功能，而这一部分功能则受着资本主义过程的协调器的协调。这一剥削的技术结构织成了一张巨大的人的机器的网，而这些机器生产和维持着一个富裕社会。因为只要是不属于受到残酷压迫的少数民族的人都从这一财富中获得好处。

今天，对于宗主国的大多数居民来说，资本产生的主要的不是物质的贫困，而是物质需要的受控制的满足，^① 整个的人——他的智慧和感觉——都变成了一个管理对象，并被用来不但是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制度的目的，而且也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制度的价值和希望，及其思想意识的天堂。在技术的面纱的背后，在民主政治的面纱的背后，显现出了现实：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在作预先规定的自由选择时的沦丧。而权力结构不再显得是升华了的，自由

^① “自由支配的收入（即不是为了满足基本需要而必需的收入）”的增长就是这一变化的标志。（《幸福》杂志 1967 年 12 月号估计这部分收入占私人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参见 D. 吉尔伯特根据在威斯康星特拉夫特反抗联盟学院所作报告写的文章：《消费——家庭内的帝国主义》。与此同时，美国的贫困正在增长，这种情况在 1970 年标志着十年的发展倾向结束了（见 1971 年 5 月 8 日《纽约时报》发表的统计局报告）。

文明的,它一点也不再是虚伪的(以致于它至少还必须保持着尊严的“形式”,外表),而是残忍的,它把所有对真理和公正的要求都踩在脚下。

真和假,善和恶都赤裸裸地成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它们规定了人和物的市场价值。商品的形式成了无所不包的,而与此同时,随着自由竞争的终止,商品固有的质也不再是其销售性的一个决定因素。总统和汽车一样被售出,而按照他的政治主张的正确与否来评断这些主张,看来已令人失望地过时了,这些政治主张的价值在于它们获取选票的质量。因此总统必须有能发挥他之所以被买进的作用:他必须能确保买卖的一般进程。一辆汽车的质量是由利润率决定(和限制)的,因此汽车也必须发挥它之所以被人买进的作用,但是这一“技术”质量是由那些有利于销售政策的质量(诸如大马力,价廉舒适,以次充好等)“堆成的”。商品形式的无所不包,和包含的高度物质文明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以前还享有相对的独立性),使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极度地尖锐化:整个的劳动人群现在都和资本主义对立着。

生产过程中的地位等级在这不独立的人群中造成了持久的阶级冲突——高收入的技术人员、专业人员和专家为一方,因技术的利用而遭殃的工人为另一方;有组织的职工为一方,和少数民族的准无产阶级为另一方之间的直接的利益冲突。“非生产性”的知识分子比生产工人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但是所有工资收入者的一般的客观状况仍是由他们不控制生产资料这一点所决定的,这一客观状况是他们受剥削的条件。他们都在进行资本的再生产。剥削扩大到了绝大部分居民的头上,而同时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这是现实,这就是隐藏在消费社会面具背后的现实。这一现实是一种统一的力量,它(在个人的背后)把不独立居民的各个互相争斗着的阶级结合在一起。

三

然而这一统一的力量也是一种反结合。因为垄断资本控制下的社会的整个组织和这一组织创造的增长着的财富既不能消灭，也不能中止这一增长的内在动力：资本主义不能满足由它自己所制造的需要。这一动力恰恰表现在增长了的生活水平之中：它不断地强迫制造了市场曾经有可能满足的需要；现在它又促进着超越性的需要，而不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不能满足这些需要的。和过去一样，资本是靠贫困的增长而增长的，而贫困则将成为革命的一个基本因素，尽管是新的历史形式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来认为贫困意味着痛苦，意味着没有得到满足的生活需要，主要是物质需要。当这一概念不能反映先进工业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时，又用相对贫困对它作了新的解释，相对贫困就是相对于现有的社会财富而言，是文明的贫困。这一解释确实可以欺骗人，说明仍旧应该向社会主义过渡，即说明在现有的需要范围内生活已得到了改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既不是单纯地扩大满足现有范围内的需要，也不是把需要从一个较低的水平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而是要同这种范围决裂，是质的飞跃。革命就是文化的和物质的需要和追求的剧烈改变；意识的和感性的，劳动过程的和业余时间的需要和追求的剧烈改变。^①这一转变体现为反对劳动的分工，反对无聊乏味的设施和商品的必要性及其生产，反对想发财致富的资产阶级个人，反对隐藏在技术后面的奴役，反对幸福生活掩盖下的匮乏，反对污染环境的生活方式。道德的和美学的需要成了基本必需的需要，并对家族，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男子和妇女，以及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出新的要求。

^① 参见《宣言》，特别是第73,74和79三条论点，见《政治与社会》，第1卷，第4期，1971年8月。

自由主要的就是对感官的、伦理的和合理的需要的满足。

当新左派坚决为自然的重建,为开放公园和海滩,为宁静区域而斗争的时候,当他们要求一种新的性道德和妇女的解放时,他们反对的乃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再生产强加在人头上的物质关系。对美的和道德的需要的压制乃是一种统治手段(参见本文第二、三章)。

马克思认为必需的“过剩的”需要(即超过生活必需的需要)的扩展意味着是资本主义要崩溃的进步阶段:“资本主义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制造这一过剩劳动,从纯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看,从纯粹是维持生命的角度来看,就是制造过剩劳动,当它一方面发展需要,使超出必需的过剩劳动本身成了普遍的需要,成了个人本身的需要时,同时,在另一方面,它又用资本的严肃的纪律(一代接一代的人都经过它的训练)使新的一代人都具有勤劳的品性的时候,资本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①

劳动是不同于以往的劳动,是超过了必需的劳动,马克思把这种劳动的普遍的需要假定为是出于个人的需要,只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人本身才能决定他们劳动的对象,先干什么和如何协作。在资本主义的最先进阶段,可以从技术上把生活必需的劳动压缩到最低限度,这时对过剩劳动的普遍需要就将成为决裂,即质的飞跃的标志。革命的历史孕育地就是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基本需要的满足创造了超越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

在这种需要的增长中,隐藏着革命的强大的新的动力。坚持这些需要决不意味着削弱或放弃任何革命的首要任务,即削弱或放弃满足所有人的物质需要;而主要是意味着,充分意识到,必需

^① K.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提纲》,柏林,1953年,第231页。参见 M. 尼古拉在《新左派评论》第48期(1968年)上发表的对这段话的评论。

的物质需要的满足必须通过革命来实现，这一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在自我使命的水平上进行的，是由这样的男子和妇女来进行的：随着他们必需的物质需要的满足，他们同时争得了他们的自由和人性。人是，而且将继续是一个动物，但他是这样成为动物和保持自己是动物的：他使他是动物这一点成为他的自我，他的作为主体的自由的一部分。

在超过的需要的出现中表现出来的离心力是在资本家经理的背后发生作用的；它们是由生产方式本身制造出来的。商品生产时使用的人的劳力在减少，而劳动生产率却随之而在增长，这一增长要求扩大国内市场——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对应面。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存在下去：不断地增加超过必需的物质需要的满足（而所需的劳动时间在不断地缩短）的奢侈品和服务，这无非是意味着，能购买这些东西的消费着的居民（即购买力部分）在不断地增长着。^①对大多数居民来说，生活的需要不能满足的痛苦已成过去；明显的贫困被“限制”在（当然是在增加着的）少数人身上。技术的进步和“高档”商品的大量涌人除了产生和再产生异化了的劳动世界外，还产生和再产生了一个不费力的，快乐的，满足和舒适的世界图象，这一世界看来已不再是权贵们独享的特权，而是大多数人都能达到的。资本主义的技术成就充满了失败，不幸和压抑。资本主义揭开了一个新的范围，这一范围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生活领域和否定资本主义的生活领域。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在扩大，它缩小了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第三

^① M.坦泽：《病态社会》，纽约，1971年，坦泽引用了“美国一家最大的公司——联合商店的董事长”的话：“使用并不是服装工业繁荣的基础。……我们必须加快消耗。……我们的任务是使妇女们不满意于她们已有的。……我们必须使她们不满意到这样的程度：她们的丈夫由于过份节约不但不能得到幸福，而且也不能得到安宁。”（第155页等）。服装工业的这一政策只要稍作修改即可适用于整个经济，包括军火工业在内的广大领域。

产业’，即‘服务行业’的发展的速度将继续加快。它吸收了越来越多的需求和不断地要求越来越大的非生产性投资。这一行业的发展打破了力量的平衡，而这些力量迄今一直完全是以增加商品和生产的利润率为目标的。如果生产者开始越来越屈从于消费者，如果生产的愿望由于急于消费而变弱了，这并非是什么荒谬的事情，对消费来说，重要的不是生产出来的东西的获得，而是对活的东西的欢愉。……年青一代对消费社会的反抗无非是在精神上表达一种愿望：超越工业时代，探寻一个超过生产者社会的社会轮廓。”^①

当然，“对活的东西的欢愉”是以对它们的生产为前提的，但这只是部分如此。许多活的东西都是已经存在的，只需要重新分配而已。为了满足所有人的物质愿望而必需的东西用异化劳动就可以全部生产出来。然而为了生产足够的剩余价值就不但要强化劳动，而且要扩大和强化多余的，但是可以赢利的服务（广告，娱乐和组织旅游），而与此同时，不赢利的公共服务（公共交通，教育，福利事业）却被忽视，甚至被缩减。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投资和商品市场的饱和威胁着垄断资本。竞争性的消费必须增加，这就意味着，高生活水平使越来越无意义的，非人的生活永久化，与此同时，穷人仍旧贫穷，繁荣的美国的牺牲品的数目也在增长。

看来这一现实和可能及应该之间的矛盾以十分具体的形式决定了不独立的居民的立场。整体的非理性的意识造成了不利于制度的运转能力的结果。商品拜物主义支离破碎了：人们透过所谓的技术性及对它的祝愿看到了权力结构。尽管除了极少数激进分子外，这一意识对大多数人来说还一直是非政治性的，自发的；它将一再受到压制；它是“思想意识性的”——但它在社会的底层也得到了表现。剧烈的罢工运动的发展，占领工厂的好斗战略，年青

^① J.洛茨纳，引自《世界报》，1970年6月23日。

工人的行动和要求是一场造反的信号，以反对整个儿被强加的劳动条件，反对这样一种运转体系。“已经在校园里制造骚乱的年青一代现在也在工业美国的企业里象征着不安。许多年青工人要求马上改变劳动条件，拒绝执行年龄较大的工人驯顺地接受的工厂劳动纪律。他们不仅向上级说出他们的看法，而且还在工会会议上提高了他们的嗓门，埋怨工会领导人不够积极。年青工人受过较为良好的学校教育，他们要求头头们在企业会议对他们平等相待。他们不再象老一辈工人那样害怕失去工作，而且常常反对上司的指示。”^①

人们越来越懂得他们也可以过另一种生活。个人或集团的破坏活动时时有发生。不上班的现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②在职员中间(售货员,办事员等)笼罩着一种对职业无所谓的气氛,而且甚至是敌对的气氛:它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效率”一词成了陈词滥调;事情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从前,当还在进行自由竞争时,资本主义的效能主要是依靠人对他们的劳动具有责任心,达到了同一化的程度,这一同一是强加在工人头上的,但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他们的生意兴隆的主要前提条件;无所谓,不卖力将使企业招致破产。今天一整个经济部门(农业)和工业的大部都依赖国家的津贴,破产再也不是一个威胁了。

对大多数人来说,精神和肉体始终只是服务于“社会必需的”不是充满欢乐的工作的一个工具。整个文化,特别是被个人内在

^① 引自 A. 萨普卡斯发表在 1970 年 6 月 1 日《纽约时报》上的报导。关于工人怨气冲天的新材料可参见 1970 年 11 月 9 日的《时代》杂志第 68 页等,以及 1971 年 5 月 17 日的《新闻周刊》第 80 页等。

^② “即使在衰退时期,擅离职守的现象之严重也是令人咋舌的。……福特汽车公司报告说,近十年来不上班的人数翻了一番,到 1970 年达到了平均 5.3% 的程度。有一家汽车公司因此给按时上班的人发了绿卡片,但也无济于事。而其最高峰则是汽车公司的许多年轻工人干脆举行罢工。”引自《新闻周刊》1971 年 5 月 17 日,第 80 页。

化了的宗教和道德是完全必要的，这一必要性属于人的命运，是获得报酬和欢愉的前提条件。被组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压迫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有利于消灭短缺和控制自然；它成了技术进步的一个动力，成了一种生产力。但是今天情况反过来了：这一压制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已不适应于消费社会；它被强有力的凯恩斯主义所代替。它过于强有力了，因为正是这一应该确保资本主义继续增长的政策，同时导致了它的矛盾的激化。在一直还是“整个资本主义”的保护人的美国，这一确保要求建立一个军事机器，这一机器今天正对资本进行着决定性的控制。^①全球性的扩张已达到了极限：在拉丁美洲，在亚洲，在欧洲，美国的统治地位受到了成功的否定。^②

即使在消费社会——新殖民主义的内部对应面里，也出现了倒退的倾向：实际工资在下降，通货膨胀和失业在持续，国际货币危机标志着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削弱。在劳动态度中，在威胁、削弱着资本主义的必要的运转条件和价值的抗议中，存在着一种正在扩大的前政治的征兆，存在着一种潜在的社会变动的群众基础。没有这种乏味无聊的、汲人骨髓的、无止无境的劳动，难道人就不能养活自己了？难道就不能少一点挥霍浪费，少一点官僚机关，少一点矫揉造作，而多一点时间，多一点自由？这一百年之久的问题，曾经总是被地球的主人强加于人的生活现实所否定，但在今天

① “国防部的直接资产在 1969 年 6 月达到二千零二十亿美元。其中包括地产、房屋、生产设施、办公楼、通讯设备，机场以及买进的军事装备的价值。国防部在 1969 年占有的地产达二千九百万摩肯（荷兰的土地面积，1 摩肯=2.1165 英亩）。国防部拥有资产的规模之大还表现在每一财政年度的一大批订货单上。在 1967 年财政年度国防部的订货价值达四百四十六亿美元。”引自 S. 梅尔曼：《五角大楼的资本主义》，纽约，1970 年，第 72 页。

② E. 马达尔：《社会主义者对美国挑战的答复》，巴黎，1969 年；K. 于黎：《美帝国》，巴黎，1968 年，（德译本：《美国帝国主义》，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 年）；H. 麦克道夫：《帝国主义时代》，纽约，1969 年等。

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不现实的问题；今天它已危险地成了一个具体的、现实的、具有颠覆性意义的问题。

难道真可以把消费社会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消费社会”这一术语是错误的；因为很少有一个社会，象这个社会这样全面地屈从于控制着生产的那些利益。消费社会是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处于最先进阶段的垄断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着自我再生产。而且正是在这一阶段，压迫也改组了：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结束了，新的反革命的阶段开始了。

尼克松政府从各个方面促进了社会的反革命组织。“命令”的力量成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一种力量。许多城市里的警察的标准装备和希特勒冲锋队的装备一模一样；他们的暴行是众所周知的。镇压的全部重量都落到了激进反对派的两个中心的头上：大学和好斗的黑种人、褐种人。校园里的活动被遏制，黑豹党在其因内部纷争而瓦解之前就受到了全面的迫害。一支庞大的，分布于全国的秘密特务队伍打进了各个社会领域。议会的权力被行政机关夺去（或者它自动放弃了权力）；而行政机关又再一次依附于军事集团。

当然还没有出现法西斯政权。法院还维护新闻自由；“地下的”报纸还一直能公开发售，群众性宣传工具还提供机会可以对政府及其政策继续提出尖锐的批评。当然对黑人来说还没有说话的自由，即使对于白人来说，这一自由也是受到严重限制的。但公民权还存在着，而且也没有（正当的）理由可以驳斥它的存在，而这一制度也还“允许”进行这样的抗议。重要的是，目前这一防御性的反革命阶段（民主立宪阶段）是否在为未来的法西斯阶段准备土壤？

美国的形势不同于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形势，这几乎是无需强调的；美国不存在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没有准军事性的群众组

织；没有全面经济危机；不缺少“生存空间”；没有疯子式的领袖；宪法及以宪法的名义成立的政府还能发挥作用等等，这一切也几乎是无需强调的。历史不会以同样形式进行重复；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也将要求高级阶段的法西斯主义。美国拥有经济和技术资源可以进行全面的组织，这些资源比希特勒德国曾经能支配过的要大得无法比拟。帝国主义的扩张受挫，国内经济困难和人民的广泛不满，面对这三重负担，美国政府仍能被迫开动一部野蛮得多、全面得多的统治机器。

我曾强调指出了这一不满所具有的非政治性、广泛性和无组织性。赞成社会变动的潜在的群众基础完全可以变成赞成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我国人民第一个通过民主选举而法西斯化，这也许并非坏事”^①。关于自由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居利尼曾作过最简单而又最中肯的描述：“自由民主主义是占有者阶级在不害怕时显现出来一张面孔；而法西斯主义则是它们害怕时显现出来的另一张面孔。”^② 压迫的强化和国家资本主义控制的新经济政策表明，统治阶级，至少是美国的统治阶级，正在慢慢地变得忧心忡忡。而在整个人民当中，大量的政治的和心理的情况表明存在着早期法西斯主义的综合症。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在最近几次的总统选举中，支持 G. 华莱士当总统的一大部分选票是来自工人，最近费城选出了一个右派市长（他可谓是我国最厉害的警察），而支持他当选的工人选票同样占了他所得选票的一大部分。

居民中占上风的无以发泄的攻击性以一种可怕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恰恰是在宗教上和一个地地道道的战犯相一致，他象一个新

^① W. 夏勒，见《洛杉矶时报》，1970年3月13日。

^② L. 古里雅尼，见《世界报》，1971年7月23日。

基督一样受到欢呼,而他本来是应该上绞架的。人们疯狂地要求,应该尊重这个战犯,而不应该惩罚他;有好几百封信、电报和好几百个电话表示赞同,它们愤怒地反对判决。^①

1970年5月在肯特大学有四个大学生被杀害,有一份报告谈到了这一事件引起的反应,我想引用一下这份报告,它是令人震惊的:“没有一个家庭会象这一个家庭那样怒不可遏,这一家庭住在肯特基附近的一个小城里,它的三个相貌端正,受过良好教育的,温文尔雅的儿子在大学里念书。我们无需证明,这三个大学生是否参加了抗议活动,他们完全是不自觉地被卷进事件的漩涡中的:老二被打死,他当时正站在一个被从远距离枪杀的大学生的旁边;小儿子因违法被逮捕,他的照片被登在地方报纸上,这使这一家人大吃一惊。我们在调查时和这一家人进行了谈话,谈话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使我们必须比以往更致力于确切地报导一切。

母亲: 每一个留着长发、身着脏衣或光着脚板出现在象肯特这样的城市里的人都将受到枪杀。

记者: 您允许我把这些话记下来吗?

母亲: 当然可以。要是国民警卫队在那天早晨杀死一大批人,那就好了。

记者: 您的三个儿子就在其中。

母亲: 要是他们不照国民警卫队的命令去做,他们就会被杀死。

心理学教授 (他一起倾听了谈话): 长头发是不是被杀的原因呢?

母亲: 是的,我们必须彻底净化这一民族。因此我们就拿长头发开刀。

^① R.哈默:《对卡利中尉的军事审判》,纽约,1971年,第373页等。另参见我发表在1971年5月13日《纽约时报》上的文章。

教授：难道您能允许人家杀死您的一个儿子，只是因为他光脚走路？

母亲：我能。

教授：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

母亲：我在本地的大学教书。

教授：您认为，您教给您学生的就是这些东西？

母亲：是的，我教给他们真理。所有懒汉，脏汉，所有在街上逛来逛去，无所事事的人，都应该枪毙。”^①

对每一种主要是“职业的”和“严肃的”科学教育进行了集中的攻击，这一攻击不再限于采取通常采用的经济制裁手段。因此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校长就要求全面限制思想意识和社会科学——培养持不同政见者的传统学科。“许多上大学的学生并不清楚地知道，他们为什么上大学，……他们自动去研究思想意识和社会科学，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职业目标。”^②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伟大的资产阶级哲学宣布，“不仅应该教育青年适应于人类目前的状况，而且应该教育青年适应人类未来可能的美好状况，这就是说，适应人类的思想意识及其全部使命。”^③而今天则相反，高校委员会被要求，研究当前社会的“专门需要”，以使大学知道，“它们应该生产什么样的研究生”。^④

垄断资本对人民的操纵，通货膨胀的经济，“超过所需杀伤力的”国防政策，国际屠杀的训练，战争罪行的正常化，以及对大批

① J.米切纳：《肯特城：发生了什么和为何发生》，格林威治，康涅狄格州，1971年，第409页等。

② 《洛杉矶时报》，1971年11月17日。

③ 康德：《教育学讲演录》，见《康德全集》，E.卡西勒本，柏林，1923年，第8卷，第462页。

④ 《洛杉矶时报》，1971年11月17日。

俘虏的残酷虐待导致了日常生活中大批令人震惊的暴力行为。大城市的整片整片地区都成了犯罪区，直到今天犯罪行为还是群众性宣传工具议论的主要对象。在这种暴力还是隐藏的，或尚未付诸行动，或相对来说还只表现为不甚重大的行动（例如粗暴地对待示威者）时，它主要还是针对着无权无势的，但是惹人注目的少数人的，对稳定的制度来说，他们是喜欢骚扰的，是异在的，他们的外表，他们的谈吐和行为都与众不同，他们所做的（或被怀疑所做的）是那些承认社会秩序的人所不能容忍的。这类“目标”就是黑种人和棕种人，嬉皮士和激进的知识分子。所有的攻击及其牺牲品都表明了，存在着最强大的早期法西斯主义的潜力。^①

唯一的对抗力量是发展真正有组织的激进左派，他们承担政治教育的全面任务，改变人们错误畸形的意识，以使他们能真正体验到他们的状况，明白克服这种状况的绝对必要性，并把握住他们解放的手段和道路。

法西斯主义当然不能拯救资本主义：它本身只是资本主义矛盾的恐怖组织。但是一旦法西斯主义得逞，那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可能扼杀所有的革命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从长远来看”并不能持久，这一分析并不能使人感到宽慰。“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制度确实是要崩溃的，但是马克思的理论并不能预言，（就一般而言），它将被哪一种社会形式所取代。就客观条件而言，作何选择（法西斯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系于人们的思想和愿望，意识和感情。社会形式系于他们那还一直存在着的自由。马克思理论的一个中心论点是设想有一个和社会主义选择相对立的野蛮时期，这一时期将是旷日持

^① 参见L. 勒文泰尔和N. 古特曼：《虚假的预言——美国宣传家们技巧的研究》，1949年，帕洛阿尔托，1970年（德译本：《宣传和无权》，诺维德，柏林，1966年，删节本）；Th. W. 阿多诺，E. 弗兰克—布隆斯维克以及其他人的文章见《独裁者的人格》，纽约，1950年（德译本：《独裁的性格》，2卷本，阿姆斯特丹，1968年，删节本）。

久的，其野蛮是以文明的科学技术成就为基础的。当前主动权和政权正操在反革命的手里，这一反革命完全可能在这一野蛮的文明中达到其顶峰。

四

美国的(难道只是美国的?)新左派的反对基础是建立在反革命的土壤上的;它看来似乎特别弱小,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更是如此。人民特别仇视激进分子——他们是法庭任意迫害及加以其它折磨的对象。对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来说,革命力量竟是如此弱小,这是很可悲的;但只要我们看到,一种反同化的和革命的新形式正在形成,这一新形式是符合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而且也是由它所造成的,那我们的错觉就会消失。这一洞见并不要求修正马克思的理论,而是要求重建这一理论:将它从崇拜偶像的地位中解放出来,从阻碍其辩证发展的僵死词句中解放出来。错误的意识不但侵袭了新左派,而且也侵袭了老左派。

我在上一节里粗略地勾画了导致扩大和改变革命的潜在的群众基础,导致其“动机”发生变化的倾向。这一倾向是生产方式使然,而这一生产方式扩大(和改变)了剥削的基础,而同时它又产生了现存生产方式无法满足的需要。人们还一直在要求和期待着一种美好的生活,一种不再由整天整天的非人的劳动规定的生活,一种建立在自我规定之上的生活。这一目标要求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对技术和自然的环境世界进行彻底的改造。

面对着这一历史性的变化,资本主义再要对男子和妇女的生活加以控制,再要按照自己的模式对自然和社会加以塑造,已是不合理的事情了。克服对生产的专制统治的任务现在已从物质生产领域转移到精神生产领域,已从异化劳动领域转移到创造性劳动

领域。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不断地屈从于技术组织的物质生产允许实行人道化。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优势在减弱，其原因是由于活的劳动正不断地从机械的、支离破碎的劳动过程中撤离出来，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它还固守在这一过程中。活劳动转化为“监督”作用，这有可能使物质生产的方向和目标发生根本变化。人的劳动已不再是按照价值规律生产商品的一种商品，而是按照自由的法则为人的需要而生产，为获得解放的人的定在的需要而生产，这一选择包含了摧垮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的内容。消费社会不但使经济革命的幽灵复活了，而且也使文化革命的幽灵复活了：这是一种新的文明的幽灵，在这种文明中，文化不再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一个特殊领域，而是在所有领域里塑造整个社会（包括物质生产及其领域），而是剧烈地改变统治着的价值和愿望。

在意识形态中，已存在着这种变化的萌芽，即存在着对立的形象和对立的价值，新左派正用它们在批驳资本主义世界的形象。宣布行动不是为了竞争，反对野蛮的“屠杀”，揭露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肯定身体的敏感性和官感，生态抗议，蔑视征服世界和殖民战争的错误的英雄行为，妇女的解放运动（这一运动认为，解放了的妇女不只是一个分享到压制性的男子特权的妇女），反对对缺乏独创性的美和慎言微行的反性感的、清教徒式的崇拜——所有这一切倾向都有助于行为原则的废除。它们反映了人民中蕴藏着的深刻不满。

但正是这种对立的價值，对立的行为使激进运动被“人民”的深深的敌意孤立起来了。之所以被孤立，有两个原因：一、社会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大多数劳动居民中毫无反响，并没有找到“增长着的基础”；因此，二、自由的社会和现存的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建立一个自由社会的实际可能性都被掩盖了。因此解放就作为一种威胁而出现：解放是禁忌的。而新左派

的两翼——政治的一翼和嬉皮士的一翼都把这一禁忌打破了。在这两翼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除了组织上的和个人的联系外）——他们的自由的特征表明了社会主义的道德的和美学的性质，而这些性质在马克思理论的发展过程本身之中就受到了贬黜（请参看本文第二章）。从个人和小集团的角度来看，它们“预示”了社会主义的特别“乌托邦式”的方面。在现存社会中，它们是作为局外人的“特权”而出现的，是作为不生产的和“反”生产的局外人的“特权”而出现的（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的标准来看，他们实际上就是，和应该是不生产的和“反”生产的）。

新左派由于其思想内容（这些思想主要是“知识分子”的东西，而不是“工人”的东西）在政治领域还具有一种公开的社会中坚的性质。知识分子（和反唯智主义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占主要地位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人们可以看到，这一运动使用了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被用于经济和政治过程的基础和思想领域之中。此外，解放要以激进的另一种意识（一种真正的对抗意识）为前提，因此这一运动的意识应该能够打破对消费社会的崇拜，必须要有一种知识和一种感性，而已有的秩序通过阶级教育的制度禁止大多数人民获得这种感性。在现阶段，新左派被迫主要还是一种智力运动，而他们在自己队伍中实行的反唯智主义被统治集团利用了。

因此新左派的孤立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被证明是远离社会的，运动是缺乏社会基础的，这一孤立是符合当前的历史状况的；新左派提出“断然否定”最先进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全部文化。这一孤立反映了革命的无先例的，“毫不荒谬的”性质，反映了和现有文化——包括工人阶级的文化在内——的激烈矛盾。恰恰是在其特殊的思想、道德和“心理”的要求中，革命的可能性——不，是革命的必然性——得到了它的最完整、最激进的表现。只有质的变化才

是一种变化，只有一种新的质的生活才能结束长期的剥削社会。这些特殊的方面正因为它们所具有的激进的新的质，而很容易使人以为，它们是较富裕的或不太富裕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偏见。

对实际存在的脱离群众的情况作出变态反应，和不准备看到，这种脱离正反映了先进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以及这一脱离只有在争取改变这一结构的长期斗争中才能克服，都说明了运动所具有的自卑感和失败情绪，以及冷漠的性质。这种态度有利于嬉皮士那一翼使运动非政治化和私人化的目的，而政治的那一翼是用其政治清教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和嬉皮士们对立的。

五

马克思的理论始终是实践的准绳，即使在非革命的形势下也是如此。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左派的另一个弱点也变得清楚了：他们把马克思的理论偶像化，从而曲解了它。用来分析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的那些概念当然不能简单地再用来分析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作为历史性的概念它们具有历史性的指导意义，并有助于分析一种历史性的结构。当然所有阶段的资本主义都是资本主义，而它的生产方式的组织是其全部发展阶段的基础。但是这一生产方式的运用能力在发展，而与此有关的变化不但涉及到基础，而且涉及到上层建筑。谁把同一的资本主义基础从社会的其它领域孤立出来，谁就是用一种反历史的、不辩证的抽象性来代替了马克思理论的基础。变化发生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这是些内在的，潜移默化的，量的变化，但是能导致“质的”突然的变化，是可以导致革命前形势的变化。如果人们不是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衡量马克思的概念，和不能从中为政治实践引出相应的结论，那末他就把马克思的理论僵化为机械地反复使用的“基本语汇”，僵化为一种僵死的和现实没有关系的言论。这只能使新左派更加

脱离现实,而且严重地妨害了他们互相交流认识。

马克思理论的物化是违反了新左派自己宣布的准则的: 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准则。一种没有跟上资本主义实践的理论,是很难指导想要废除资本主义的实践的。把马克思的理论简单化为固定的“结构”,使理论与实际脱节,并赋予它一种抽象的、疏远的、“科学的”性质,这种性质很容易使它教条主义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抽象的:它们与已知的现实的抽象的疏远,乃是把握和改造另一种现实的前提条件。此外理论还因为下述原因而是抽象的:它把握的是条件和倾向的总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就是历史的总体。因此它决不能对某一种实践作出决断,例如,是否应该占领和进攻某些大楼,但是它能够(而且应该)允许人们根据已知的总体性,对个别行动的前景作出估计,这就是说作出决定,是否存在着一种情况,这种情况表明应该占领和进攻。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来不是直接的。当已有的社会现实还没有被改造的力量所控制时,它就要求战略适应客观条件,即改造现实的前提条件。一种不革命的形势是根本有别于革命前的和革命的形势的。只有理论分析才能确定和区别主要的形势及其潜在可能性。任何一种现实性都是预先给定的;它靠自己的力量存在着,它是理论赖以发展的土壤,是客体,即“理论的它物”,它的变化对理论继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新左派曾经是当前正在发生的变化的主要创始人。黑色和棕色少数民族的积极化,揭露了在印度支那的战争罪行的政策的广泛的反对派,强大的群众宣传工具和政府的冲突——美国的所有这一切成就都应该主要归功于好斗的左派代表人物,特别是大学生。在法国和意大利,工会经济要求的激进化和左派总的战略的激进化(工人委员会的复兴),严重地威胁、动摇着改良主义的共产党机器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尽管在1968年5月后情况发生了突变。

即使在这两个国家里，根据资本主义在变化而对革命的潜在形势所作的分析，也是和马克思理论的物化相对立的。在美国，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要求更激进的新思想；它刚在发端之中。^①我想在下面几节里对美国新左派的状况作一评估，由于未来的发展还是捉摸不定的，因此我的评估肯定是极不全面的。

六

新左派当前的状况，根本不同于激进反对派初具规模，并显示了它的最初的、扩及全国的影响（富有战斗性的公民权运动，反对越南战争，高等学校里的积极活动，政治性的嬉皮士运动等）那一时期的状况。大约在十年前，首次提出了改造的目标：新的道德，感性的解放，“马上自由”的要求，文化革命。统治集团对此并无准备。因此一个有力的、公开的、进攻性更强的战略就有了可能：群众示威，占领建筑物，共同行动，和黑人好斗分子联系。当新左派的冲击力变得引人怵目的时候，这一战略也宣告结束了。约翰逊总统下台，民主党芝加哥代表大会时的激烈争执，和印度支那战争的强化，标志着新阶段的开始。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大学和少数民族隔离区，成了等级制度的第一个真正的内在威胁。统治集团比新左派对这一威胁的程度看得更清楚。今天制度准备好了——而且是如此的彻底，以致于激进运动能不能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存在下去都成问题了。那末激进运动对这种新的状况作出什么反应呢？

这一运动看来是危险地被削弱了，而且主要是由于权力机器

^① 关于法国的情况可参见 A. 戈茨和 R. 迦洛蒂的著作；关于意大利的情况可参见《宣言》。关于美国的情况可参见《每月评论》，《社会主义革命》，《激进的美国》以及几种激进教育方案；此外还有文选《美国社会主义的复兴》；《新左派——纪实史》，M. 特奥多罗编，纽约，1969年，特别是第二部分。对新左派兴起的经典性记录乃是《大学生公社杂志》，1967年11月—1968年6月，见 A. 斯耐泼和 B. 维达尔—纳古特编《文献》，巴黎，1968年。

采取了合法的或不合法的有效的进攻性镇压措施，它集中使用了严酷的暴力，而左派却没有相应的防御手段以对抗。在政权动员了全部力量以后，新左派内在的弱点变得明显了，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好斗的反对派内部的思想意识争端，二是缺乏组织。

左派一向是分裂的。这是当然的，因为当对私有制及维持其行政机构的主要关切，把现状的保卫者们都统一了起来的时候，那些想要废除私有制的人，却没有一个明确的促进统一的目标。他们根据不同的选择和目标，战略和战术在行动。

但是这样的分裂并不能永远阻止革命，或者至多只能推迟革命罢了——这只要看一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争执就可以了。也许只有在这种斗争的实践中，才能找到“正确的”战略。然而如果运动在人民中并无牢固的基础，特别是如果它的力量很弱小，而且还受着迫害，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种革命的战略，而只是刚在为这种战略准备条件的话，那末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样一种形势要求把过早的（或过时的）思想意识争端推迟，以利于完成扩大力量的迫切任务。质的突变是以量的增长为前提的，这对激进战略同样是适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交流的问题就变得迫切起来了。越是把社会主义的、全面的、“乌托邦式的”目标看作是具体的、历史的目标，那末辩论就越是离题。“人民”讲的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几乎拒绝马克思理论的概念和提法。人民反对这种外来语，这些“大话”，这不仅是因为它所受的教育，而且也表明它是受着统治集团及其语言的极大的束缚的。在这种语言的影响下，“错误意识”的力量也许会被击破，解放的需要和导向这一目标的道路也许会进入意识。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首先成功地发展了工人运动的政治意识以后，在1918年欧洲革命失败和资本主义得到稳定的影响下，形势发生了逆转，在工团主义盛行，资本主义得势的情况下，革命

理论具有了抽象的性质，它成了极少数人的事业。而在不具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地方，这一性质就尤为显著。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在扩大，如同我们注意到的那样，这一扩大是由于肆无忌惮地把马克思的辩证概念简单化为“老生常谈”。辩证概念把握的是变化过程中的现实；这一过程对概念的规定本身就是必要的。因此古典帝国主义转变为新帝国主义就使古典的概念具有了新的内容，同时，十分明显的是新的形式是源自旧的形式。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诸如“无产阶级”，“剥削”和“贫困化”等概念。谁用这些词汇向人贯输，而不把它们翻译为当前的状况，那末他是决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讲明白的。这些词汇至多只能充当识别秘密集团（和进步劳工党，托洛茨基派等）的标志；此外它们还能作为“老生常谈”，仅此而已。如果把它们当作机械地使用的词汇表中的一种直接的兴奋剂，那末这种做法就会使它们失去真正的内容。马克思的概念规定了现实背后的本质；它们的意义来自对“现象”的分析，而今日的资本主义的“现象”是十分不同于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的。

概念的物化造成了对垄断资本的阶级结构进行错误的分析。激进的思想意识常常屈从于对工人阶级的崇拜，这是一种新的商品拜物教（劳动力最终是一种商品）。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工人阶级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工人阶级本身就能使生产过程停顿下来，二是它占人民的大多数，三是就其整个存在而言，它是现存物的否定者。这三个特点使工人阶级成了潜在的革命主体，但在今天只有第一个特点还适用于美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们当然可以把这一部分工人阶级看作是无产阶级在今天的后继人，这一部分人就是“蓝领”工人。但是马克思的观念是要将这三个特点统一起来的，构成了人民的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是由于其需要而成为革命的，而资本主义不可能满足这些需要。换言之，工人阶级是革命的潜

在的主体，其原因不但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它是被剥削阶级，而且也因为这一阶级的需要和追求要求废除这种生产方式。因此如果工人阶级不再是现存社会的“绝对否定者”，如果它成了这一社会内部的一个阶级（它也有着这一社会的需要和追求），那末仅仅依靠把权力转交给工人阶级（不论是用什么形式），就并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另一种质的社会的过渡。工人阶级首先必须改造自己，它应该成为能实现这一过渡的力量。^①

如果垄断资本主义制造的，但它本身又不能满足的需要成了一支颠覆性的力量，成了在劳动人民中发展政治意识的基础，那末这也决不意味着（而这是很重要的）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复兴，工人阶级并不会和劳动人民的其它部分隔绝，不会作为“工资劳动”和资本对立，而将出现的是整个不独立阶级和资本的对立。正因此这一新的意识就将反对工会政策的框框，而固定的生产方式的结束也将就在眼前。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动力学：整个人民屈从于资本及其国家的统治，而整个人民的全部的需要就是废除资本。如果这一发展改变了原来的阶级概念，如果这一发展消除了“蓝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其它集团的对立，那末这要归因于资本主义的变化了的现实，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必须抽象地反映出这一变化了的现实。

当然这就要触及到那些受到了权力机器增长着的反抗的倾向，触及到那些直至今天还没有缩小工人阶级和新左派，特别是和激进知识分子的鸿沟的倾向。激进知识分子想消除工人的敌意的企图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一敌意是合情合理的。当然这两支力

^① R. 卢森堡知道，工人阶级的激进化乃是革命战略的条件：“不能用把无产者束缚于打有资本主义国家烙印的纪律的办法，即把指挥棒从资产阶级的手里转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手里的办法，而是要把这奴化的纪律思想打碎，拔除，才能把无产者教育为遵守新的纪律——社会民主党的自愿的自我纪律。”见卢森堡：《政治著作集》，O. 弗莱希海姆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3卷，第90页等。

量的联合是变化的前提条件；工会的意识应该变为政治的、社会主义的意识。然而这并不能通过人们“走向工人”，参加罢工，照料他们的“事业”，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来达到。这两个集团只有在社会变化的过程中才能走到一起，这时每一集团都从自己的基地中走出来，按照它们自己的意识，循着对它们来说是重要的原因和目标来行动。例如意大利左派无产阶级的战略就是：“曾经在工厂基层小组做过工作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今天不再在工厂里或在工厂门前进行宣传工作了。而是工人们自己，主要是青年工人在那些地方进行战斗性的政治宣传，而大学生则为他们搞来宣传材料，在城市的各个部分进行调查等，以此来支持他们。”^① 在法国，雷诺汽车工厂的基本工人被分为班组外和班组内两部分，班组外的那部分主要是“知识分子”，班组内的那部分（人数要小得多）主要是工厂的工人。班组内的那部分还过于弱小，以致于不能接受“所有基本工人的劳动方式和加以领导”。^② 这样一种（暂时的）职能分配可以避免倨傲的态度，和因此而自动引起的消极反应，这就可以促进这两部分人的统一，从而使特殊的，在不同的状况下（在工厂，在商店，在办公室，在邻里之间）所体验到的和表现出来的利益找到其共同的基础，并找到一种共同的战略。

这同“从外面来发展阶级意识”有着根本的区别：今天的少数派集团承担着组织的任务，它们同列宁的先锋队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列宁的先锋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负有领导工人阶级的任务，而它是扎根于这一工人阶级之中的，这一工人阶级直接体验着贫困和压迫，而且只要一场失败的战争就足以把它组织起来采取革命的行动。而这些群众就是社会物质再生产的人的基础。但在今天的帝国主义宗主国里，情况已不同了。

① 《财务》，苏黎世，1970年9月11日。

② 引自关于雷诺工厂基本工人的一篇文章，见《现代》，1971年8—9月。

此外，列宁先锋队的思想是一个已存在着的或甚至是在形成中的群众性政党的概念。没有这一合理的基础，那就只能是布朗基主义。今天尽管共产党仍始终是反对派的群众性政党，但它们执行的是议会战略的“最低纲领”。它们在自己的实践中（当然决不是在它们那公开的思想意识中）承认，在先进资本主义中的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政治上是脆弱的，行动上是不革命的。^①这一对现状的估计远比某些激进集团所作的估计要正确得多。当然这样的共产党还不是社会民主党式的：无论是从不久前这个词所具有的意义上来看，还是从目前这个词所具有的意义上来看都不是，尽管它们采取的是改良的战略。因为社会民主党即使在今天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而共产党和工会则一直是其左翼的唯一的群众性组织。正因此它们还始终是一种潜在的革命力量。

就美国而言（也许对其它国家也是如此），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高度集中的、等级森严的革命的群众性政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否过时了？这一政党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过去阶段，即还是自由的阶段。那时这些政党在仍旧运转自如的议会制度内进行活动，尽管这些政党对选举是抵制的。但是议会已经成了反革命手里的一部老牛破车，因此这些政党也就失去了它们发挥政治作用的领域，任何一个激进的反对派都成了议会外的反对派。

七

这很可能就是左派战略的转折点。对人民的权力和控制都集中在政治、军事统治集团手中，这就迫使左派向分散的组织形式过

^① 法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传统战略，例如“无限制”罢工和积极发挥自发性的作用看作是“无政府主义”。共产党的法国总工会散发的一份传单宣布说，在“极左派”力图延长和扩大芒市雷诺工厂1971年5月的罢工以后，“自发性就不再存在了”（《世界报》，1971年7月22日）。

渡，这些形式不易为压迫机器所打散，而且保证了多方面分散的反同一化核心有较大的活动余地。垄断资本使“来自下面的革命”具有一种新的具体的样式，其适当的表现形式在今天就是颠覆性的群众运动。制度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是如此严密地结成为一个整体，以致于只要在关键地方有所突破，就能迅速导致整个机器的失灵。这种情况不仅在生产和分配的地方性中心中会发生，而且也会在教育、新闻和交通的地方性中心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内部的反同一化的过程就完全可能具有一种进一步反集中的，分散的和自发的性质，并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发生这一过程，或通过“传染”扩展开去。当然只有当对这些地方性的官能紊乱和骚扰从政治上加以引导和组织的时候，它们才能成为社会变化的核心。在这一阶段，基层地区的初步自治看来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就地支持劳动人民，并为改组生产和分配，交通和教育准备新的干部。

我在这儿引证的是新左派激进集团广为散布的设想：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用不着，而且也不可能在集中的群众性政党领导下，用群众行动直接进攻政治控制中心（即国家）。主要的理由如下：一、确实有效的政府的手中集中了巨大的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二、工人阶级中改良的意识还占着统治地位。那末，有没有历史性的抉择呢？

让我们回忆一下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进程：资产阶级首先是在封建社会的土壤上获得经济权力，然后才夺取政治权力。当然不能简单地把这一模式转用于社会主义革命。但问题是：有没有迹象表明，工人阶级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并在革命前，获得经济权力（虽然还不是政治权力）？如果工人能控制企业和商品，能把生产导向另一方向，并加以改组的话，那就可能发生所问的情况。但正是这种情况就可能是革命，并要把政权夺过来。那末可

不可以设想，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权力中会发生渐变呢（工人的要求和成就的激进化会使量变向质变突进）？

起着这种作用的倾向是极其双重性的。它们可能导致质的变化，但也可能导致工人阶级的进一步被同一。同一化的倾向表现在管理人员的某些努力中：缩小流水线劳动的分工和原子化，让个别工人对较大的生产单位负有更多的责任和拥有更大的监督权。有一份报告谈到了在美国的几个电子工厂里进行的这类革新，这些革新大大地改进了产品的质量，并使工人对自己的活动，对企业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

这一趋势会不会使工人的主动性激进化？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对自己个人的工作的监督会不会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终结？或者这一趋势会不会遭到遏止，以致于企业内的等级制度会并无本质性的变化？如果工人的监督因此而超过了资本主义能忍受的程度，那就可能需要在工人阶级的成员中发展一种激进的政治意识；反之工人的监督只能停留在已有的制度的内部，并且只能有助于它的合理化。革命的工人监督要以政治因素先于经济技术因素为前提。如果左派实现了这一政治激进化，那末制度就将被削弱，最后并将被用分散化的，非官僚化的方式打碎，这种方式正表现为垄断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一般特征：个别企业或企业群中的工人监督，这些企业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主义的）统一体的诞生地（就象封建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在城市的权力中心）。

这样一种发展将是重新继承革命传统的一个极重要的开端：“委员会”（即“苏维埃”）是自治的组织，是在地方人民会议中进行专制统治的组织（或说得更明确一些，是专制统治的准备）。委员会的复活不仅是由于官僚主义的群众性政党从历史上来看已经过时，而且也是由于必须找到新的相应的主动性、组织和领导的来

源,以作为群众性政党的后继人。权威的群众性政党(或者说是这一政党的自我永恒化的领导)的历史后继人并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自我承受的纪律和权威——这种权威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而且只受到那些进行斗争的人的承认。当然委员会的理论和战略不能导致使基础偶像化。工人、农民和邻居——简言之是人民——的目的和愿望的直接表述不绝对就是进步的,不一定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也可能是相反的一种力量。只有当委员会是代表了革命的人民的机构时,它才是革命的机构。它并不是简单地存在在那儿,并准备从工厂,从办公室和从邻居街坊中被选举出来。它的出现要以一种新的意识为前提:打破统治集团对人民在劳动和业余时间里的影响。

直接的民主,“由下层”对权力的转移实行真正的监督是左的战略的基本要求。这一要求完全是双重性的。我们可以从学生运动中举一个例子:真正地参加对大学的管理。从政治上来讲,这要以学生的大多数比院方和管理部门进步为前提条件。如果情况相反,那末这一变化就会针对着左派。但从中引出结论说,那就应该放弃这一要求,这是错误的。因为在现有的(以长期的历史倾向为基础的)条件下(左派的战略当然应该以这些条件为指针),学生的监督有可能是一个大好机会:实行迫切要求的不同于现在的等级制度的改革。

我的这一批评性的评价也适用于工人监督这一更大的问题,对于工人监督这一问题所具有的双重性我已经指出过了。工人监督可以导致减轻劳动负担,导致把工人真正组织起来和发展工人的主动性。同时这些变化完全可以被资本主义企业所利用。这一要求已经成为激进战略的中心内容,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从长远来看,这样的监督会使劳动过程和资本的实现之间的纽带中断;它会取消这样的需要:奢侈品和有计划的损耗的生产,它

使技术有可能从目前所遭受的束缚和扭曲中解放出来。

关于基层,即“下层”的概念的双重性也表现在左的口号“一切权力归人民!”中。这里所指的“人民”不是由那些今天支撑着资产阶级民主的人——选民、纳税人和一大批写信给主张出版自由的编辑部发表自己意见的人——构成的。尽管这个人民并无主权,但它还是行使着可贵的权力,他们是选举统治者的人,是一支被领导的,依附于统治者的力量。“权力归人民”指的并不是现有居民的大多数(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少数人,是这多数人的牺牲品,是那些也许从不能投票选举的人,是那些不纳税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东西要纳税,他们蹲在家里或监狱里,他们不给编辑部写要印出来的读者来信。这一口号的双重性表示了一个真理,即“人民”,人民的大多数实际上是和它的政府不同的,分离的;即为了人民的专制还必须进行斗争。这意味着,这一目标要以人民的需要和意识的激进变化为前提。人民,有权解放自己的人民,不再是今天再生产现状的那个人民——尽管它是由同样的那些个人组成的。

人民必须从被奴役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这是正确的,同样正确的是:人民首先必须从它生活其中的社会把它变成的那个状况中解放出来。根本的解放不能是“自发的”,因为这样一种自发性只能以已有制度的价值和目标为内容。自我解放就是自我教育,但它是受别人教育为前提的。在一个知识和消息的获得不平等的社会结构里,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已经受过教育的人有责任这样使用他们的知识:帮助别人实现和获得他们的能力。每一种真正的教育都是政治教育:但是在阶级社会中,如果没有一个经过激进反对派的理论和实践的考验而形成的领导,要进行政治教育是不可想象的。这一领导的职责是把自发的抗议“改造”为有组织的行动,从而有可能使直接的需要和追求

发展为对社会的激进改造，这一领导的职责是把直接的自发性变为有组织的自发性。自发性和权威是不矛盾的：只要生活必需的需要（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需要并不一定是指物质生活所必需的需要）在革命实践中有所反映，那末革命的实践就是源自自发性的，但是这一自发性可能是欺骗性的，这是社会的需要反映在其中的缘故，而这些社会的需要是有利于稳定秩序，而不利于人的解放的。这就是今天的情况，而且其程度是从未有过的。对人的教育和操纵的加强，需要加强相反的教育和相反的组织。而新左派的反权威倾向正是同这一要求相对立的。

要正确评价这些反权威的倾向是困难的；对它们也不能简单地加以遏止。从历史上来看，它们是对官僚主义的权威的群众性政党的正确对抗，但另一方面，它们又被引入了歧路，损害了运动的效果。它们以抽象的形式反映了今天的激进反对派的基本特征；它们表明，激进反对派在多大程度上从整个个人及其生活必需的需要（与其他自由个人的自由联合的生活，与自然的新关系——内在的和外界的）中获取它的力量。

由于这一新的个人主义，于是就提出了个人的造反和政治的造反，私人的解放与社会的革命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者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对立和对抗很容易被引向直接的同一体性，这样一来这两者的潜力也就被摧毁了。当然如果没有个人本身的新的合理性和感性的发展，那末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质的变化，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没有一种激进的社会变化是没有激进的个人的变化的，个人是社会变化的承受者。这样一种个人的解放确实意味着资产阶级个人的克服（对于资产阶级的个人来说，私人的实现和社会机构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的），同时也意味着是自我，是私人性（是由资产阶级文化创造了的私人性）的标准的重建。

但是资产阶级的个人并不会因此而被克服：简单地无视社会

要求，离开社会，实践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没有一种革命是不伴随着个人的解放的，但也没有一种个人的解放不由社会的解放来陪伴。这就是解放的辩证法。要直接将理论变为实践是不怎么可能的，要直接将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变为政治目标和行动也是不怎么可能的。个人的现实和社会的现实之间的对立还将存在下去；个人可以在其上对社会起作用的土壤还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就如一位年轻的德国激进分子所说的：“我们这些激进分子的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总是受着现存社会矛盾的感染和侵扰，总是被它们充满着，歪曲着的。”由于这些矛盾只能用革命来解决，所以（激进）运动必须承受住这些已被把握的深入影响了（左派）战略的矛盾。

没有一种解放的尝试，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团的，能够不受它所反对的制度的污染，人们并不能把污染源清除掉；只能在它自己的土地上和它作斗争。这就是说，个人的、局部的解放、拒绝和疏远，从一开始就在先于激进反对派而存在着的政治范围内进行，而对统治集团的激进的批评，在实践上和在理论上都必须在统治集团的内部继续下去。换言之，个人的解放（拒绝）必须在特殊的抗议中首先争取普遍的解放；未来自由社会的形象和价值必须先出现在非自由社会内部的个人关系中。例如，性的革命只有在它和政治道德有了联系时才是一场革命。在千方百计创造真正拒绝统治集团的条件时，决不能忘记这样的事实：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个个人和集团的真正自由的。

客观上存在着的双重性规定了每一种激进的反对派运动的性质，这一种双重性同时反映了统治集团对整体的权力和这一权力的局限性。文化革命正受到改变方向的威胁：生态学、摇滚乐和超现代艺术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① 在这一危险面前，私人的自由

① 参见本文第三章。

和自由的诱人的、直接的同一化创造的主要是缓和的条件，而不是激进化的条件，导致的是退出政治范围，而自由只有在这一范围内才能争得。最严重的是公社受到了类似的“抚慰”的威胁。对于自主的、非异化的关系来说，它们仍旧是潜在的核心，“细胞”，实验室；但它们很容易变得孤立和非政治化。而这就意味着自动同化或投降，这是一种否定，它只是肯定的颠倒，而不是肯定的质的对立面。在这儿，解放或者是意味着在统治集团内部自得其乐，也许甚至是拿统治集团来取乐，或者是意味着欺骗统治集团。拿统治集团取乐这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玩笑失败了，从哪一种意义上来看玩笑都是幼稚的，因为它证明了政治上的无权。讽刺家们在希特勒法西斯统治时期都沉默了，甚至连那样富有想象力的 C. 卓别林和 K. 克劳斯也沉默了。

人们当然应该乐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但眼下人们却应该懂得，不是做一些什么就可以了；应该懂得，重要的是要做一些能证明男子和妇女的智慧和感觉的事情，说明他们能够做的超过他们乐意做的；只要他们是为一个无剥削的社会生活和工作的话。自己离去和解放，滑稽小丑和幽默讽刺，犯罪集团和公社（光是“公社”这个词就显得多么崇高！），只有好斗分子们自己才能加以区别，而不应该让法院的判决和警察的权力来做出这一区别。严肃地对待这一区别就要求自我监督，自我监督是革命纪律的前身。即使压扁资产阶级的愿望今天也已是无的放矢，因为传统的“资产阶级”已不复存在；“伤风败俗”或精神错乱已不再能震撼一个用“伤风败俗”使生意兴隆的社会，一个把精神错乱融进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之中的社会。

守纪律的组织的时代来到了，这一事实并不说明了反对派的失败，而是展现了反对派的前程。运动的第一个时期——英雄阶段，满不在乎的、轰动一时的行动的阶段已经结束了。资本主义在

国际上越来越接近于它内在固有的界限，因而更力图加强暴力和同一化。固有的利益和政治要求的和谐一致，对认真的精神的诱人的必然的拒绝，这都是新左派软弱的标志，如果新左派想发展为真正的政治力量，那它就必须在自己的感性中发展它那固有的认真精神和激进性；必须克服政治上的俄狄浦斯情结。对“大话”的刻板的使用，小资产阶级的孤芳自赏，把废物当作对付孤立无援的个人的武器，所有这一切都是处于青春期的选错了对象的造反的标志。敌人早已不是由父辈，由头头或由教授来代表了；政治家，将军和经理不是父辈，他们所统治的人民也不是由造反着的弟兄们组成的。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青春发动期的造反只能取得短暂的效果；它常常是幼稚和笨拙的。

我们当然应该看到，在激进反对派孤立和特别弱小，而敌人却几乎是无处不在和特别强大的形势下，合法的抗议运动带有笨拙和幼稚的特点。从定义上来讲，现在的统治集团是“成熟的”；而其余人的聪明则是傻瓜和幼稚的聪明。但是如果抗议触到了统治集团的痛处，并受到统治集团的拒绝和压制，那末这一抗议不是会遭到蔑视，就是会遭到继续受到人民支持的官府的内心无愧的惩罚。

个人和集团的行动尽管被统治集团和自由派看作是暴力行动（如果和统治集团使用的暴力比较，那末这就是一个完全不恰当的字眼），但从完全不同的政治意义和新左派的立场来看，它们的行动具有一种明显的教育意义。这类行动有对审讯的冲击（这些审讯很明显地显示了司法部门的阶级特征）；有对建筑物的和平占领（这类行动很明显地成了军人或政治控制的目标）；有对公开赞成战争政策和压迫政策的讲演人的“纠缠不休”，等等。按照法律，这些行动都该受罚，而且它们将受到越来越持续的惩罚。今天，每一次示威游行都面临着就在眼前的（隐蔽的？）危险——受到镇压；对

局势来说升级是内在必然的。这一社会致力于强使反对派实行非暴力原则，而它自己却天天在行使它那“隐蔽的”暴力，借以维持现状。因此对激进反对派来说，就产生了一个“暴力经济学”的问题：与它对立的暴力天天要求它作出新的牺牲——一个人的生命和自由。那末在这种情况下，牺牲有什么政治价值呢？

政治事业并不能从烈士们身上得到什么好处，“革命的自杀”也还是自杀。虚伪地、无动于衷地说，一个革命者更乐于为革命而生，而不愿为革命而死，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对公社社员的一种侮辱。当统治集团把它那职业刽子手封为英雄，而把它那造反的牺牲者指为罪犯时，要另一方继续相信英雄主义的思想是很难的。一种绝望地被判定要失败的行动也许能在短时间内撕毁平等的假面具和揭穿压迫的真面目；它也许能唤醒中立者的良心，也许能揭穿隐蔽的残忍和谎言。只有做着绝望行为的人才能判定，他不可避免地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否太高，说太高的衡量标准是他自己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任何一种把个人的事业化为集体事业的做法都可能具有双重意义，从整体来看甚至是不负责任的。这种做法指责制度的牺牲者是在延长等待的苦楚，是在延长苦难。但是绝望的行为也可能导致同样的结果，也许甚至是更惨的结果。一个麻木不仁的社会迫使人们进行非人道的计算：牺牲者的人数和作出的牺牲应该和所期待的（合理地期待着的）成功相平衡。

应该区分暴力和革命暴力。在当今的反革命形势下，暴力是统治集团的武器；在机关和组织里，在劳动和业余时，在大街和公路上，在空气中，到处都有暴力。但与此相对立的革命暴力，应该终止暴力的革命暴力，今天却并不存在。革命暴力是群众或阶级的行动，他们能够推翻已有的制度，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方面的例子有全面总罢工或同时占领和接收企业、政府大楼、新闻中心和交通中心。美国并不存在进行这些行动的条件。好斗左派

的活动范围是很狭小的，而绝望地企图扩大这一活动范围的做法，将导致越来越多的肉体暴力行为的发生。左派运动本身必须控制和约束这种暴力行为。为了那些不明确的、一般的、不能把握的目标而行动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很糟糕的，这些行动增加了左派运动反对者的数目。法国的“炎热夏天”的口号就是如此，这一口号导致了愚蠢的破坏捣乱活动，这些活动给人民带来的损失远比给统治阶级带来的大；捣毁企业的建筑物和办公室也是如此，这类行动在公民的眼里如果不算是“战争罪行”，也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八

对建设社会主义来说，大多数人的“直接民主”是最适当的管理形式，这一点过去是正确的，将来也是正确的，继续从“资产阶级民主”能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这一点出发，则已变得是站不住脚的。而在“资产阶级民主”不复存在的地方，也就不复能重新夺回这一民主。垄断资本主义的总的倾向是反对这一战略的。今天，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虚假民主的揭露是在政治上进行的对抗教育。然而这一对抗教育必须考虑到在这一虚假民主中什么东西是真正的，这指的是程度，即被同一的、保守的多数人能使他们的意见起多大的作用，能在已经给定的选择中作多大的挑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决定政策，而与此同时，决定人民生死存亡的措施却是由一个集团作出的，这一集团仍旧可以逃避公众（即使是议会）的监督。^①

当然这一民主允许建立地方性的自治基地。生产和监督对技术科学的要求在不断增长，这些要求使大学成了这样一个基地：首

^① 关于这一情况的详细记载请见《参议员格拉韦尔编五角大楼文件集》，波士顿，1971年。

先是为了制度本身的需要：作为培养干部的地方；但同时又基于同样的原因：也作为培养未来的反对派干部的场所。仍旧要一如既往地反对学生运动中广为传布的看不起学生的政治价值的思想，认为学生“只”是知识分子，是有特权的“中坚阶层”，因此是一支依附力量，只有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立场时，他们才能有所作为。这种思想伤害了那些献出了生命的人和那些在反对现存政权的示威游行中准备献身的人。第三世界的大学生确是一支革命的先锋队，他们中成千成万的人成了恐怖的牺牲品，他们在解放斗争中的地位，就是正在发生着的世界范围变化的一块特殊的里程碑，就是一支重要的激进意识力量。第三世界的好斗的大学生们直接表达了人民造反的要求和目标；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生们（还）不具有这种先锋队的作用，他们的特殊地位允许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发展这样一种意识，以作为全面斗争的出发基地。对工人阶级的崇尚使学生运动仍迟迟不能（如果说还不是简单地拒绝）“承认”：它在大学区自有它自己的基础。这时这一基础正从校园扩大到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中去，这些机构是需要“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当然地位较好的干部会感到和这些机构是心心相印的，并成为其等级制中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在学习时的地位的变坏和就业机会的减少将削弱他们的忠诚，并激化科学技术获得解放的可能性和目前所受的奴役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的解决决不能来自科学内部的发展：新的科学革命将成为社会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了扩大学生运动的基础，R. 杜契克* 提出了穿越机构的长征的战略建议。这一战略是当人们在现有机构中工作时，做反对这些机构的工作，但并不是简单地“从内部来钻孔”，而是“跟着事情前进”，是学习（如怎样编制计算机程序，怎样读打孔卡片，怎样

* R. 杜契克(Rudi Dutschke)，西德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领导人。——译者注

在各级学校里上课,怎样使用群众性宣传工具,怎样组织生产,认识和避免有计划的损耗,以及一个设计师应如何工作等等),以及同时在和别人一起工作时保持自己的批判意识。

长征包含了共同的努力——建立相反的机构。长期以来这些机构一直是运动的目标,但是主要是由于缺乏资金,这些机构一直很薄弱,质量上也不能令人满意。必须使它们具有竞争力。这对于激进的、“自由的”宣传机构的发展来说尤其重要。事实是激进左派并没有同等的渠道可以通向大的新闻机构和教育部门,这一事实造成了他们的孤立。在创建独立的学校和“自由的大学”时,遇到了同样的遭遇。他们只能在某些地方和现有的教育事业竞争,就是说和现有的教育事业对着干,那些地方就是教育空白区,而且之所以能竞争一下,也不是由于他们的教育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而只是质量好一些罢了。为了能够弄到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有效的对抗机构的活动,他们不得不采取妥协。“自由派”不加区别地一概拒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或者还没有到来。激进主义可以从反对战争、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合法”抗议中,从保卫公民权中,也许甚至从地方选举的“小小丑闻”中获得巨大的好处。结成统一战线的基础是不牢固的,有时甚至是肮脏的,但是存在着的。

我强调指出过大学在现阶段所起的关键作用:它们始终可以作为培养相反干部的机构。为达此目标而必须的“新结构化”的意义,超过了大学生们的决定性的参与决定活动和非权威的学习。使大学为了今天和明天而变得“重要”起来,就需要指出实际的状况如何,和使文明成为今天所具有的样子和未来可能成为什么样子的动力是什么。这就是政治教育。因为历史实际上在重演;剥削和屈从的重演必须停止,而这要以认清这一重演是如何发生的,及其再生产的方式是什么为前提,也就是要批判地思考。

在这一长征中,资本主义国家好斗的少数派有一个有权有势

的不露面的同盟者：资本主义的恶化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当然这些状况完全可能成为充分发达的法西斯制度的先兆，新左派应该积极地反对这样一种致命的思想：这样一种发展可能加快社会主义的出现。如同过去一样，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仍可能导致它的崩溃，但是以巨大的受资本主义控制的资源为支撑的法西斯极权主义完全可能成为这一崩溃的一个阶段。它将重新产生出矛盾，但是全球性的，并且将夺取最后还没有受到统治、剥削和压榨的那些空间。如果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只是一种未知的（和可疑的）未来的必然性的话，那末社会主义的思想就将失去它的科学性。客观的倾向只有在如下的情况下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为它而斗争的主观力量怎样才能成功地把这些倾向导向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今天，还是明天，还是将来？资本主义制造了它自己的掘墓人；但这些掘墓人同这一地球上生活在痛苦、匮乏之中的那些可诅咒的人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面目。

第二章 自然和革命

一

未来革命的新历史结构的最明显标志也许是新的感觉能力在反对派“风格”急剧变化时所起的作用。我在《论解放》中曾勾划过这一新的因素；本章则试图指出，解放最终和什么问题有关，亦即和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人自己的本性与外界自然的新关系有关。自然的急剧变化将成为社会急剧变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新的感觉能力完全不是个人的或集体的纯“心理”现象，它是媒质，社会的变化在其中变为个人的需要；它在“改造世界”的政治实践和对个人解放的追求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当前发生的事情是发现（或者主要是重新发现）自然在反对剥削社会的斗争中是一个同盟者，在剥削社会中，自然受到的侵害加剧了人受到的侵害。自然的解放力量及其在建设一个自由社会时的重要作用的发现将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的一支新力量。

自然的解放乃是人的解放的手段，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思想首先与人性有关：人的本能和感官是人的理性和经验的基础；其次与外部自然有关：人的生存环境，即人“与自然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形成了人的社会。从一开始我们就需要强调指出，自然被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这表现在两个方面：自然作为社会地变化了的自然和人相对，它屈从于一种特殊的合理性，这一合理性越来越发展为一种适应于资本主义要求的技术的、工具主义的合理性。其次，这一合理性也贯穿在人的本性，人的本能之中。关于本能适应现存制度的需要的形式，我只想举出两种在当前是典型的形式：社

会对攻击性的操纵，其途径是把攻击性行为转交给技术工具以减轻有罪感；社会对性欲的操纵，其途径是控制非升华，即塑料美人工业，这同样可导致去除有罪感，并因而有利于“合法的”满足。

自然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历史的客体；因此“自然的解放”并不是回到技术前状态，而只是推动它向前，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以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和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滥用中解放出来。这以后，手工劳动的某些失去了的质也许能够在新的技术基础上重新出现。

在现存社会中，越来越有效地被控制的自然已经成了扩大对人的控制的一个因素：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了的胳膊。商业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它妨碍着人对他的环境世界的爱欲式的占有(和改变)：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无论是在异化的彼岸，还是此岸；它也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主的主体——人和这一主体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人的世界里。这种情况也不能用下述办法来消除：使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和公共交往，自发地或有组织地，享受到大自然之美。不快正被释出，它只能给损害自然添加一种新的变种而已。

自然的解放意味着重新发现它那提高生活的力量，重新发现那些感性的美的质，这些质对在无休止的竞争中浪费了的生命来说是陌生的；这些质表明了自由的新的质。因此“资本主义的精神”拒绝解放了的自然的思想或取笑这种思想，认为它是诗意般的幻想，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只要自然不享有不受侵犯的“特权”和得到保护，人们就将用攻击性的科学方法对待它；它是自由价值的物质，是纯物质。这样一种对待自然的态度是一种历史的超越性，它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一个自由的社会完全可能处于一种截然不同的超越性之下，完全可能拥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客体；

科学概念的发展在于把自然体验为要加以保护的、“文明化的”生活的总体，而技术将利用这一科学以改造生活世界。

对人的统治要借助于对自然的统治：今天，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之间的具体联系在激进运动发动的重要的生态进攻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噪声，工业和商业强占了迄今公众还能涉足的自然区，这一切较之奴役和监禁好不了多少。这方面的斗争是一种政治斗争；对自然的损害在多大程度上直接与资本主义经济有关，这是十分明显的。同时有人费劲地想使生态的政治作用“中立化”，并利用它来美化现存的东西。尽管如此，今天我们必须反对制度造成的自然污染，如同我们反对精神贫困化一样。我们必须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的环境保护，使它不再受到阻遏，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推进这项工作。^①

社会科学对自然和自由的关系研究甚少。即使在马克思主义中，自然主要也是一个客体，是人在和自然的“斗争”中的一个对手，是不断合理地发展生产力的一块场地。^②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自然是资本主义用于加工制造的原料，是物质，是加强对人和物的剥削性管理的原料。自然的这一形象是否符合自由社会的形象呢？难道自然只是一种生产力，或者它的存在也是为了它自己，以及它就是以这种实存方式存在着的，是为了人而存在着的？

一种类似的贬低自然基础在社会变动中的作用的倾向也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看法上，这种倾向和马克思早期著作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人性”在社会主义中当然是不同的，互相联系的男子和妇女将发展和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和能力，这种情况在

^① 参见 M. 博克金的《生态学和革命思想》和《走向解放的工艺学》两文，见《后安全无政府主义》，伯克利，1971年。

^② 参见 A. 施密特：《马克思学说中的自然的概念》，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1年，带有附录的增订版。

历史上将是第一次。但是这一变化几乎应该象社会主义的新型机构的副产品一样出现。马克思主义强调政治意识的发展，表明它对解放的个人基础甚少研究，也就是说对社会关系的根源不太关注，而个人正是凭借这些根源，直接而深刻地在他们的感觉和在他们的本能中体验到他们的世界和他们自身的。

在《论解放》中笔者曾指出，没有这一因素的变化，“旧面目”将在新社会中重新出现，而自由社会的建设是以和世界的传统经验及歪曲的感觉的决裂为前提的。

感性经验受到现存制度合理性的检验和“阻碍”，因此它倾向于使人不受那极不习惯地获得的关于人的自由的可能性的经验的“感染”。发达资本主义进行的社会监督的规模是空前的，这一监督直渗入到实存的本能的和心理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合理而独立的感觉就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同样也要进行反抗和造反，使人身上的本能的和心理的领域活动起来，使反抗和造反在这一领域发挥作用。

“合理的感觉能力”这一概念强调了感觉在形成知性时的行动的、构造的作用，知性是这样一个范畴：人依靠它来整理、体验和改造世界。感觉不单纯是被动的、接受性的：它们自己已经在进行“综合”，它们使原始的经验材料服从于这些综合。而综合不限于“直观的纯形式”（空间和时间）的综合（康德正是在这些纯形式中绝对地看到了感觉材料的必然的、先验的结构形式），而可能的倒是还存在着别的更具体的“物质的”综合，它们构成了体验到的经验的（即历史的）超越性。我们的世界不只存在于时空的纯形式中，而且同时还是感性质的总体——不仅只是作为眼睛的（粗略的）客体，而且是作为人所有的感官（听、嗅、摸、尝）的客体。正是被体验的世界这一质的、基本的、不知觉的，或更明确些说，是先知觉的结构和原初经验本身必须合理地改变，如果社会的变化应该是质

的合理的变化的话。

二

感性的颠覆能力和自然是解放的一个领域都是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要论点。虽然人们不断地反复阅读和解释这些手稿，但是这两个主要论点还是没有受到重视。最近《手稿》被用来证明“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对抗官僚极权的苏联模式；这些手稿有力地推动了反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斗争。我认为，这些文章尽管具有“前科学的”特征，尽管费尔巴哈的哲学自然主义占了主导地位，但它们仍表达了最激进、最全面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且正是在这些文章中，“自然”占据了它在革命理论中应该占有的地位。

我想简单地回忆一下《手稿》的主要思想。马克思把“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①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只有这一解放才是“私有制的扬弃”。它意味着一种新型的人的诞生，这种人直至他的本性，直至他的精神都不同于阶级社会的人的主体：“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②。“感觉的解放”包含有改造社会时这些感觉成为“实践的”，包含有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感觉也将成为新的（社会主义的）合理性的“根源”：从剥削的合理性中解放出来。解放了的感觉将拒绝资本主义的工具主义的合理性，然而将维持和发展它的成就。解放了的感觉将用两种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消极的方式是，自我，他人和对象世界不再在对财产的攻取，竞争和保卫的情况下来经验；积极的方式是，通过“对自

① K.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卷，第124页。

② 同上，第126页。

然的人道的占有”，即是说通过把自然变为对人的本质(作为类存在)来说是一个环境世界(媒质)的方式，而人的本质就是自由地发展人的创造性的、美的特殊禀赋。“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①解放了的感觉将和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一起，确保“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这时自然就“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②；它将不单纯作为材料——有机的或无机的物质而出现，而是作为独立的生命力，作为主体—客体^③而出现；对生命的追求是人和自然的共同本质。人将塑造一个活的对象。只要物本身就是对象性的人的关系：人的关系的对象化和因此人道地对待人，那末感觉就能够“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④。

这一明显的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是成熟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先驱，这一理论把物的世界看作是对象化的人的劳动，看作是由人的劳动构成的。这时如果这一塑造性的人的活动造成了一个压制性的职业社会的技术环境世界和自然环境世界的话，那末它也将产生一个非人的自然；因此激进的社会变化将包含有自然的激进变化在内。那末也包含有自然科学的激进变化？自然是主观性的表现的设想看来同目的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长期以来它

① K.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卷，第126页。

② 同上，第125页。

③ 同上，第168页：“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正象植物是太阳的对象”。

④ 同上，第124页。可以举一个“为了物”的例子：在南斯拉夫出售一种木制的裁剪板，这种板的一面画着彩色的花样，另一面上则没有画。板上印有这样的字样：“不要弄坏我那美丽的一面，请使用另一面。”幼稚的拟人化？是的。但我们也可以认为，有这一想法的那些人，以及承认这一想法的那些使用者们对暴力和破坏有着一种完全天生的、直觉的反感，他们确实能“人道地对待”物，对他们来说，物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因此物也就具有了活的对象特征。

在西方世界的科学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作为自在的客体是如此符合资本主义对待物质的态度，以致决不能放弃这一思想。在这一思想下，达到了对自然越来越有效的、成果越来越丰硕的控制，因此它的神圣性看来是完全正确的。

承认自然是主体是不是真的包含有和科学的客观性不相一致的形而上学的目的论呢？让我们看一看 J. 摩洛关于客观性在科学中的意义的论述：“我试图指出的是，科学的态度包含有我称做客观性的假设的东西，也就是包含有这样的基本假设：宇宙中既没有计划，也没有目标。”^① 解放自然的思想并不以宇宙中有这样的计划或目标为前提：解放主要就是人的可能在自然中实现的计划和目的。解放要求，自然迎合这样一种活动，要求自然中拥有能支持和促进人的解放的力量，而这些力量曾经受到歪曲和压制。自然的这样一种能力可以被看作是“偶然的”或“盲目的自由”，这种能力能赋予人的努力一种意义：将自然从这种盲目性中解脱出来，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就是：帮助自然，“睁开它的眼睛”；“在这个贫困的地球上，帮助它做到它也许能做到的事情”。^②

自然是沒有目的论的，没有“计划”，没有“目标”的主体：这一思想和康德的“没有目的的的目的性”极其一致。《判断力批判》的进步概念的真正革命意义至今还无人研究过。艺术美的相关概念（或说得更好一点是艺术美追求的）就是自然美。美的思想不但适用于艺术，也适用于自然，这不光是一种类比，或者是加于自然的人的一种想象。它基于这样的观点：美学形式作为自由的标志既是人的世界也是自然的世界的实存形式（或一种因素）。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康德把自然中的美说成是“自然的一种能力”：“不是为了什么特殊的目的，而是自由地按照化学的法则……，也

① 摩洛和《纽约时报》记者的谈话，1971年3月15日。

② Th. W. 阿多诺：《美学理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0年，第107页。

按照美学的目标而自我形成美”。^①

马克思把自然看作是一个世界，当自然固有的有助于解放的力量和质被重新获得和释出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将成为人的享受的适当的工具。和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削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是非暴力的，非毁灭性的：目标是自然内在的、能提高生活的、感性美的质。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以后，“人化”的自然就迎合人对满足的追求，没有“人化”的自然人就不可能得到满足。对象具有自己的“内在的尺度”^②：这一尺度是在它们之中的，对它们来说是一种内在的潜力；只有人才能将它释放出来，因此它也是人固有的人的潜力。人是唯一“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③的本质。

一种解放的美学，美是自由的一种“形式”：看来似乎马克思被这种人本学的、唯心主义的思想吓坏了。但是难道这一——看来是唯心主义的——观念不正主要是唯物主义基础的一种扩大？因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对象”^④。而他的感觉（如同“社会的器官”^⑤一样）在“占有”对象性的世界时是积极的、实践的；它们表现了人的社会存在，人的“对象化”。这不再是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而是相反，是在一个方面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而这一方面将对人的解放发挥一种重要的作用。

通过“人道的占有”来解放自然的思想确实有着一定的内在局

① 《判断力批判》，G. 雷曼本，斯图加特，1963年，第303页。

② K.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卷，第97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167—168页。

⑤ 同上，第125页。

限性。虽然美的因素是自由的决定性因素；它谴责暴力和残忍，因此它是自由社会的基本的质——不是作为“高级文化”的孤立王国，而是作为建立这样一个社会时的动力和有积极意义的动机。但是存在着某些残忍的，至今仍未克服的，也许是决不会克服的事实，这些事实使人疑惑。人道地占有自然有朝一日能结束暴力和残忍吗？为了人类肉体的再生产而施行的暴力和残忍使人类天天牺牲着动物般生命。为了“自然本身”而对待自然是多么动听，但是如果把动物和植物都吃光了，那就决不是为了“自然本身”而去对待它。结束这场战争，复兴世界的全面和平——这些思想是奇妙的神话，而并不是可以设想的历史的现实。面对着人加于人的困苦，而主张大家吃素或吃合成食品，这看来是多么的不负责任；面对着当今的世界，人与人的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于一个自由的社会来说，共同努力减少人加于动物的痛苦乃是这一社会的“理性的调节理念”，不然则是不可思议的。

马克思的人道地占有自然的思想还始终包含有狂妄的统治欲在内。“占有”，不论是多么的人道，始终是主体对(活的)客体的占有。它损害着根本不同于进行占有的主体的和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看是作为独立的客体，即作为主体而存在着的的东西。这一东西完全可以对人持敌对态度，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这就是一种斗争关系。但是这一斗争也可能停止并让位给和平和满足。这时就不是占有，而对占有的否定就是非剥削的关系：让它休养生息，承认和贡献。但是这样一种贡献遭到了物质的难以捉摸的反抗；自然不是“精神”的表现，而是精神的根本界限。

三

尽管把自然看作是社会变化的一个因素的历史观并不含有目的论的思想，也并不认为自然是有“计划”的，但是它确实是把自然

把握为主体—客体,即把握为有着自己的可能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世界。而对于这些可能性不仅应该根据自然有着自由的价值作用的观点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考察,而且也应该把它们看作是客观价值的承担者。“损害自然”和“压迫自然”的说法的根据盖在于此。损害和压迫在这儿意味着,人对自然的行为,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损害了自然的某些客体的质,而这些质对生活的提高和满足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一客体的基础上,人为了他那人的能力而企求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一客体的基础上,不仅能够从数学的意义上,而且能够从生存的意义上,将“真”赋与自然。人的解放要求承认事物中,即自然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真。马克思的幻想乃是重新捡起了把认识看作是回忆的旧理论:把科学看作是重新发现在现有现实中受歪曲和否定的事物的真形式,这就是唯心主义的永恒的唯物主义内核。表达这些形式的“理念”不是“纯”理念,而是一种尺度,用它可以测量出事物“现有的”实存方式是多么的错误,多么的扭曲,可以测量出在那熟练的感知中,在那歪曲的经验中缺少的是什麼,而这感知和经验则是社会的产物。

因此在这儿并不是对从未有过的黄金般的过去,对天真纯洁,对“原始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回忆。回忆作为一种认识能力,主要是综合;它把被歪曲了的人类和自然的碎片组合在一起。这一被回忆的材料被组合为幻想的王国;压制性的社会允许它被艺术表现为“诗意的真实性”,被表现为纯粹的诗意的真实性,也就是说被表现为对社会的实际变化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的东西。人们可以把这些理念恰如其分地称作为“天赋的理念”;因为在压制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直接经验中是不可能存在这些理念的。它们主要是作为经验的视界存在着,在这一视界面前,事物的直接存在的形式显现为“否定的”,显现为对它们内在的可能性,它们的真的一

种否定。只要这些理念对历史地存在着的人来说是“天赋”的，那末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因为解放的可能性永远总是历史的可能性。幻想作为认识使人意识到理念和现实，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内核：自由超越了现存的形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的理论才是德国唯心主义的历史继承人。

自由就这样成了“理性的调节理念”，成了按照其“理念”，就是说按照其内在可能性，实际改造现实的线索，以为了它的真理而解放现实。

辩证唯物主义把自由看作是内在历史的、经验的超越性，看作是社会变化的力量，这一变化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会超越它的直接形式，而变化的方向并不是指向不断增加生产，指向天堂和乐园，而是指向同社会和自然的无情的对立作越来越和平的斗争。这就是永远革命的哲学核心。

作为这样一种力量的自由扎根在男子和妇女的本能之中：它是生活必需的需要，是提高他们的生命意志的需要。其先决条件则是感觉有能力不仅体验到事物的“已有的”质，而且体验到事物的“隐蔽的”质，而这“隐蔽的”质将能够起到改善生活的作用。把感性合理地重新规定为“实践的”，就使自由的思想发生了升华，而又没有放弃它那超越性的内容：感觉不仅是现实的认识论构造的基础，而且也是按照解放的利益改变现实，改造现实的基础。

人的自由就这样扎根在人的感性之中：感觉“吸收”的不仅是存在于显现形式中赋予感觉的东西，而且还把对这一东西的改变交给另一种能力（即知性）；感觉更能够发现，或能够从它们自己出发，在它们的“实践”中，发现事物的新的（更能满足的）可能性和结构，形式和质，并推动和引导它们的实现。感觉的解放将使自由成为它还不是的那种东西，即成为一种感性的需要，成为本能（爱

欲)的一个目标。

在一个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中,人的感性是迟钝的:人们只是从形式和功能上感知事物,而具有这样的形式和功能的事物就是由现存的社会预先给定的,制造的和使用的;人们只是感知社会规定的和限制存在的变化的可能性。^①因此现存的社会不仅在人的精神,在人的意识中被再现出来,而且也在人的感觉中被再现出来;因此只要个人僵化的、物化的感性没有“消解”,没有达到一种新的历史尺度;只要对已有的客观世界的压抑的熟识感没有被打碎,没有在第二次异化,即异化社会的再异化中被打碎,那末就没有一种说法,没有一种理论或论证能解除这一桎梏。

在当前反对“消费社会”的造反中,感性企求成为“实践性的”,成为合理的新建设的,新生活方式的手段。^②这就是说:个人感觉的解放应该构成普遍解放的序幕,甚至是基础;自由社会应该建立新的本能需要上。那末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人道”,和作为“具体而普遍的东西”(而不是作为抽象的价值),作为实际的力量,作为“实践”的“人的团结”怎样才能从个人的感性中产生出来呢?客观的自由怎样才能从人的主观的能力中产生出来呢?

现在我们必须谈一谈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人的感性——个人的原则怎样才能制造出全球性的原则来?

我想追溯一下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对这一问题的阐述;这一阐述构成了马克思的观念的精神来源。康德认为:一种普遍的感觉中枢(直观的纯形式)构成了感性经验的统一范围,并因而赋予知性的普遍范畴以效准。黑格尔认为:对我的直接感性确定性的内

① 下面的那些论述可参见我所著的《论解放》,波士顿,1969年,第36页等(德文版:《论解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

② 伯克利围绕着人民公园的斗争表明了感性对政治行动所具有的意义在增长,法律和秩序的卫道士们在斗争中使用了暴力。

容和形式的反思揭示了“我们”是在“我”的直观和感知之中。一当还没有反思的意识达到自我意识和对它与客体关系的意识的阶段时,达到它经验到了在事物的感性现象“后面”的“超感性”世界时,它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就站在现象的幕布的后面。而这个“我们”就作为社会的现实性展开在主人和奴隶为争取“相互承认”的斗争中。

康德力图调和人和自然,自由和必然,普遍和特殊,而黑格尔的上述观点则是从康德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过渡的转折点。黑格尔的“现象学”和康德的先验论观念决裂了:历史和社会深入到认识论(和认识结构本身)之中并铲除了先验的“纯粹性”;自由的理念开始唯物主义化。进一步的考察表明,这一倾向早在康德哲学中就已存在了。当人们考察一下从第一批判向第三批判的发展时,这一倾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在第一批判中,主体的自由只存在于对感觉材料的认识论的综合中;自由局限于先验自我的纯综合之中:它是先验性的能力,凭借这一能力,先验的主体构成了经验的对象世界,这就是理论认识。

二、在第二批判中,随着(所要求的)道德的人的自主权开始向实践的王国过渡。道德的人可以自由地作用于因果关系,而并不打破自然的因果关系——必然性。而代价则是:感性屈从于理性的直言命令。人的自由和自然的必然性之间的关系仍是模糊的。

三、在第三批判中,人和自然在美学方面互相联系;自然的“它在性”缩小了,而美则显现为“感性的象征”。自由的王国和必然的王国的统一这时不再被看作是控制自然和自然屈从于人的目的,而是一种固有的、理想的目的性,“一种无目的的目的性”被赋予了自然。

但是只有在马克思的观念中(在维持唯心主义的批判的、先验的因素的情况下),调和人的自由和自然的必然性,主观的自由和客观的自由的物质的历史的基础才进入到意识之中。这一统一是以解放为前提的:革命的实践,应该废除资本主义机构,并用社会主义的机构和关系代替之。在进行这一过渡时,意识的解放必须和把握人的实存的总体的感觉的解放同时进行。在人们能够共同建设一个不同质的社会之前,个人的本能和感觉必须改变。但是在进行这一新建设时,又为什么要强调美的需要呢?

四

当马克思讲到“按照美的法则”(即自由的人的实践的专门特征)来塑造对象性的世界时,他既不是附带说说的,也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慷慨激昂。美的质从根本上来看是非暴力的,是非统治性的(我将在第三章论述这一点),在艺术领域中的美的质,和只是在升华了的“高级文化”意义上的对“美”的压制性使用中的美的质,是从社会现实和“实践”中提取出来的。革命将消除这一压制,并将把美的需要重新组织为破坏性的力量,它能抗衡占统治地位的,塑造了社会和自然世界的攻击性。有能力成为“能接受的”,“被动的”是自由的先决条件:它象征着一种能力,即看到事物有权体验赋予它们的欢乐,看到自然的性的能量,这是一种想获得解放的能量:连自然都在等待着革命。这种可接受性本身就是创造的基础,它并不构成生产力的对立面,而是构成破坏性的生产力的对立面。破坏性的生产力是男性统治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来的特征;由于“男子的原则”曾经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和肉体力量,所以一个自由的社会将是对这一原则的某种否定,它将是一个女性社会。这一社会根本不同于那种母权制形式;妇女作为母亲的形象本身就是可接受的;这一形象把生物学的事实变为伦理的文

明的价值，并支持和证明妇女的社会压迫的合理性。这不仅是爱欲战胜了男子和妇女的攻击；而这发生在一种由男子控制的文明之中：这就是说是男性的“女性化”。这表明了性欲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混合作用决定了父权制文明的原始攻击性被削弱了。

在发生这种变化时，妇女解放运动将成为一支激进力量，它将超越攻击性的需要和能力的全过程，超越整个的社会组织和劳动分工。换言之：运动将激进化，它将不但是为了争取在现社会的劳动结构和价值结构内部的平等，而且也将为了争取结构本身的改变（如下的基本要求是其先决条件：机会均等，同工同酬，适当地摆脱家务劳动和照看孩子）。在现有的结构中，不但男子没有自由，妇女也没有自由。男子的非人化也许比妇女的非人化更厉害，因为他们不但受着流水线和装配工作的煎熬，而且也受着“商业世界”的标准和“伦理”的煎熬。

但是妇女的解放将比男子的解放来得彻底，这是因为社会利用妇女的生理结构而对她们进行的压迫还在不断地加强。抚养孩子（即母亲的角色）不仅是她们那天然的职能，而且也是她们的“本性”，对妻子这个角色来说情况也是这样，因为传种接代是在一夫一妻的父权制家庭的范围内进行的。此外妇女还一直主要是个玩物或是不能用婚姻来满足的性的能量的客体。

马克思的理论把性的剥削看作是简单的原始剥削，因此妇女解放运动要反对把妇女贬为“性客体”。但是人们很难不产生这样的印象：压制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特有的质将一起进入反对这一社会组织的斗争之中。历史上的情况是，妇女作为性客体的形象及其在市场上的交换价值贬低了妇女作为母亲和妻子这一主要的压制性的形象。这一从前的形象（即作为母亲和妻子）对今天已成过去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来说有着决定性意义：在

这一阶段，“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从经济动力学的角度来看，对经济起过促进作用。相比之下，今天妇女的性客体形象则表明了资产阶级道德的非升华，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发展“高级阶段”的特征。商品形式在这一方面也普遍化了：它进入了过去曾是神圣地被护卫了的领域。（妇女的）肉体，从花花公子看来（并被他们理想化了和净化了），成了有着高交换价值的朝思暮想的商品。资产阶级的道德堕落了？也许是堕落了，但这有何好处呢？当然这一新的肉体概念有助于提高销售额，而人工的美不再是真的；但是美的感性需要被唤醒了，它们被发展了，并且和作为异化劳动的工具的肉体是不一致的。连人的肉体（干净的交换价值）也成了人工的“无菌的”性客体。在宗教世俗化和伦理变成了奥威尔式的虚情假意以后，肉体“社会化”为性客体这一点也许是交换社会走向完成的决定性的最后几步之一：这一完成是不是结束的开始？

但是把肉体（目前主要是妇女的肉体）当作公开的观赏客体是非人道的，特别是当妇女被作为攻击性主体的统治的男子（对这一主体来说，妇女存在在那儿只是为了被人取走）所征服的时候，就更是如此。这是性关系的本质使然，两个人，男子和妇女同时是客体和主体；性的和攻击性的能量在这两人身上是互相混杂在一起的。男人的超攻击性是由社会所决定的，妇女的超被动性也是如此。但是在造成男子的攻击性和妇女的接受性的社会因素中，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对立；从字面上来看，妇女“体现了”和平与暴力的结束会要实现。温顺柔和、多情善感成了她们的肉体的特点（或者说是被歪曲了的特点），成了她们（被压迫的）人性的特点。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女性的质也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决定的。这是一个真正的辩证过程。^① 尽管把具体的个人能力归结为抽象的劳

^① 这一辩证法是 A. 戴维的论文《马克思主义与妇女的解放》（尚未发表）的重点。这篇文章是在狱中写成的，是一个伟大的、好斗而敏感的妇女的作品。

动力这一点造成了男女之间的抽象平等(在机器面前的平等),但是妇女的这一抽象化是不怎么合理的。她们和男人一样被拖进了物质生产过程,但是其规模要小得多。对妇女来说,她们主要是做家务劳动,主要是在家庭里,而家庭则是资产阶级个人得以实现的领域。这一领域是和生产过程分开的,并有助于从精神上来扭曲妇女。妇女和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世界的这一分离有可能使她们不致被行为原则弄得过于残忍,使她们有可能更多地保持自己的感性,也就是说比男子更人性化。妇女的这一形象(及这一现实)是由攻击性的,男子统治的社会所决定的,这一点并不意味着,需要彻底拒绝这些特点,以及妇女的解放必须克服妇女的“本性”。这样一种男女平等可能是一种退化;它只能是妇女对男性原则的一种新的承认形式。在这一点上社会的过程也是辩证的:父权制的社会创造了一种妇女形象,创造了妇女的对抗力量,这一力量可能成为父权制社会的一个掘墓人。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妇女信守了解放的诺言。在戴拉克鲁瓦的一幅油画上,一个妇女手持革命的旗帜,带领老百姓走向街垒。她没有穿军装;她的胸脯裸露着;她的脸上一丝暴力的痕迹都没有。但是她的手中拿着一支枪——因为还须战斗才能结束暴力。

第三章 艺术和革命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卡尔·马克思^①

西方人一看到文化革命这个词首先想到的是思想意识的发展先于社会基础的发展。文化革命——但(还)不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当艺术、文学和音乐、交流形式、风俗习惯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表示了新的经验,和对价值的激进的再评价时,社会结构及其政治表现形式看来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或至少还落在文化的变化之后。“文化革命”同时表示,激进左派今天已在一种新的意义上,向物质需要彼岸的整个领域发展,并把目标指向传统文化的彻底改造。

对艺术的政治潜力的强调是这一激进主义的特征,它主要表达了这样一种需要:有效地交流对现存东西的控诉和解放的目标设想。人们力图找到新的交流形式,它们能打破已有的语言和思想对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压制性统治,这种语言世界和思想世界早已成了控制、灌输和欺骗的工具。要想交流革命的、激进的、“新教徒”式的新历史目标,(从广义来讲)就要有一种同样是“新教徒”式

^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卷,第48页。

的语言,要有一种能到达人民中去的语言,人民正在使自己的主人和经理的需要和价值成为内在的,成为他们自己的,并在自己的思想,意识,感觉和本能中再生产着现制度。如果这样一种新语言要在政治上有所作用,那末人们就不能简单地去“发明”它:它很可能要依靠对传统材料的另外一种使用。当传统本身允许和认可了另一种语言,另一种形象时,可能性就出现了。主要有两个领域存在着这类种语言,完全不同的社会集团在这两个领域里活动着,这两个领域就是艺术^①和民族传统(黑人的语言,切口和俚语)。

民族传统的语言仍是被压迫者的语言;作为这样一种语言,它对抗议和拒绝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黑人今天有意识地发展了自己的语言,他们的语言加强了他们的团结,加强了他们对共同的命运和被压制、被歪曲的文化传统的意识。因此他们的语言是反对同一化的。语言造反的另一种形式是系统地使用“脏话”,我有一次曾强调过它所可能具有的政治潜力(见《论解放》,第58页等)。但今天这一潜力已失去了它的意义。由于统治集团完全可能认可这种语言,因此它就不再能成为激进分子的特征,而成了不属于激进左派的人的特征。此外标准化的脏话是一种压抑的非升华:攻击性的一种很舒服的发泄(尽管只是一种补偿性的作用)。这类脏话对性的特性满不在乎。取自生殖系统和排泄系统的表述成了激进左派的惯用语(如“义务”使用“他妈的”和“狗屁”等字眼),这种用法乃是对性的特性的贬低。当一个激进分子说“他妈的尼克松”时,他是把这个表示最高级的性的满足的词和统治集团的最高级代表联系起来;而谁把敌人的产品说成是“狗屁”,谁就采用了资产阶级对性的诅咒。这种(完全无意识的)对性的贬低表明了激进分子正为自己的无权在惩罚自己;他的语言失去了政治分量。局限于把小资产阶级禁忌说的那些话变成口头禅的语言造

^① 我所使用的“艺术”一词的概念不但包括文学和音乐,也包括造型艺术。

反，只要还是被用作为同一性的暗号(即表明都属于激进的“新教分子”)，那末这一造反也就损害了政治上的同一性。

在社会的另一极，即在艺术领域里，继续存在着一个固有的独立的抗议和否定“已有物”的传统世界。在这一世界里，人们继续散布着，听到和看到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形象。这一(起着另一种作用的)艺术在今天反对现存社会的政治斗争中是一种武器，其影响深远，直达到有某些特权的或被损害的集团。艺术传统的破坏性使用从一开始就把目标指向使艺术全面地非升华：指向破坏美的形式^①。“美的形式”指的是质(意义、节奏和对比)的总体，这些质使一部作品成为封闭的有着自己的结构和秩序(即一定风格)的整体。凭借着这些质，艺术作品改造了现实中占统治地位的秩序。这一改造是“外表性的”，但是赋予要表达的内容以意义和作用，而这些意义和作用不同于这些内容在传统评论中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的。词、声、形，它们属于另一个范畴，它们把现有现实的权利“限制起来”，以利于将来的调和。和谐的外形，即唯心主义的理想化，以及艺术因而和现实相分离，这一切都是这一美的形式的特征。它的非升华意味着返回“直接性”艺术，它不仅打动了理智和细致的、“蒸馏过的”、受约束的感性，并促使它们开动起来，而且主要是打动了从苟延残喘的剥削社会的强制和要求中挣脱出来的“自然的”感性经验，并使它开动了起来。人们正在寻求表达肉体(和“灵魂”)的经验的艺术形式，但不是把它作为劳动力和放弃的媒介，而是作为解放的媒介。正在寻求一种感性文化，所谓“感性”就是它包含有对人的感性经验和接受性的激进化改造：就是将其从自发进行的、赢利的、歪曲性的生产力中解放出来。但是文化革命远远超出对艺术的重新评价：它直波及到资本主义在个人身上的根子。

^① 参见《论解放》，第66页等。

我在前一章曾试图勾划出这一解放的物质的、实践的威力。用抽象的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模式已不能恰如其份地来把握文化的变化。在当前的研究中,“资产阶级文化”的堕落也损害了资本主义的使用价值。对现实的新经验,新的价值削弱了不独立居民的一致性。这一很难孤立和抵御的抗议较之它的政治目标和口号更有力地威胁着社会制度的内聚力。这一抗议也促使人们去努力埋葬制度的“高级”文化;因为争取根本不同的生活方式看来深深地依赖于从“资产阶级文化”中解放出来。

和资产阶级的艺术传统,无论是严肃的,还是民间的艺术传统的决裂,今天来看差不多快完成了。新的“公开的”或“自由的形式”不仅体现了历史产物的新的风格,而且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对艺术迄今一直在其中运动的整个世界的否定,体现了改变艺术的历史作用的努力。这些努力真的是解放道路上的步伐吗?它们所推翻的正是它们主张要推翻的东西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更明确地确定一下,什么东西是真正应该被否定的。

有没有一种意义明确的(不是含糊不清的、反历史的)共同特征可以说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文化”?这一文化的历史主体是资产阶级,先是处于贵族为一方,农业工人对工厂工人为另一方之间的城市中产阶级,后来是在十九世纪和工业工人阶级对立的统治阶级。但是由这一时期文化所反映的(所谓的)资产阶级,按照他们的社会作用和他们的精神来看,今天已不再是统治阶级;他们的文化并不统治着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艺术的(“高级”)文化。

让我们回忆一下这两个文化领域的区别:物质的文化包含的是“挣钱养家”时代的真正的行为模式,即使用价值的体系;能力原则的统治;父权制家庭作为教育的单位;劳动作为职业,作为工作;而精神的文化包含“更高的价值”,自然和精神的科学,艺术,宗教。

我们将会看到，资产阶级文化的这两个方面离开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甚远，它们是在对立中，在相互矛盾中发展起来的。

物质的文化是典型“资产阶级的”：主要描写金钱，买卖和商业（把它们写成是“存在着的”，在宗教和伦理上都是允许的价值）；父亲作为一家之长和企业之主的主宰经济和“精神”的作用；权威教育（以便再生产这种功利主义的目标，并使之内在化）。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全部“生活风格”包含有一种工具主义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和自由的倾向是相背的，是贬低性行为的，是贬低妇女的，并以上帝和买卖的名义进行着压制。

而精神的文化则相反，它蔑视和否定这种物质的文化；它是十分理想主义的：它把满足和放弃，自由和屈从，美和外形无情地互相联结在一起，就这样它使压制性的力量得到了升华。

很清楚，这种文化的统治已成过去。今天资产阶级既不拥有一种自己的文化（以使统治阶级的思想能够成为统治的思想），也不使用传统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的古典文化已经过时了；很显然它已没落了，而原因不在文化革命和学生运动的压力，而主要是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动力，对垄断资本主义来说，这种文化不符合使它继续生存下去和增长的要求。

我想简述一下资产阶级文化这一内在没落的最普遍特征：作为“资本主义古典精神”的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的背弃；作为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前提条件的凯恩斯主义；统治阶级对“消费社会”的再生产的依赖性（这一社会陷入了和资本主义永远需要异化劳动的不断增长着的矛盾之中）；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随着行为方式越来越同一化的必然性的出现，理想主义的概念破灭了，实证主义的教育兴起了，“严格的”科学方法渗入了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领域；能扩大商品市场的自由意志论的亚文化群的渗入；语言世界的崩溃（超奥威尔主义成了正常的交流方式）；资产阶级家庭中父亲

的形象和超自我的崩毁^①。

只要今天的统治阶级还坚持传统的文化价值，那末上述一切就都是和形式上的犬儒主义同时发生的，人们用犬儒主义的态度来谈论保卫自由世界，保卫自由企业界，保卫公民权和个人。所以要用犬儒主义态度来谈论这一切，是因为没有一种思想意识还能掩盖这样的事实：这一统治阶级再也不能继续发展包含在这些机构里的生产力，而是禁锢和滥用这些生产力。思想意识从上层建筑（在那儿，无耻的谎言和愚蠢的废话取代了思想意识）里退了出来，并体现在消费社会的商品和服务中，这些商品和服务维持着幸福生活的虚假形象。

现在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资产阶级文化的没落是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的动力和文化适应于它的要求的结果，那末当我们面对着这一没落时，文化革命（只要其目标是摧毁资产阶级文化）难道就不用再遵循文化及其新使命应该适应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了？如果要的话，那末它是否偏离了它的真正目标：扩大另一种质的、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难道就不存在着一种危险的相反情况，如果不说是在造反的政治目标及其文化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矛盾的话？造反派是不是应该改变其文化“战略”，以解决这一矛盾？

这一矛盾在发展反抗艺术，即“生活艺术”的努力中，在对美学形式的拒绝中表现得最明显。他们努力想达到这样一个长远目标：扬弃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分离，这一分离是资产阶级文化的阶级特征的表现。而这一阶级特征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最完美的作品的基本因素。

^① 参见《爱欲与文明》，波士顿，1969年，第85页等（德译本：《性欲结构与社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5年，第97页等）；以及参见H.勒文弗德和Y.勒文弗德的《我们那随意的社会和超我》，载《心理分析季刊》，1970年10月。

现在首先要问这个看法对不对？只要大致地翻一翻这些作品（至少是翻一翻十九世纪或更晚一些时候出现的作品），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们的主要倾向基本上是反资产阶级的：高级的文化控诉资产阶级的物质文化，指斥它并和它保持着距离。高级的文化事实上是被隔开的，它自己离开了商品世界，离开了残酷的资产阶级工业和资产阶级行为，离开了对人的关系的歪曲，离开了资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和工具主义化的理性。美的世界和现实相矛盾，这是一种“方法论的”、“有目的的”矛盾。

这一矛盾从来不是“直接的”，全面的；它所取的不是一种社会的或政治的小说、诗歌、绘画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形式。但是在毕希纳，左拉，易卜生，布莱希特，戴拉克鲁瓦，杜米埃，毕加索等人的作品中，用的仍是艺术的结构，即戏剧、小说或绘画的形式，并表现为和现实保持着距离。否定受到了形式的“束缚”；这始终是一个“破裂的”、“升华了的”矛盾，它体现了已存的现实及从中的解放，这一体现创造了一个封闭的世界；而不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自然主义的，它始终是现实和自然的它物。在这一美学世界里，当矛盾出现在一个它们所隶属于的周密的秩序里时，这些矛盾实际上就“解决了”。而这一周密的秩序首先是一个十分具体的、历史的秩序：希腊城邦国家的秩序，封建宫廷的秩序或资产阶级社会的秩序。在这个世界里，个人的命运（就象艺术作品所描述的那样）远不是纯个人的：他的命运也正是其他人的命运。没有一部作品不是用特殊的形式，行为和痛苦来描述这种普遍的东西，但是主要是用直接的感性的形式，而不是用“象征性的”形式来描述：个人“体现”一般；因此他就成了普遍真实性的先兆，而这一真实性就显现在他那奇妙的命运里。

艺术作品把特殊的个人的内容送进它也占有一份的普遍的社会秩序中。但是只发生了这些变化吗？艺术作品的真实性，“效

准”仅只局限于希腊城邦国家，资产阶级社会等范围吗？当然不是。在这里，美学理论又遇到了那个老问题：究竟是哪些质使希腊悲剧、中世纪史诗即使在今天仍有真实性？不仅是从可以理解的角度来看，而且也从获得艺术享受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应该从“客观性”的两个方面来探索答案：一、美学的转化揭示了人性的情况，说明了它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前史）是如何坚持下来的，而不受特殊条件的损害；二、美学的形式要求人的知性、人的感性和人的想象力具有一定的坚持不懈的质，传统的哲学美学把这些质解释为是美的理念^①。

由于艺术作品中这一特殊的历史世界的变化（这一变化源自对特殊内容本身的叙述），艺术就打开了现存现实的另一方面：可能的解放的方面。这当然是一种表面现象，但却是显示了一种新的现实性的表面现象。这一点只有当艺术出于自身想成为表面现象时才会发生：宁要一个不实在的世界，而不要这个现存的世界。艺术正是在这种变化中维护和超越了它的阶级性，但不是向纯虚构和幻想的王国方向的超越，而是向具体可能性的世界的方向的超越。

我首先想指出资产阶级时代的高级文化的阶级性的典型特征是什么。这些特征一般地说可以在对个体的主体，即“自主的人”的发现和欢呼中看到，这“自主的人”应该在和摧毁自我的世界斗争时，走向自我和发展为独立的自我。这一主观性打开了资产阶级现实性的一个新的方面，即自由和满足的方面；但是这一自由的王国最后将在内在性中被发现或被“升华”，或甚至被诅咒为非现实。在现有的现实中，个人要么适应，要么顺从，要么自我毁灭。现有的现实是由它自己的权利，它自己的真实性构成的；它有它自己的伦理，它自己的幸福和满足（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它的合

^① S. 莫拉夫斯基的《艺术的价值》（见《美的教育》杂志，第5卷，第1册，特别是第36页等）对关于“美学中的客观主义立场”问题的讨论作了分析。

理性)。而另一个真实性的就是大师们的伟大作品中的音乐,歌曲,诗歌和图画,这是一个美的、自我满足的王国,一个美的、和谐的世界,可怜的现实就让位给了这个世界。正是这一“内在的真实性”,美的形象世界的这一崇高的美,今天成了错误的,成为商品文艺的一部分,成了解放的障碍,因此从精神和肉体上都是不再允许的。

我承认,对我来说很难规定资产阶级艺术的特殊的阶级性究竟是什么。当然资产阶级艺术的作品都是商品;它们也许就是为了拿到市场上去而被当作商品创作出来的。但单是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这些作品的本质,即它们的真实性。艺术中的“真实性”不仅同艺术家全部作品的内在的密度和逻辑有关,而且也同这全部作品所传达的东西,形象和声音,以及节奏的效准有关。它们揭示和传达了人的存在的事实和可能性,它们是在一种完全不同于日常的(和科学的)语言和交流的光线的光线中“看到”人的存在的。

在这样的意义上,艺术家的全部真实的作品就具有了一种普遍的效准和客观性所要求的意义。一部作品的文字,结构,节奏最终来说确是某些“客观”现有的东西,是可以恢复原貌的,是可以查明它们就是同一样东西,经过特殊的解释,吸收和歪曲,它仍没有变。作品的这种客观性和普遍的效准也不会因为下述情况而被抛弃,即作品的创作者(他们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把心理分析的领域和本体论的领域弄混了。当然艺术的本体论结构是一种历史的结构,但是历史是所有阶级的历史,这些阶级的环境世界就其最一般的特征而言就是同一个环境世界,而它们就在这一普遍的客观的环境世界里互相斗争着。

此外艺术还提出了另一个,所谓更大的,“否定的”总体性:人的存在的“悲惨”世界和不断提出新的从这一世界中解脱出来的要求,这就是解放的诺言。我早已指出过,艺术要求作这样的许诺,并凭借了这一种功能超越了任何一种独立的阶级内容,而又没有完

全消灭这种内容。很明显资产阶级艺术存在着这样一种独立的阶级内容：例如在中世纪的骑士艺术中，骑士的装饰和他的问题统治着舞台，例如在市民的资产阶级艺术中，市民的装饰和他的问题也一样统治着舞台。但是这一点就足以规定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内容和形式了吗？黑格尔曾指出过近代小说和中世纪史诗的本质，即真实性的连续性：“拟传奇式的虚构故事所表现的是变成具有严肃性和现实内容的骑士风。外在世界的偶然情况现在已转化为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固定安稳的秩序，所以警察制度、法律、军队、国家行政机构代替了过去骑士们所追求的虚幻的目的。因此，在近代拟传奇式的虚构故事中活动的英雄们的骑士风也就改变了性质。这些英雄们站在个人的立场，抱着关于爱情、荣誉和野心的主观目的，或是抱着要改良现存秩序和现实的散文气味的理想，而现存秩序和现实却从各方面阻挡着他们的道路。在这种矛盾对立中，他们把主观的愿望和要求不适当地推到非常高的地位。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中了魔似的对他完全不合式的世界，他必须和这个世界进行斗争，因为它在压迫他，冷酷地顽强地站在那里，不给他的情欲让路，在他面前摆着父亲和婶母的意志和市民社会关系之类障碍。”^①

当然也有冲突和解决，它们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对更早的历史时期来说是陌生的（可以看一看笛福、莱辛、福楼拜、狄更斯、易卜生和托马斯·曼的作品），但是它们的特殊性包含着普遍的意义。难道说，特里斯坦*，巴尔西沃**和西格弗里德***只是封建

① 黑格尔：《美学》中文版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63页。

* 特里斯坦(Tristan)，中世纪传说中的多情的英雄，托马斯·曼曾写有同名短篇小说。——译者注

** 巴尔西沃(Parsival)，中世纪克勒特民族(Kelten)英雄，瓦格纳曾编有歌剧。——译者注

*** 西格弗里德(Siegfried)，德国中世纪传说中之英雄，瓦格纳《尼伯必根指环》四联剧之三即以其名。——译者注

的骑士，他们的命运只是封建关系的集中体现？阶级内容很清楚地是存在着的，但是它是人类的状况和悲剧也是一目了然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和调和——美学形式的成就。一种新的尺度出现在独立的内容中，（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男子和妇女就在这种新的尺度中体现了人类，体现了人的本质。

资产阶级时代的高级文化曾经是（和现在是）一种优秀文化，这是正确的，这种文化只有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才能得到，甚至是只对他们来说才是重要的；但古代以来的所有文化都具有这一特点。劳动阶级在这一文化世界里的低下地位（或没有地位）无疑使它成了一种阶级文化，但并不是成为一种专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文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我们就有理由可以认为，文化革命远超过了资产阶级文化，文化革命就是针对着这样一种美学形式的，就是针对着这样一种艺术的，就是针对着作为文学的文学的。文化革命所提出的理由证实了这一看法。

二

反对美学形式的最主要论点是什么呢？

这种美学形式不是对人的实际状况的恰当表述；当它创造了一个美的表面的世界，诗情画意般的公道的世界，人为的和谐和秩序的世界时，它和现实是脱节的，它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证明不能被证明是合理的东西的合理性；在这个表面调和的世界上，本能的能量，肉体的感觉能量，物质的创造力，这些解放的力量受到了压制；因此美学形式是巩固压制性社会的一种因素，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压制性的。

当文化革命最初表现出来的时候——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在伦敦举办第一次展览时，H. 里特曾对古典艺术和压迫的关系作过提纲挈领的阐述：“我们想直截了当地指出古典主义在今天对我们来

说就象以往一样，代表的是压迫的力量。古典主义是政治专制的精神对应面。在古代和在中世纪王国中，曾经是这样。它复活于文艺复兴的专制之中，从此以后，它成了资本主义的官方信条。”而再后来：“古典艺术的标准是秩序，比例和对称，平衡，和谐，以及所有可能的静止的和无机的质的典型结构。那些思想概念控制和压制了增长和变化所赖以的本能；它们不以自由的决定为依据，而纯粹是强加于人的理想。”^①

当前的文化革命把 H. 里特对古典主义的拒绝从实践上扩大到对所有样式的拒绝，扩大到对全部资产阶级艺术的拒绝。这里就涉及到资产阶级艺术的“肯定性特征”，由于这一特征，艺术就有助于美化和证明现存的秩序^②。美学形式用对普遍人性的欢呼来对孤立的资产阶级个人作出反应，用对美好灵魂的褒奖来对肉体的堕落作出反应，用对内在自由的价值的坚持来对外部的奴役作出反应。但是这一肯定性有其固有的辩证法。没有一种艺术作品是不用“否定的力量”来突破它那肯定立场的；它在它的结构中要求另一种现实，另一种秩序的文字、图画和音乐，这另一种现实、另一种秩序是被现存的秩序和现实所拒斥的，然而却活在人的思想和愿望之中，活在他们的遭遇之中和活在他们反对现存的秩序和现实的造反之中。当肯定性与否定性，欢乐与痛苦，高级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对立不复存在了，当作品再也承受不住现在是什么样的和可能（及应该）是什么样之间的辩证统一时，艺术也就失去了它的真实性，甚至失去了它自身。而资产阶级艺术的这一批判的、否定的、超越的质恰恰体现在这种美学形式中，这是些反资产阶级的质。恢复和改变这些质，挽救它们不使失传，应该是文化革命的

① 《超现实主义》，书前附有 H. 里特的导言，纽约，1936 年，第 23, 25 页等。

② 参见我的文章《文化的肯定性质》（1937 年），莫因河畔法兰克福，1965 年。

一项任务。

当文化革命在社会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即资本主义制度不断衰落和反革命的压迫组织对此作出越来越强烈反应的时候，对美学形式作不同的、肯定的评价，和承认它是激进地重建社会的一个因素，看来是恰当的。当反革命的压迫组织遏止住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时，反对派被“挤”进了文化领域和亚文化领域，并被指定在这两个领域找到可以打破已有的评论和能够拯救未来的形象。

今天的形势比从现代艺术发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至法西斯主义兴起止这一时期的形势还要坏。革命在西方被打退了；法西斯主义表明，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人们是怎样使恐怖制度化的；而在迄今还在国际范围内控制着这一制度的最先进工业国里，工人阶级还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尽管资产阶级古典艺术已退出历史舞台，但独立的资产阶级以后(社会主义)的文化的发展却被阻遏了。看来文化革命在社会中没有土壤和基础，它主要是抽象的否定，而不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历史继承人。因为没有有一个革命阶级来承担文化革命的任务，于是它就到两个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方面去寻求支持：它一方面企图用文字、图画和声音来表达(不革命的)“群众”的感情和需要；另一方面它发展了对抗形式，它们纯粹只是使传统的形式变得支离破碎而已。诗是被分成诗行的散文；画用纯技术的布局代替了完整意义的整体；音乐用完全自发的、公开的复调音乐代替了高度“精神的”、“彼岸的”古典音乐。但是对抗形式并不能弥合“现实生活”和艺术的裂痕。而那些维护经过激进考验的资产阶级传统的进步的质的人是反对这些倾向的。

在这一传统中，结构、对比和统一是重要的美学的质。但是这些质在这儿既不是“思想的概念”，又没有提供“压制性的力量”。它

们倒是相反的东西：是思想，是对一个被拯救了的、解放了的世界——从压制力量中解放出来的世界的想象。这些质是“静止的”，因为艺术家的全部作品都“制止住”了现实的破坏性运动，因为这些作品是一个永恒的“终止”^①。但是这是满足的静止，安息的静止；是暴力的终止；是不断翻新的希望（莎士比亚的悲剧就是以此为结局的），是希望从现在起世界会变个样子。这是结束动物争斗的奥尔否斯*音乐中的静止的质，这一特点也许是所有伟大的音乐所共有的。^②支配着艺术秩序的标准并不是那些决定现实的标准，而是那些决定否定现实的标准；是那个可能存在于密克诺**的国家里，存在于波德莱尔《邀请去旅行》所描述的国家里，存在于K.劳伦的风景画里的秩序的标准，即屈从于“形式的法则”的秩序的标准。

当然美学的形式也包含有另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代表着压迫的力量，即那些使人和物屈从于现存的理性或现存社会的理性的人的力量。这时它就是一种秩序，一种要求放弃，权威，控制本能和承认现存事物的权利的秩序。它是由命运、由神灵、国王、智者，或是由良知和有罪感所推行的，或者它干脆就是存在在那儿的。这

① 这提出了一个问题：艺术本身并不限制自己的题材？某些题材并不因先验地与艺术不能统一而被排斥在艺术之外（例如对残忍、暴力等不加否定的描写）？当然，有些描写战役，酷刑，绞杀的重要绘画并不反对画上所描述的那些事情。但是，难道不应该从纯技巧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艺术作品？难道它们缺少对艺术来说是本质性的真实内容？如果是的话，艺术实际上就只能是完全肯定性的；即使是完美的美学特征也不能使艺术作品不致堕落为没有（内在）必要性的“装饰品”。

② 尼采问：“音乐也许属于那样一种文化，形形式式的暴徒的王国在这种文化中业已终止？”《尼采全集》，第16卷，斯图加特，1911年，第260页。

* 奥尔否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歌唱家，相传其歌曲之妙足可感动禽兽木石。
——译者注

** 密克诺，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里一个女孩的名字。——译者注

是这样一种秩序,它战胜了哈姆雷特、李尔、夏洛克、安东尼乌斯、贝雷尼克和费特拉、密克诺、包法利夫人,于连·索雷尔,罗米欧和朱丽叶、唐璜、薇奥列塔等人,它战胜了那些想作它想的人,战胜了所有时代的牺牲者和恋人。但是当作品的不偏不倚的公正性宣布现实的政权是没有压迫罪的时候,美学形式也就否认了这一不偏不倚性并歌颂赞美牺牲:真实性存在于牺牲者的幻想、柔情和激情之中,而不存在于压迫者的合理性之中。

支配美学秩序的标准并不是“思想概念”。当然没有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会不作最大的思想努力,在构筑材料时会不遵循一定之规。既没有一种“自动的”艺术,也没有一种“模仿”的艺术,有的只能是把握世界的艺术。

艺术所达到的感觉直接性是以根据普遍的原则对经验加以综合为前提的,这些普遍的原则能赋予艺术作品不仅仅是私人的意义,能使艺术作品对现实性的两个对立因素进行综合:事物的现有秩序和可能的或不可能的从中解放出来,这时在这两个因素中就存在着历史性和普遍性的相互作用。感性、幻想和知性都同样参与了综合的工作。

结果是创造了一个不同于现存客观世界,但是产生于其中的客观世界;但是这一变化对客体(人和物)并不施行暴力,而是为它们讲话,而是赋予在现存现实中沉默的,被歪曲、被压迫的东西以语言,以声调,以画面。而这一艺术内在固有的、解放性的、认识的力量就存在于整个风格和形式之中。即使是现实主义的小说和绘画(它们所描述的都是那时那地实际可能发生或也许已经发生的事情)也用美学形式改造了现实。艺术作品中的男子和妇女的一言一行能和“现实中”的一模一样,事物看上去能和“现实中”的毫无二致,这只有在另一个范围里才有可能:在对环境世界的描写中,在(内部的和外部的)时间和空间的结构中,以及没有出现在这

一空间的东西中^①，在事物的微观(或宏观)中。因此人们可以说，事物在美学秩序内部来到了它们不是“偶然具有”的位置上，以及它们在这一改变中回到了自身。

当然艺术的改变是虚构的，它必须是虚构的，因为除了想象力以外，还有哪种能力能够感觉到(还)不存在的东·西是存在的？而这一改变主要是感觉的，而不是抽象的；它必须提供享受(“乏味的满足”)；它必须是和谐的。难道这一点就使传统的艺术不可避免地成了压迫的代理人，成了当时的统治集团的一个尺度？

三

艺术的肯定性并不在于因为它是从现实中提取出来的，而在于它能很容易地和现存现实相调和，被用作现实的装饰品，被作为不受约束的、但可以获利的价值转送出去，能让人知道，艺术的占有把社会的“高级”阶层，即有教养者和群众区分开了。但是艺术的肯定性力量同时也是否定这一肯定性的力量。尽管它被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当作地位的象征，当作一种高人一等的消费，艺术仍维持着现存现实的异化，而这一现实却是它的源泉。这是第二次异化，依靠这第二次异化，艺术在方法上和异化的社会保持着距离，并创造出那个不现实的、“表面的”世界，在这一世界里只有艺术才拥有真实性和传达真实性。同时艺术正是通过这一异化和社会发生了关系：它维持着和表现着阶级内容。作为思想意识，它使统治的思想意识“失去效力”。阶级内容被“理想化”，被写了下来，并因而成了超越了特殊的阶级内容的普遍真实性的容器。古典戏

^① 梅格·庞蒂在论到司汤达时说：“人们可以报道小说的素材，就象报道一幅画的素材一样，但是小说的主要的东西就象绘画一样并不在素材。主要的并不是于连·索雷尔听了德·雷娜尔夫人欺骗他的话，于是就去找韦里埃尔，并想把她杀死，而是紧接这一消息以后的寂静，是梦想参加骑兵团，是这个直觉的肯定性，是这个不可更改的决定。……但是小说对这一切却只字不提。”

剧就这样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真正的王公、贵族和市民的世界。尽管统治阶级从未象舞台上的主角们那样说过,那样做过,但是它在他们身上至少可以看到它自己的思想意识,它的理想或榜样(或是它的漫画)。^①对于凡尔赛宫廷来说,高乃依的戏剧还是可以理解的;它可以在这些戏剧中看到它自己的思想脉络。同样魏玛宫廷也能在歌德《伊菲格尼》中的托阿宫或在《塔索》的费拉拉宫中重新发现它自己的思想意识。

生活方式是艺术和现实在其中相会的媒质。寄生虫似的贵族有他自己的美学形式,这种美学形式要求一种仪式化的行为:荣誉、尊严、挥霍享受、自己的“高级文化”和教育。古典戏剧曾是对这种秩序的模仿,同时又是批评性地使这种秩序理想化。但是尽管是千方百计的适应,亲近这一现存的现实,戏剧同时还是宣布了它和这一现实的距离。人为的异在在戏剧中是作为它的历史装饰品而出现的,是出现在它的语言,它的“夸张”和浓缩之中的。

异在的形式随着社会的根本变动而变动。随着资本主义的民主化和工业化,古典主义实际上丧失了许多真实性,丧失了对统治阶级的法典和文化的迎合性,亲缘性。任何一种使白宫和古典主义亲近起来的想法都比十足荒谬的幻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戴高乐法国还可以想象一下的事情,在他的继承人统治下则是不能想象的。

艺术的异化使艺术作品,使艺术世界成了某种根本不现实的东西,它创造了一个不存在的世界,一个表面世界,一个现象世界,一个幻想世界。但是在这种把现实改变为表面之中,而且只有在这种改变之中,才显出了艺术的破坏性的真实性。在这个世界里,每一句话,每一种颜色,每一种声音都是“新的”,不同的,都和感知

^① 参见 L. 勒文泰尔:《文学与人的形象》,波士顿,1957年(德译本:《文学中人的形象》,诺维特,柏林,1966年),特别请看引言和第四章。

与理解,感性确定性与理性的为人熟知的总体决裂了,而人与自然就是被禁锢在这个总体中的。词,声,轮廓和颜色都被变成了美学形式的组成部分,它们的熟悉的用法,它们的习惯的作用就这样被夺去了,它们可以自由地被用于一种新的实存的范围。^①这就是样式——诗、小说、画、交响乐的成就。样式,即美学形式的体现,使现实屈从于另一种秩序,而统治着这个秩序的就是“美的法则”。

真与假,正确与错误,痛苦与欢乐,和平与暴力在作品中成了美学的范畴。它们的(直接)真实性被剥夺了,它们进入了另一种关系之中,在这一关系中,连丑恶、残忍、疾病都成了控制着整体的美学结构的一部分。它们并不能因此而被简单地扬弃:在戈雅的蚀刻中,恐惧仍旧是恐惧,但同时他又使对恐惧的恐惧“永恒化”了。

四

我在第二章指出了古典的回忆理论仍秘密地残存在马克思的理论里。这一概念是针对人和物中被压制的质的,一旦认识了它,它就能导向急剧地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对马克思早期理论的讨论说明了回忆的概念在“感觉的解放”中的地位;“美学”涉及到的是感性。在对艺术批评理论进行讨论的时候,人们再一次想到了回忆的概念;“美学”在这儿涉及到的是艺术。

最初阶段的艺术是回忆:艺术求助于先于概念的经验,求助于先于概念的理解,这种经验与理解重新出现在经验与理解的社会

^① 我想在这儿引用梅洛-庞蒂关于塞尚作品中的方法论异化的伟大描述。塞尚和我们世界的传统经验相决裂:“(作品)显示了人类居住的无情自然的深处。所以在另外一种人看来,其人物是那样的奇特。自然本身缺乏使自己成为泛灵论的属性:一幅没有风,没有昂西湖的静静的水,没有象地球起源时滚动着的冰冻的东西的风景画。这是一个冷漠的世界,在那里人是不舒服的,这个世界禁止一切人的感情的流露。”(《塞尚的疑虑》,见《意识和非意识》,巴黎,1948年)。

作用的相互关系中,并且是反对这种关系的,是反对它们的工具主义化的理性与感性的。艺术什么时候达到了这一最初阶段(即智力努力的终点),它就冲破了禁区;它把它的声音,它的眼光,它的耳朵借给了事物,这些事物就是梦、回忆、欲望,即感性的极端状态,在正常情况下,它们是缄默的。这时就不再存在着强加的迫使:形式不再对全部内容加以压制,而是让内容完整地出现。这里也不再有一致性和造反,只有痛苦和欢乐。这些极端的质是艺术的顶点,拥有它们看来是音乐(它“把最内在的,先于所有形态的核心,或心脏给了事物”^①)的一个特权,是存在于旋律音乐内部的一个特权。旋律统治着,旋律在这儿是回忆的基本统一体:以各种变调返回着,在被割断,乐曲不再控制它的地方继续活跃着,它在作品的财富和综合体内构成了高峰,并且是反对这一综合体的。它是声音,而且就是这声音构成了古典音乐和浪漫派音乐这两种结构。

在古典戏剧里,诗是二元世界的主宰的声音。诗向日常语言的规则挑战,并成了在现存现实中保持沉默的东西的表现手段。又是诗(主要是特殊的内容)的节奏有可能使不现实的现实及其真实性迸发出来。“美的法则”塑造着现实,以便使它显现出来。不仅是古典戏剧主角们的行为和痛苦在同时要求和指责着那存在着的東西,而且他们那“升华了的”语言也在要求着,指责着。

资产阶级戏剧(这里指的是那些以资产阶级的成员为主角的戏剧)从一开始就在非升华的、没有理想化了的美学世界里运动着。散文代替了诗句;历史的矫饰被抛弃了;现实主义胜利了。古典的形式让位给了公开的形式(“狂飚突进”)。但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平等思想炸毁了现实的世界: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冲突表现为悲剧的形式,而这种悲剧是无法解决的。当这一阶级冲突不再是舞台表演的中心时,戏剧也就不再专以资产阶级的内容为内容:

^① A.叔本华:《世界是意志和表象》,第1卷,第52节。

资产阶级世界受到了象征性形象或形式的震动，这些形象和形式成了灾难和解放的宣告者（易卜生、G. 哈特曼的作品）。

小说并没有局限于这一美学的超越性上。无论小说以什么样的情节，或什么样的背景为它的题材，它的散文都能打碎现有的世界。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也许要数卡夫卡的作品。和现存现实的联系从一开始就被剪断了，办法是用证明是错误的名称来称呼事物。名称所说出的东西和实际存在的东西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或者使人感到害怕的正是这二者之间的一致，即二者的同一性？但不管是什么情况，这种语言是把假面撕破了：现实本身就是幻想，而不是艺术作品才是幻想。艺术作品按照它整个的结构来看，就是造反，想和它所描述的世界调和是不可能的。

这第二次异化就消失在目前正在作出的系统努力之中：缩小艺术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或者甚至是铲除这一鸿沟。这种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在流动剧院中，在“自由新闻”的诗歌中，在摇滚乐中，无疑存在着造反的情况，但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种造反并不具有艺术的否定性力量。当这种造反使自己成了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它也就失去了艺术借以与现秩序对立的超越性，它对这一秩序来说仍是内在的，肤浅的，并因而败在这一秩序的手下。它的直接的“生活真实性”摧毁了这一对抗艺术及其号召。它运动（不但是字面意义的运动，而且也是转义的运动），在现存世界中运动着，它以失望地呼喊着想废除这一世界而告终。

面对着古典的和浪漫的艺术，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不满，这是不可忽视的。艺术看来是消失了；看来它已失去了它的真实性，它的意义。难道这是由于这种艺术太崇高了，难道这是由于它用“精神的”、形而上学的灵魂代替了实在的活的灵魂，并因而成了压制性的？或者是由于恰恰相反的缘故？

也许这种艺术的极端的质今天向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对激情和

痛苦的太不崇高，太直接，太放肆的表述，也许我们要羞怯灵魂这样爱抛头露面，爱作这样的“流露”。也许我们不再能适应这种对人的存在的慷慨陈词，甚至慷慨到了超过社会强制的程度。也许这种艺术要以接受者具有那种（与作品）有一定距离的反思和冥想，有那种自我挑选的风格与感受性为条件，而这一切都是被今天的“生活方式”所鄙弃的。

人们对艺术异化的不能理解乃是物质过程造成的结果。社会的全部组织，它的暴力和攻击性已经侵袭到了还能体验艺术的极端的质和诚心诚意地承认这些质的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里了。艺术的极端的质和现实的恐惧是激烈地相对立的，而这一对立就表现为躲避无法躲避的现实。它们要求对直接经验有一定程度的摆脱，对“私人孤独”有一定程度的摆脱，而这些要求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已经是错误的。实际上这就是无行动力的，不能使用的艺术：它所“驱动”的只是反思和回忆，也就是说是梦幻的诺言。但是梦幻必须变为改变人的状况的一种力量，而不应该只是梦想：它应该成为一支政治力量。如果艺术在历史的光谱内梦想解放，那末梦想必须通过革命才能化为现实。超现实主义的纲领也还可能是有用的。文化革命证明了这一可能性没有呢？

五

文化革命始终是一种激进的力量。当然它那把艺术的政治潜力释放出来的努力受到了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的阻碍。艺术本身就具有一种破坏性的潜力，但是怎样才能把这一潜力引进到当前的现实中去，也就是说，怎样才能使它表现为是改造性的实践的准绳和因素，而又仍旧是艺术，而又并不丧失其内在的破坏性力量？怎样才能使美学的形式被“某种现实的东西”，即活的东西所取代，而这活的东西确是超越了和否定了现实？

艺术只能把它那激进的潜力表现为艺术，用它自己的语言与形象世界去表现，并使日常的语言失去效力。艺术的解放“信息”和当前的社会批判一样都超越了当前可能达到的解放的目标。（如叔本华所说）艺术应该表现思想，应该在特殊中表现一般；但由于思想与现实，一般和特殊之间的对立也许是决不能消除的，因此艺术必须是异化。如果艺术因为这一异化就不对群众“讲话”，那末这要归因于制造这些群众，并使他们缄默的阶级社会。如果一个无阶级社会成功地使群众变成为“自由结合在一起的”个人，那末艺术也就失去了它的贵族性，但并不失去它对社会的异化。肯定性与否定性的对立使任何一种把艺术等同于革命实践的做法都成为不可能。艺术不能是革命^①；它只能用另一种媒质，即美学的形式来表示革命，在这种形式中，政治内容成了理论政治学的，并由艺术的内在必然性所规定。每一次革命的目标（自由的世界）都表现在一种完全非政治的媒质里，受着美的法则，即和谐的法则的支配。斯特拉文斯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听到了革命：“我个人确信，四重奏提出了人权宣言，而且从柏拉图的艺术具有煽动性的意义上来讲，它也是一份永远反抗的宣言。……四重奏体现了自由的高级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了，而且超出了贝多芬在给侯爵加里辛的信中所认为的，他的音乐能够‘帮助受苦受难的人类’的意思。四重奏是人的一把尺子，……是对人的质的描述的一部分，它们的存在就是一个标志。”^②

有一件象征性的事情可以说明从日常生活向一种根本不同的媒质的过渡，可以说明从已存的社会世界向艺术的异化世界，即寂

① 毕希纳的《丹东之死》和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对法国大革命作了最伟大的描述，但那是批评性的（如果不说是拒斥性的）描述：对当时的现实的革命实践及其要求的拒绝性的描述。此外，还有W.布莱克的伟大的直写到等级会议召开前的史诗残稿。这部作品对革命作了全面的美化，连山、谷地和河流都参加了政治斗争。

② I.斯特拉文斯基，见《纽约时报书评》，1969年4月24日，第4页。

静的世界的“跳跃”：“演出音乐作品的那一时刻就是解开一切艺术本质的钥匙。这一时刻的对象，和这一时刻之前的没有被发现的、没有被感知的寂静相比，是艺术的秘密，……它寓于真实的东西和值得向往的东西的差异之中。一切艺术都是精确地描述这一差异的尝试，都是证明这一差异是不自然的尝试。”^①

这种寂静不只在音乐中成了美学形式的一部分：卡夫卡的全部作品都打上了这种烙印；这种寂静也存在于贝克特*的《最后的游戏》中，存在于塞尚的绘画中。

“……（画家的）全部追求就是寂静。他必须使内心偏见的声音沉默下来；他必须忘记，继续地忘记；他必须在自己周围创造寂静；他必须完全成为回声”^②——不是成为直接现实的回声，而是成为在艺术家对直接现实（甚至是对革命的直接现实）的异化中迸发出来的那个现实的回声。

艺术和革命的关系是对立的统一，是对抗性的统一。艺术屈从于一种必然性，它有它自己的自由，这个自由不是革命的自由。艺术和革命统一在“改造世界”之中——二者都主张解放。但是因此艺术在自己的实践中并不放弃它自己的要求和它自己的标准：它是非行动性的。政治目标在艺术中依靠美学的形式只显现为是一种理想。艺术作品中完全可以没有革命，但是艺术家却可以”、
事着革命家的活动。

A. 勃雷托举库尔贝和兰坡为上述情况的例子。库尔贝在 1871 年巴黎公社时期是公社委员；他负责拆毁旺多姆柱。他为“自由的，非特权阶层的”艺术而斗争。但正是在他的油画里并没有革命

^① J. 贝尔格：《立体派阶段》，纽约，1969 年，第 31 页等。

^② 塞尚，引自加斯古特，见 M. 拉菲尔：《艺术的需要》，普林斯顿，1968 年，第 8 页。

* 贝克特 (Samuel Beckett, 1906 年生)，用法文写作的爱尔兰作家，曾荣获 1969 年诺贝尔奖金。

的直接见证(在他的素描里当然是有的);并没有政治内容。在公社失败后,在公社的英雄被杀后,库尔贝画的仍一直是静物。“……这几个苹果……,多么奇妙,多么硕大,它们的重量和感性都非同一般,它们比哪一幅政治油画都更有力,都包含有更多的‘抗议’。”^①勃雷托写道:“一切都表明,他似乎深信,他能在他想要画的东西中,反映他对改善世界的深刻信念,似乎他能让这一信念出现在他投射到地平线上的或投射到小鹿肚子上的那一束光线中。”^②而兰坡则是公社的同情者;他为公社起草了一部宪法;但是他在公社的直接影响下写的那些诗的声音“和其它一些诗的声音毫无二致”。革命自始至终都包含在他的诗歌里:积极从事着一种把世界变成一种新的语言的技术工作^③。

政治的“卷入”成了艺术的“技术”问题。兰坡不是把艺术(诗)引向现实中去,而是把现实变成一种新的美学形式。激烈的拒绝和抗议体现在不是按照人们熟悉的用法和滥用来组织文字,而是重新组织文字。炼字术:形象,声音,从现存的现实中创造出一个不同的现实,永恒的想象的革命,在历史的长河中出现“第二部历史”。

永恒的美学的颠覆——这就是艺术的任务。取消美学的形式,认为艺术在充分发达的社会主义下相应地被变为现实(或被“科学”所吸收)以前,可以成为革命(或革命前)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也是压制性的:这将意味着艺术的终止。M. 瓦尔泽就这种错误观点对文学的关系作了很好的阐述:“那些对社会状况还不能表示满意的人因此宣布文学死了。这样说为时还过早。只有当对象及其名称融合为一时,文学才可能死亡。但是只

① A. 费纳格尔语,引自 R. 费尼尔:《G. 库尔贝》,巴黎,1969年,第110页。

② 《超现实主义的宣言》,A. 阿波尔,1969年,第219页。

③ 同上,第220页。

要这种极乐世界还没有出现，那末借助文字来争论对象问题就永远会有分歧。”^①而文字的意义将继续使它那日常的意义不起作用：文字（以及图画和声音）将同客观世界——人和自然的虚构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名称和对象的融合意味着，对象所有的可能性都可能实现，意味着“否定的力量”可能停止发挥作用，这就可能意味着：幻想完全可能职能化，即成为工具主义的理性的仆人。

我曾经谈到过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艺术是现实的一种形式”。^②这一说法有双重意义。我是想借此描述解放的本质方面，即按照人的解放了的感性（和合理性）激烈地改变技术世界和自然世界。至今我仍坚持这一看法。但是在这儿它涉及到一个永恒的目标——艺术，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决不能铲除艺术与现实的对立。这指的是主体和客体原则上不可能达到彻底的统一，这是一种绝对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说法。人的性质的可变性的不可逾越的界限（生物学的界限，而不是神学的界限）可能被无视。把艺术这一不可扬弃的异化看作是资产阶级（或别的什么）社会的标志，这是无稽之谈。

这一无稽之谈确有其事实之根据。思想的美学表述，在特殊中表现一般，使艺术把特殊的（历史的）条件变成超时代的：把它们表现为人的悲惨的命运或人的世界性命运，而这一命运也正是人在现存社会中的命运。在西方传统中，不必要的悲剧，不必要的命运受到欢呼，其不必要性的不是由人性的条件，而是由特殊的社会机构和思想意识来决定。我在上面曾提到过一部作品，其实

① 《指南》，第20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31页。

② 见《艺术的前景》，A.J.汤因比，L.J.库恩和其他人的谈话，纽约，1970年第123页等。

质十分明显就是其阶级内容：包法利夫人的厄运很清楚要归于法国外省的小资产阶级的特殊状况。如果人们读一下历史，那末他们就能在想象中把“外部的”非本质的环境世界排除掉（或者干脆“不予考虑”），就能在历史中看到法国小市民对世界的拒斥，看到他们的价值，他们的道德，他们的追求和向往，也就是说看到爱情使他们倒霉的男子和妇女的命运。启蒙、民主和心理分析有可能缓和典型的封建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冲突，也许甚至有可能改变它们的出发点，但悲剧性实质仍存在着。普遍与特殊，阶级内容与超越性的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艺术的历史。

也许有一部“阶梯”，根据这一部阶梯，阶级内容在文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在音乐中表现得最不明显（当然是一般而言）。这就是叔本华的艺术等级制。文字是社会日常交流的工具；它就根据事物是怎样被现存社会所制造，所塑形，所利用的，而成了这些东西的名称。颜色、轮廓和声音并不具有这类“意义”；就社会使用而言，它们较为一般，较为“中立”。因此文字就可能几乎完全丧失它那超越性，而且如果社会越接近于对言语世界的全部控制，那末文字也就越趋向于丧失其超越性。这样我们在事实上也就可以谈论“名称和对象的融合”，但是这一融合是虚假的，是强制的，是欺骗性的，是一种统治的工具。

现在我再回过头谈一谈奥威尔式的语言被当作一种正常的交流工具使用的问题：这种语言对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统治更甚于赤裸裸的洗脑筋，更甚于系统地把谎言当作控制手段来使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语言是具体的；它（似乎是天真地）表现了无所不在的浸透了社会的矛盾。在社会所屈从的政府的统治下，追求和平实际上就意味着进行战争（到处都是为了反对“共产党”）；结束战争就是进行战争的政府的所作所为，尽管此时实际上就可能

是其对立面,即用加紧血洗来代替对血洗的限制^①;自由就是人民在政府统治下所拥有的东西;尽管实际上也许正是其对立面。催泪瓦斯和除草剂事实上就是反对越南人的“合法和人道”的工具,因为它们造成的痛苦要比凝固汽油的小^②。很明显,这就是这个政府的唯一选择。但愿人们能意识到这些令人愤慨的矛盾,但是这并不会改变由官方的或私人的机关下了定义的文字的适用性,有效性和可用性:它造成了所期望的行动方式和行为。语言又具有了魔力:一个政府发言人只需说出“国家安全”这类话,他就可以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承认,当然是越早越好。

六

恰恰是在这一阶段,人们必须坚决努力维持和增强艺术的“否定性力量”,即艺术的破坏性潜力,维持和增强艺术的异化性力量,即美学的形式,艺术的激进力量只有在这一形式中才能传达开去。

P. 斯奈特在他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幻想与文化革命》中把美学超越性的重新获得看作是“艺术宣传作用”:“宣传性的艺术将从所描述的人类的希望史中找出空想的画面来,使它们不受形式的歪曲(这些歪曲是在物质生活条件下强加在它们头上的),并给这些希望指明了现在终于可能实现的道路。……宣传性艺术的美学必须是实现希望的战略。”^③正由于这一战略必须是实现梦想的战略,因此它决不能是“完整的”,决不能成为现实,艺术因此可能成为心理分析过程。“实现”在这儿主要意味着,找到能传递技术环境

① 参见康耐尔关于在印度支那加强轰炸的报告,载《纽约时报》,1971年11月6日。

② 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 G. W. 纳特,《纽约时报》,1971年3月23日。

③ 《指南》第16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31页。

世界和自然环境世界有可能发生解放性变化的美学形式。但是即使如此,艺术与实践的距离及两者的分离仍将存在下去。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抗议看来有可能直接变为行动并和行动相结合起来时,当美学形式的毁灭看来最符合正处于行动中的革命力量时,A.阿尔托特宣布了废除艺术的纲领:《结束你的杰作吧!》:艺术必须成为群众的事业,成为街头巷尾的事情,而首先成为有机体,肉体与自然的事情。这样它就能感动人,感动物;因为“破坏是为了重建”。蛇照着音乐的声音蠕动,因为“传给地球的音乐的震荡对蛇起着一种渗入性十分强烈的、十分持久的按摩作用。”而艺术中止了这种传递,并“使表情不能在有机体身上引起反响。”和自然的这一统一必须重新建立起来:“诗歌中有的只是最简单的诗,没有形式和没有文章。”这种自然诗还存在于人类的传说中(也许存在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甫斯》中),还存在于原始人的幻术中,必须重新掌握这种自然诗。它的重新发现是人的解放的前提。因为:“我们是不自由的。而我们也不是笨蛋。戏剧就是为了首先告诉我们这一点而存在在那儿的。”^①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戏剧必须离开舞台,并走向大街,到群众中去。戏剧必须引起震动,用恐怖来震动,并打破自我陶醉的意识和下意识:“我因此建议要有这样一种戏剧:在这种戏剧中,肉体的和暴力的场面就象一场旋风一样,用强有力的力量俘虏了观众,把他的感性碾散,并催人梦乡。”^②

“强有力的力量”,早在阿尔托特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就已具有完全另外一种样式:它抓住人,并不是为了解放他,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奴役他和毁灭他。今天,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形象才

^① A.阿尔托特:《戏剧及其复制品》,巴黎,1964年,第13,124,123,119,121页(写于1933年)(德译本:《戏剧及其复制品》,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G.亨尼格尔译,第79,86,83,85页等)。

^② 同上,第88页。

能碾碎和麻醉在和平共处中和残杀、迫害、毒气一起生活的(和甚至以此赢利的)人的精神和肉体呢?① 阿尔托特希望有一种“固定的底色”,并认为“声音,噪声,叫喊首先是根据它们的振荡性,然后才是根据它们所表达的东西,而被挑选出来的”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我们就要问:难道观众们,即使是大街上“自然的”观众们,对于可怕的噪声和叫喊不是早已听惯了吗?群众性的宣传工具,体育,高速公路和疗养地不是天天在发出这样的声音吗?它们并没有打破人们对具有破坏力的压抑性的熟悉感,而是再生产着它。奥地利作家 P. 亨克谴责“严肃的活动空间的令人反感的真实性”③。这一说法并不想把政治从戏剧中驱逐出去,而是想指出政治可以在其中得到表现的形式。它并不适用于希腊悲剧,并不适用于莎士比亚,拉辛,克兰斯特,易卜生,布莱希特和贝克特:在他们的作品中,“游戏”凭借美学的形式创造了它自己的“严肃”的世界,这一世界不是现存现实的世界,而是否定它的世界。亨克的上述谴责正切中当前的流动剧院:这种流动剧院其实是名不符实,它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无论是长征时期的,还是后来的)流动剧院。中国的戏剧并不在一个“游戏的世界”里进行演出;它是革命事件的一部分,插曲性地反映了演员和战士的同一性:演出空间和革命空间的统一。

舞台剧可以看作是自我扬弃的一个例子。④ 它试图系统地把戏剧与革命,演出与斗争,肉体的与精神的解放,个人的、内在的与社会的、外在的变化统一起来。但是这一统一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将马克思主义与神秘主义,列宁与 R. D. 莱茵混合在一起是无

① 同上。

② 同上,第 87 页。

③ 引自 Y. 卡尔松克:《大街和戏剧》,见《指南》第 20 册,第 67 页。

④ 参见《当今乐园——舞台剧的集体创作》,J. 梅里那和 J. 贝克执笔,纽约,1971 年。

济于事的；这种混合损害了政治的力量。肉体的解放和性的革命被降低成一种宗教仪式（一种世界性交际仪式），它们丧失了^{在政治革命中的地位}；如果性生活是“通向上帝的一种旅行”，那末即使是最极端的性生活形式也是可以忍受的。爱情的革命是非暴力的革命，它并不是一种严重的威胁；统治力量一向能很好地对付爱情的力量。在戏剧中作为戏剧而进行的激进的非升华是被组织起来的、被驱使的、表演出来的非升华，而且接近于变为自己的对立面。^①

任何一种没有升华的、直接的表达都注定是不真实的。在这种表述中，艺术的“表面”特征不但没有被取消，相反被加了倍：演员只表演他们想表演的行动，而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不真实的，是一出戏。

美学形式的内在革命和美学形式的毁灭，真实的和假想的直接性的区别（建立在艺术与现实的对立的基础上的区别），对于“生活音乐”，即“自然音乐”的发展（及其作用）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看来好象文化革命满足了阿尔托特的要求：音乐必须按照字面意义驱动肉体，并因而把自然拉到造反中去。“生活音乐”实际上有着一个真实的基础：黑人音乐乃是奴隶和隔离区的呼喊和歌唱。^② 黑人

^① 1971年夏天，舞台剧的成员们在巴西向这一地球上可诅咒的人演出，遭到当地法西斯政府的禁止。在那儿，巴西的人民天天忍受着恐怖统治，恐怖使任何人都不可能和现秩序同一化，在政府看来，甚至连解放的神秘表现都是一种威胁。我愿强调我和J.梅里那、J.贝克及其同伴们的团结一致；我的批评是兄弟式的批评，我们进行的是同一种斗争。

^② B.雷勒在他的文章：《节日演出：演变还是革命》中分析了黑人音乐的辩证法：“音乐形式的自由只是将意志用美学形式变为社会的解放。当音乐家打破了主题音调的框框时，他就是采取了自由的立场。这一对自由的探寻被变为不成调的音乐，黑人在这种音乐中表现了一种新的秩序。音调成了开始的秩序，即要拒绝的秩序和结尾的秩序，即向往的秩序相互交流的媒质。对一种秩序的失望，以及对另一种秩序的解放性的获得，导致了和谐的破裂，给呼喊的美学腾出了空间。这一呼喊是‘自由’音乐的特别响亮的因素，是从激情、对立中迸发出来的，它宣告了和现存白人秩序的强制决裂，它表现了未来的新的黑人秩序的暴力。”（《美学杂志》，第3—4卷，1970年，第320、321页）。

男子和妇女的生活在这种音乐中重新复活：音乐是肉体，美学形式是痛苦，悲伤和控诉的“表情”。当白人接受了这种音乐时，它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白人的“摇滚乐”并不等于它的黑色样板（即黑人音乐），即并不是演出黑人音乐。而是在一个艺术的、有组织的范围里进行叫喊和呼唤，跳跃和游戏；它的目标是（友好的）听众。原来是生活一部分的东西，现在成了音乐会，成了演出节目，成了录制唱片。“小组”成了一个吸收了个人的物化的实体；当它一旦消灭了个人的意识和组织起了没有社会基础的集体的下意识以后，它就成了“总体性的”东西。而当这种音乐失去了它的激进动力以后，它就倾向于“群众化”：听众是群众，他们拥来看戏，拥来看演出。尽管听众积极地参加到这样的戏剧中去：音乐驱动了他们的肉体，使他们“自然化”。但是他们的（字面上的）电激动常常具有歇斯底里的性质。难道不断重复的，锤打式的节奏（其变化并不是音乐的新因素）的攻击性，高度的不和谐，标准化的、“冻结了的”歪曲和喧闹等就不是失望和不快的表现？^① 始终如一的表情，（一般来说）很少会互相碰撞的身体的转动和摇曳，这一切看来就象在原地踏步，就象一群不久又要分开的人拥集在一起。这种音乐从字面意义上来看乃是对有效的攻击的一种模仿，一种模拟：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特殊的感情发泄：是一种暂时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集体疗法。解放在这儿仍是私人的事情。

七

艺术和革命的对立看来是不可克服的。艺术本身在实践中并不能改变现实，它也不能屈从于革命的实际需要，而又不否定自

^① 隐藏在喧哗的攻击后面的失望在“杰弗逊飞机”小组成员 G. 斯立克的话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纽约时报杂志》1970年10月18日发表了他的话：“格拉斯毫无表情地说，我们的固定的生活目标是变得更加喧哗。”

身。但是艺术可以从任何时候占统治地位的革命运动中汲取灵感，汲取它那特殊的形式，因为革命构成了艺术的实质。艺术的历史实质在异化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得到体现；这就驳倒了这样的观点：美学形式的重新获得在今天有可能恢复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或别的什么传统形式。人们可否根据对社会现实的分析而来谈论能适应今日世界上的革命潜力的艺术形式？

阿多诺认为，艺术对压制和管理的全部特性是用同样全部的异化来作答。J. 凯格，K. 施笃克豪森和 P. 布勒茨*的充满了智慧的，结构化的，而同时是自发的，形式不定的音乐是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但是这种努力也许并没有达到这样的转折点：全部作品取材自异化的范围，取材自成型的否定，取材自成型的矛盾，并变为一种音响演出，一种语言演出，既无害而又无拘束，变为一种不再震动的震动，并因而变为一种屈服于现存物的震动？

在形式不定的半自发性和直接性中表现出来的激进文学因为美学的形式而失去了政治内容，而与此同时，这种政治内容却在 A. 京斯贝格和 L. 费林海特**的形式最拘谨的诗中得到了表现。S. 贝克特的作品发出了最不调和的、真正极端的控诉，但是他的作品正因为其激进主义，而并没有涉足政治领域：作品中没有一个可以变成政治概念的愿望；美学形式排斥了那种适应，并使文学成为不可侵犯的东西。他的作品作为文学所传达的唯一信息是：现存的东西必须结束。同样的，B. 布莱希特的最好的诗歌也比他的政治论文更富革命性，A. 贝尔格的《沃伊采克》也比今天的反法西斯的歌剧更富革命性。

* J. 凯格 (John Cage, 1912 年生)，美国作曲家；K. 施笃克豪森 (Karl Heinz Stockhausen, 1928 年生)，德国作曲家；P. 布勒茨 (Pierre Boulez, 1925 年生)，法国作曲家。——译者注

** A. 京斯贝格 (Allen Ginsberg, 1926 年生)，美国抒情诗人；L. 费林海特 (Lawrence Ferlinghetti, 1919 年生)，美国作家。——译者注

对抗艺术在这儿消失了，而形式翻新了。从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美学形式，用来表现美学范畴内在固有的压迫性本质，特别是用来表现自由思想的感性显现。布莱希特用下面五行诗句表现了对美的感奋和对政治的惊恐：

茂盛的苹果树使我激动，
画匠的演说使我惊恐，
它们在我的心里争吵着，
但是只有惊恐，
才驱使我走到写字台前。

树的形象留在了被希特勒的演说“逼”出来的诗里。对现存东西的恐惧成了创作时的特征，成了赞誉茂繁的苹果树的美的诗的开头。政治的因素对他物，即美学的因素是负有义务的，而他物从政治这一方面取得了政治价值。这种情况不但在布莱希特（现在被视为“经典作家”）的作品中有，而且也存在在几首当代激进抗议歌曲中，特别存在于抒情诗和B. 迪兰*的音乐作品中。美——“灵魂”重又返回：不是“在脚上”的或“在冰中”的灵魂，而是老的、受压迫的、生活在痛苦中的灵魂：它不是人工的复活，而是“被压迫者的返回”，它成了压迫性内容的形式。音乐把歌唱推到造反的地步，这时声音（字和音）就不再是音调，不再是歌唱，而过渡为一种叫喊。

这涉及到艺术和革命在美学领域，即在艺术本身之中的联系；① 这涉及到一种已经有可能成为政治的艺术，即使（看来）完全

* B. 迪兰 (Bob Dylan, 1941 年生)，美国歌唱家和作曲家，首创民间摇滚乐。
——译者注

① 人们只需读一读年青的（或过去的）积极分子们的真正铿锵有力的诗篇就可以发现，今天的抒情诗怎样才能成为政治性的，而又不失为抒情诗。这些爱情诗作为爱情诗是政治的，它们并不体现时髦的非升华和口头上的性的解放，而是恰恰相反，是使性爱的能量升华，是发现抒情的表现手法，即一种抒情的语言，用以抗议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妇女和男子的遭遇。爱情和颠覆，爱欲和社会解放的统一并不要求牺牲抒情的语言，而代之以变成诗句的（或冒充诗句的）脏话；类似的还有淫书，性广告，用赤裸裸的、市场化的性爱作宣传等。脏话和裸体照片在今天具有交换价值，而浪漫主义的爱情诗则不然。

没有政治内容,和仅仅是诗歌而已,这话怎讲? 布莱希特创造了奇迹,他让最简单的日常用语说出了说不出来的事情:为了那一瞬间,诗歌唤来了一个解放了的世界,一个解放了的自然的画面:

情侣们

看那些在绕大圈的鹤;
云彩衬托着它们,
当它们从一种生活飞进另一种生活时,
云彩和它们一起迁徙。
看来它们成双成对,
飞得一般高,飞得一般快。
鹤和云彩一起,
离开了那美丽的天空,
一下就飞了过去。
因此,谁也不在这儿留得更久,
也看不到另一个在它们俩都感觉到的风中摇曳,
它们正在作比翼飞。
风儿能把它带进虚无,
只要它们不飞散,只要它们待在一起,
只要没有什么东西能触动它们,
只要有人能把它们赶出——
那风雨大作,弹飞枪鸣之地。
在稀疏的阳光和月光下,
它们飞着,沉醉在一起。
你们去哪儿?——一无去处。你们离开了谁?——所有
的人,
你们问:它们在一起已有多久?——时间不长,
它们将在何时分开?——不久将来,

爱情看来就这样支撑着对对情侣。^①

解放的画面寓于鹤穿过广阔天空的飞行之中，云彩陪着它们一起飞；天空和云彩是属于鹤们的，没有强迫，没有统治。解放的画面表现在鹤们可以自由地飞离它们受到雷雨和枪弹威胁的地方。它们是安全的，只要它们待在一起，沉醉在一起。这是瞬息即逝的画面：风能把它们带到虚无中去，然而即使如此，它们仍是安全的：它们飞离一种生活，进到另一种生活。时间成了绝对的：鹤们不久前才聚在一起，而不久后又将四散。空间成了没有界限的：它们不知飞向何方，它们从四面八方飞来，又向四面八方飞去。结局是表面的：看来爱情是持续的，爱情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爱情避开了灭亡。但是表面的现象不能否定它自己召唤来的现实：鹤们是在它们的天空中，是和它们的云彩在一起。而相反是结局否定了表面现象，存在于它的现实之上，它的实现之中。这种观点表现在诗歌的语言中，散文在马哈戈尼城的凶残腐朽之中过渡为诗句和歌曲，过渡为妓女吉尼和伐木工保尔的对话。在这首诗中句句是散文。但是这些话被组织成句子和句子成分，它们说出了和指出了日常用语从来不说出来，不指出来的东西。这种好象是“记录性的句子”直接描述了可感知到的物和运动，然而它们变成了超过当时直接感知的东西的画面：变成了躲进自由的王国，同时是美的王国的画面。

一种奇特的现象：美作为一种质，既存在于威尔弟的歌剧中，也存在于迪兰的歌曲中；既存在于安格尔的画中，也存在于毕加索的画中；既存在于福楼拜的句子中，也存在于J. 乔埃斯的句子中；既存在于V. 果尔曼特斯女公爵的表情中，也存在于一个嬉皮士姑娘的表情中。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美的表现（和不自然的非性爱

^① 《诗集》，第2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0年，第210页。E. 卡勒和Th. 阿多诺曾指出过这首诗的意义。请看阿多诺：《美学理论》，第123页。

化相反)都是对商品世界及这一世界所要求的服务,立场,观点和态度的否定。

美学的形式并将继续随着政治实践能否成功地建设一个较好的社会而发生变化。最理想的就是,能看到一个艺术和现实一致的世界,尽管艺术在这一世界里仍保持着它的超越性。人们在这一世界里也将不再讲和写那些韵文或创作那样的诗歌,宇宙的散文将继续存在下去。当人们不再能区分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现在和未来时,“艺术的终结”也就可以设想了。这将是处于文明顶峰的十足的野蛮状态,而这样一种状态实际上有其历史可能性。

对于阻止这一野蛮的出现,艺术是无能为力的,它并不能凭借自我维持自己在社会中的反社会的领域。它的继续存在和发展靠的是废除带来(作为潜在阶段和这一制度的进步的潜在形式的)野蛮的社会制度的斗争。艺术的命运和革命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因此把艺术家赶到街头乃是艺术的内在必然性,把他们赶到街头为公社而斗争,为布尔什维克革命,为1918年德国革命,为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为所有体现了解放的历史机缘的革命而斗争。但是当艺术家这样做的时候,他也就离开了艺术的世界,并踏进了那一个更大的世界——激进实践的世界,艺术将永远是这个世界的对抗性的组成部分。

八

当前的文化革命把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重又提了出来。我在前面几节中试图对这一问题发表一些浅陋之见;要详细讨论这一问题就需要写一整本书。但是有一个特殊问题必须在这儿再次提出来讨论一下,即“无产阶级文学”(或工人文学)的意义和可能性的问题。我认为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达到

的理论水平最高，后来就再也没有重新达到过这样的水平。特别是当时的 G. 卢卡奇，J. R. 贝希尔和 A. 加布尔为一方，B. 布莱希特，W. 本雅明，H. 艾斯勒和 E. 布洛赫为另一方的论战的理论水平为最高。H. 加拉斯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对这次讨论作了介绍和进行了新的分析。所有参加者当时都一致认为：艺术（实际上讨论仅限于文学）就其“真实性”和形式而言，都由作者的阶级性所决定（即不是简单地指他个人的立场或主观意识，而是指他的创作和阶级的物质地位和思想立场客观上的一致）。这次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在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才能使人洞察到社会的全过程和激进变化的必然性和方向（即洞察到真理）的历史时期，只有无产阶级文学才能发挥艺术的进步作用，才能发展革命意识，才能成为阶级斗争的必不可少的武器。

那末这样一种文学能产生于传统的艺术形式中呢，还是它必须发展新形式，新技术呢？当时讨论了这个问题。卢卡奇（以及当时的共产党“官方”路线）坚持传统表述方式的有效性（特别是坚持十九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的风格原则），而布莱希特则激进地倡导新形式（例如“史诗戏剧”这一形式），本雅明则要求，人们必须用新的技术表现手法，例如电影来取代艺术形式，就这样“大的封闭形式”的拥护者们和“小的开放形式”的拥护者们对立了起来。

今天的问题不只是上述对立的观点；比较一下今天的对抗艺术，那末布莱希特的开放形式就是“传统的”文学。问题主要是关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本概念，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由于其阶级性代表了艺术所必须传达的真理，如果艺术必须是真实的艺术的话。这一理论“是以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存在为前提的，但是正是这一前提连大致的推敲都经不起”^①。

这是实事求是的断言，也是理论的洞见。如果“无产阶级世界

^① H. 加拉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诺维特，1971年，第73页。

观”这一说法指的是在工人阶级中占优势的世界观，那末它就是这样一种世界观：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其它阶级的一大部分，特别是中产阶级都具有这种世界观（在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的行话中，它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意识）。如果这一说法指的是（隐蔽的或公开的）革命意识，那末这一意识今天十分明确地决不是或主要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这不仅是因为反对世界垄断资本主义的革命远不是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而且也因为这一革命的条件、前途和目标用无产阶级革命的那些术语已不能得到恰当的表述（参见本文第一章）。如果这一革命（不论其形式如何）作为目标必须出现在文学中，那末这样一种文学就不可能是典型的无产阶级文学。

这至少是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所得出的结论。我想再次指出无产阶级（作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阶级，但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的概念中的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这一阶级的特殊利益（它的自我解放）同时就是一般的利益；如果它不能消灭作为阶级的自身，不能消灭所有的阶级，那末它也不能解放它自己。这不是“理想”，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动力。因此（作为革命的阶级的）无产阶级的目标就自我超越了：当这些目标还是历史的、具体的目标时，就其阶级内容而言，它们超出了特殊的阶级内容。但是如果这一超越是那时的艺术的根本性质的话，那末结果将是，即使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即使是艺术的所有形式都可以表现这一革命的目标。当马克思爱好保守的艺术，托洛茨基及列宁反对和批评“无产阶级文化”这一观点时，那末这肯定不是由于他们个人的偏好所致。^①

因此当特殊的无产阶级内容在“资产阶级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时，这种情况既不是荒谬绝伦，也不是特殊例外。这种情况常常

^① H. 加拉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诺维特，1971年，第210页等。

与某种语言革命联系在一起，这种革命用无产阶级的语言代替统治阶级的语言，而又没有打破传统的形式（例如小说的形式，戏剧的形式）。或者情况相反：无产阶级的革命内容在（传统）散文的“高度”凝炼的语言中得到表现：例如布莱希特的《三分钱歌剧》，《马哈戈尼城的兴衰》，以及他的《伽里略传》里的“艺术家的”语言。

主张专门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人企图这样来挽救他们的主张：他们提出了一个全面的范畴，即在艺术作品中表现主宰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他们想借这一范畴驳倒“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卢卡奇亲自把这一点变成了可以据以真正识别是否是革命文学的口号。但是正是这一要求是和艺术的本质相抵触的。社会基础的结构和动力从来不能从感性，从美学上来加以表现：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它们是现象后面的本质，只有科学分析才能揭示这个本质，只有用科学的范畴才能阐述这个本质。“开放形式”并不能弥合科学真理及其美学表现形式之间的裂缝。引进到戏剧和小说之中的蒙太奇手法，文件和报导虽然可以成为美学形式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它们永远是次要的因素。

艺术确实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一个武器，其途径是它促成统治性的意识的改变。但是在当时的阶级意识和艺术作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关系的情况是特别罕见的（莫里哀、博马舍、笛福）。艺术由于其固有的破坏性质而和革命意识联结在一起。一个阶级将根据统治性的意识对它是肯定的，是同一的，还是冷淡的程度，而对这一意识持相应的敌对态度。只要无产阶级是不革命的，那末革命文学就不能是无产阶级的文学。同样的革命文学也不能在统治性的（不革命的）意识中“扎下根来”；只有决裂，只有跳跃才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阻止“错误”意识的复活。

和革命文学的观点同时出现的谬论在当前的文化革命中得到了发展。在新左派中正在蔓延的反唯智论主张，以及认为要有工

人阶级的文学，它应该表现工人的当前利益和“感情”，就是其表现。例如：“知识分子左派”由于他们的“革命美学”而受到了批判，“诠释派”受到了谴责，原因是他们“关心一个词的不同色彩甚于关心革命过程”。^①当代的反唯智论被下述思想吓倒了：前者（词的不同色彩）从本质上来讲是隶属于后者（革命过程）的，是可以构成把世界翻译成一种新的语言的因素的，这种语言能够传达解放的激进新目标。类似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拥护者们批评文化革命是“中产阶级的郊游”。他们认为，“只有在这一革命开始把握了，例如一台洗衣机对一个有小孩的工人家庭所具有的十分现实的文明意义时”，它才是有意义的，他们还要求，“这一革命的艺术家们……应该想象一下那个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和筹划终于有一天把洗衣机买回家的家庭的感情……”^②，当他们这样主张和要求时，他们那十足的市侩气真是暴露无遗。

这一要求是反动的，不仅是从艺术的立场来看，还是从政治的立场来看都是反动的。不是工人家庭的感情退化了，而是想把这些感情提高为真正激进的和社会主义文学的标准的想法才是一种退化：被宣布为一种新的革命文学的焦点的东西，实际上是对现存的现实的适应。

当然文化革命应该认识和扬弃工人家庭的气氛，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不能用这样的办法：文化革命“亲自体验”一下由于得到了洗衣机而引起的感情。这样一种体验只能适得其反：使统治性的“气氛”永恒化。

即使在无产阶级文学摆脱了对统治性感情的“体验”以后，即使它用工人阶级最先进部分的阶级意识代替了这种感情以后，把它和革命文学等同起来也仍是有问题的。这种阶级意识可能是

^① I. 西尔伯，《卫报》，1969年12月13日。

^② 同上，1969年12月6日，第17页。

一种政治意识，它只存在于少数工人阶级身上。如果艺术和文学想反映这种先进的意识，那末它们就必须表现阶级斗争的实际条件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前景。但正是这种严肃的政治内容是和将它们转化为美学形式不相容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使人有了十分正当的理由可以反对“纯艺术”。这些内容确实是反对向艺术的纯转化的，是反对转化为具体的日常生活和实践的。因此卢卡奇在他那个时候就批评了一部有代表性的工人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在家里饭桌旁讲的话和党的会议的代表发言一模一样^①。

一种工人阶级在其中以主体—客体，以历史的继承者，以“资产阶级”文学的否定者的面目出现的革命文学还没有出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少数民族和第三世界大多数人的情况也还不符合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艺术的设想。关于黑人音乐我在上面已作了论述；此外，还有黑人文学，特别是黑人抒情诗，它们称得上是完全革命的；它们赋予一种全面的造反以用美学形式表现出来的声音。它们不是“阶级”文学，它们的特殊内容同时也是普遍的内容：被压迫少数民族的特殊状况反映了普遍的要求：对个人及其集团的人的存在的要求。而这一所有革命内容中最激进的内容决不是与传统的形式不可统一的。

^① H. 加拉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第121页。参加讨论的一个共产党人认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们应该用名称来称呼事物，不应该谈论艺术或文学，而应该谈论宣传，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第四章 结论

文化革命中不恰当的激进主义的共同因素是反唯智论（统治集团的反动代表们和激进派们一样也具有反唯智论的观点）：造反所针对的理性，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理性，不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性，而且也是针对理性本身。反对在大学里为统治集团培养干部的斗争确实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但却变成了反对大学的斗争，同样，摧毁美学形式的斗争也变成了摧毁艺术的斗争。这两个精神文明领域和现存现实的隔离及异化必然导致“象牙塔”式的行为；但是它们也能导致统治集团所越来越不能容忍的某些行为，即导致独立的思考和感情。

尽管运动有着十分不恰当的激进主义因素，但它仍始终是一支最进步的反对力量。它在两个主要的方向上，把造反继续推向前，它把非物质需要的领域（自我规定的和没有异化了的人的关系的领域）纳入到政治斗争和实存的生理学范围，即自然的领域里去。而其共同的基础就是感性的解放。它引起了人们对受到现存社会的要求损害了的世界及对必须进行彻底改造的需要的新的经验。存在于这一世界上的对立的统一是压倒一切的，但已经变得不能忍受了：欢愉与恐惧，和平与暴力，享受与破坏，美与丑的统一，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世界里就能感到这一统一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对“正人君子们”的普遍的蔑视再也不能阻止我们表达这样的经验：讨厌的对立的统一（至多是资本主义辩证法的具体直率的表现而已）已经成了这一制度的生活因素。对这种关系的抗议必须变为政治武器。

如果对立的东西的讨厌的共生现象（海上游玩和海边的死亡工业，鸟的飞行和空军喷气战斗机的飞行，夜晚的寂静和摩托车的声响）被克服了，那末斗争也就胜利了。只有到那时，人才能自由地去解决第五街*和隔离区，生育和残杀之间的冲突。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将政治领域与美学领域，将理性与感性，将街垒与爱情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当然会产生仇恨，但只是对非人性的东西的仇恨；这一“善的仇恨”是文化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革命是特别的不大众化的革命；人民仇视它，“群众”蔑视它。也许他们感到，这种造反是针对着整体的，是针对着所有腐朽的，但禁止触动的东西的。也许他们感到，这种造反危及了必然性，即他们的成就和欢乐的价值，危及了包围着他们的富裕。愤懑占了上风：反对新的道德，反对妇女的姿态，反对对为统治集团干活的蔑视，对造反者表示不满，因为他们允许自己做人们必须不做和必须加以镇压的事情。

W. 拉伊希指出，法西斯主义的根子在对本能的压制，他的这一观点是对的；但他又认为，战胜法西斯主义应该主要通过性的解放来达到，这时他可就错了。性的解放完全可以这样发展：并不危及处于先进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一阶段，肉体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数量很明显地大为减少）。这一阶段的本能的解放只有当性的能量变为爱的能量，并力求改变社会生活方式和政治生活方式时，才能变为社会解放的力量。人们对领导人的屈从，攻击和同一，至少在今天来看主要是经济的，而不是本能的原因使然：领导人们还一直在提供着所想要的商品（以及那些危及连续供应这些商品的敌人的尸体）。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对造反者的仇视和攻击被表达了出来，被组织了起来。本能的造反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成为政治力量：本能的造反由理性的造反所陪伴和引导，同时

* 纽约的闹市区。——译者注

知识(以及知识界)绝对地拒绝支持统治集团,以及为了改造的事业,理论和实践的理性力量都被组织了起来。

对商品世界的崇拜看来是每天都在变得不可捉摸了,这一崇拜只有那些继续撕碎技术的伪装和思想意识的伪装的妇女和男子才能加以克服,技术的伪装和思想意识的伪装掩盖了正在发生着的事情,掩盖了整体的疯狂的合理性,这一崇拜只有那些已经获得自由去发展他们自己的要求,和团结建设他们自己的世界的妇女和男子才能加以克服。物化的终止就是个体的开始,就是激进的新建设的主体的开始。这一主体的发生发展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打破了激进理论与实践的传统的框框。文化革命的思想与目标的基础寓于当前的历史状况之中。它们将变成真正具体的,将走向整体,如果造反派成功地使新的感性(私人的,个体的解放)屈从于概念的努力。只有文化革命的思想与目标才能使运动不致沦为清谈和妄想,其途径则是把运动的能量引导到社会上重要的轨道上去。整体的疯狂的力量越是证明了任何一种自发的反抗行为(甚至包括自我毁灭)的正确性,那末对这种自发反抗的失望与反对就越会服从于政治的纪律和组织。革命是有其自身的合理性的。嬉皮士们的解放性的哈哈大笑,他们没有能力认真对付司法部门的血腥表演,这一切有助于撕破思想意识的假面具,假面具背后的结构使司法部门成为不可侵犯。这一结构只能由还一直维持着劳动过程,构成着这一过程的人的基础,及再生产着这一过程的利润和权力的那些人来加以改变。不断扩大着的中产阶级和知识界就属于这些人。但目前,在这一庞大的,真正受压迫的居民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意识到了当前的形势,和在政治上持积极态度。加强这种意识和这种积极性是仍被孤立的激进集团的任务。

为了替这样一种发展打下基础,首先需要解放意识。没有意识的解放,感觉的解放以及所有激进的积极性都仍旧只能是盲目

的和自我毁灭的。政治实践仍始终有赖于理论（只有统治集团没有理论也能实践），有赖于教育，说服和理性。

有一种论点反对这种“唯智论”，我们还必须讨论一下这个论点。它的核心是：强调理论和教育使精神的和肉体的能量离开政治领域，而这一领域是决定反对现存社会的斗争成败的领域。这种强调使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变为文化条件，使人们去研究抽象的知识问题，而绝望的反抗运动正在全世界被人用公开的暴力加以摧毁。在“文化革命”（它是从这样一个国家借用来的，在那儿它曾经是一场群众运动）大招牌的背后隐藏着无非是私人的思想意识的造反，这是对正在受苦受难的群众的嘲弄。“让我们坐在一起，讨论我们的事业”的口号变成了一句笑话，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和五角大楼除了讨论毁灭性武器的效能及其费用外，还能讨论什么呢？国务卿可以和财政部长讨论，财政部长可以和另一个部长及其顾问讨论，而他们所有人都可以和大康采恩的董事们说话。但这是些同党在讨论；对于重要的问题他们都是一致的：现存的权力结构必须加强。权力结构“外部”的人想参加讨论乃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只有在需要人们的选票时才让他们听一听，而这些人的选票也许能把同一权力结构的，归根到底有着同样利益的一个新集团送上台。

上述论点是很中肯的。贝尔托特·布莱希特有一次曾经写道，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谈谈树都几乎是犯法。自那以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今天只要谈论改变就几乎是犯法，而与此同时社会正在变成暴力的机器，它在亚洲想完成以灭绝美洲印第安人为开端的民族屠杀。这个极其残暴的政权难道就不受指责和控诉它的那句说出来、写下来的话的影响了？难道用以控诉这个政权的掌权者的那句话，不正是他们用以保卫自己的政权的那句话？存在着这样一个阶段，那时即使是反对这一领域的盲目行

动看来也是合理的；因为它把封闭的压迫世界撕破了，尽管可能只是那么一瞬间的撕破。（压迫）的升级是这一制度内在必然的，并加快了文化革命的步伐，如果不能及时阻拦它的话。

然而即使在这个制度里，也是区分这样两种时间的，在一种时间里说话是合理的，在一种时间里行动是合理的，而这两种时间都标志了当时社会力量的具体状况。在没有激进的群众行动和左派绝对地弱小的时候，左派必须强迫自己限制自己。由于压迫的加强和破坏性力量集中在当权者的手中，因此强加在造反派头上的东西，应该加以利用，以重新组织队伍和对自己的政策加以审查。应该发展战略，使其适于有效地和反革命进行斗争。出路主要要靠年轻一代，但他们不应该“下马”，也不应该去适应，而应该去学习，应该学会失败后重新组织起来，和用新的感性去发展新的合理性，以经得住漫长教育过程的考验，而这正是向伟大的政治行动过渡的前提条件。因为下一次革命将是几代人的事业；“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非常可能要延续一个多世纪。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工业社会和新左派

作者 =

页数 = 1 8 9

SS号 = 1 0 2 3 1 8 0 4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